雷克斯·斯托特侦探小说

矛头蛇

FER-DE-LANCE



（美）雷克斯·斯托特 著

李阳 卢婕 译

★**他**是史上智商最高的作家，**四岁**通读《圣经》，**十五岁**发表诗作；**三十岁**时在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四十岁**时他一贫如洗，开始创作侦探小说糊口；**五十岁**时作品累计印数超过**八千万册**，和埃勒里·奎因并称为**美国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高成就者**；他是一位英勇的**反纳粹斗士**，为了理想放弃了每年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收入，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民众的称赞。他就是**雷克斯·斯托特**！

★**他**是史上体重最重的侦探，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头部占全身高度的**五分之一**；他酷爱兰花，终日以闻香为乐；他每天要喝**七升**啤酒，吃掉的美味佳肴**难以计数**；他的双手难以环抱自己的肚子，很难连续走上**十步**，因此所有的案子都是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解决的；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从来不会低声说话；他的名字来自古罗马**第一暴君**，他时刻引以为傲；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侦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奖在今天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他就是**尼禄·沃尔夫**！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 101
午夜文库 ★ 大师系列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上架建议：文学 推理小说


ISBN 978-7-80225-717-7
9 787802 257177 >

定价：25.00元

矛头蛇

Fer-de-Lance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李阳 卢婕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矛头蛇／（美）斯托特著；李阳，卢婕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225-717-7

Ⅰ.矛… Ⅱ.①斯… ②李… ③卢… Ⅲ.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9902号

FER-DE-LANCE

by REX STOUT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7-9378



矛头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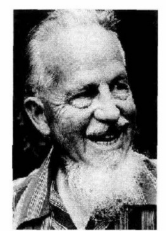
（美）雷克斯·斯托特 著； 李阳 卢婕 译

责任编辑：党敏博
统筹编辑：褚 盟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张鹏志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8.7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第一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717-7
定 价：25.00元



雷克斯·斯托特 Rex Stout(1886—1975)

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和S.S.范达因、埃勒里·奎因并称为“美国古典侦探小说三大家”。

斯托特一八八六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四岁熟读《圣经》，十岁阅读了一千部文学名著，十五岁发表诗作，被誉为“智商最高的侦探小说作家”。他曾在美国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但因为经济大萧条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的斯托特选择创作侦探小说维持生计，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创作了三十余部长篇侦探小说，情节紧凑，幽默搞笑，将黄金时代解谜至上的原则和美国特有的“嘻哈文化”巧妙融合，成为世界侦探文学史上最具特点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托特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并在战后成为一名活跃的世界联邦主义者。和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一样，他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贡献得到了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褒奖。

一九七五年，雷克斯·斯托特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尼禄·沃尔夫

雷克斯·斯托特塑造的侦探，水平最高的“安乐椅神探”，史上体重最大的侦探，侦探中的“暴君”。

尼禄·沃尔夫的名字来源于大名鼎鼎的古罗马暴君，他颇以此为荣。他登场时五十六岁，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他有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额头很高，头和脸异常庞大——但放在他的身体上就显得正常多了；他耳朵很小，鼻子细而长，嘴唇撅起时厚而饱满，紧绷时则又薄又长；他的脸颊不出意外的非常饱满，右颧骨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他的肩膀永远不会塌陷，站立时腰板也从不弯曲——尽管他站立的时间少得可怜。

沃尔夫的肥胖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是个标准的享受主义者。他食不厌精，对美味的孜孜以求甚至超过了对真相的兴趣；他每天要喝掉七升啤酒，而且非常讨厌运动。

沃尔夫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他依靠委托人的叙述和助手古德温的所见所闻展开推理，最终直击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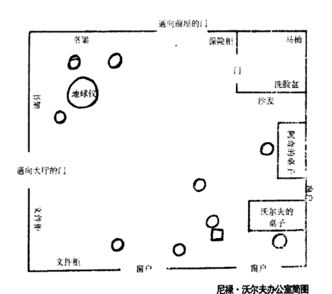
沃尔夫和福尔摩斯一样，是侦探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尼禄·沃尔夫大奖”是当今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备受专业人士和全球侦探迷的推崇。

阿奇·古德温

尼禄·沃尔夫的助手、眼睛和双腿，属于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搭档。

他身高一百八十三厘米，体重八十二公斤，出场时三十二岁；他身材匀称，相貌端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颇具模特风范——唯有那个奇形怪状的鼻子破坏了一切。

古德温身手矫健，行动能力极强——只是，他总是不能很好地使用这种能力，把扑朔迷离的案情搞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沃尔夫批评他自作聪明时，他总是微微俯身虚心接受——至于改正与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尼禄·沃尔夫办公室简图

这幢纽约西部第三十五街的褐色砂岩老房子非常大。前门有一个七级台阶，进入之后迎面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宽阔大厅。右边是一个八英尺宽的巨大的衣帽架，接着是楼梯，从楼梯再往前是通向餐厅的门。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得足够六人吃饭的桌子。餐厅里面铺着地毯——沃尔夫不喜欢裸露的地面。大厅的远端是厨房。大厅的左边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后是阿奇称之为前屋的房子，第二扇门后是办公室。前屋主要被用做接待室，沃尔夫和阿奇很少待在里面。前屋相对较小，里面的家具也是胡乱组合的，没有任何特色。

办公室很大，近乎正方形。如果你从大厅进入，在你左侧远端的角落里用墙隔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小洗手间——这样沃尔夫方便时就不必多走路了。洗手间的门面对着你，转过拐角，在洗手间的另一面墙外，有一个很宽很舒服的沙发。

沃尔夫容不得任何他不爱看的东西，因此他爱看不爱看是家具能否进入这幢房子的唯一标准。地球仪直径三英尺。沃尔夫的椅子是由柠檬木制成的，而桌子却是樱桃木的，但沃尔夫喜欢。沙发上装饰着明黄色的沙发巾，地毯是十九世纪初在黑山织成的，因而有大量补丁。墙上仅有的装饰是三幅画：一幅莫奈的画，一幅柯勒乔的画的复制品，一幅达·芬奇素描的真品。椅子是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材料和各种大小的。

第一章

那天不派我去买啤酒是没有道理的。费尔蒙特国家银行案一个星期前已经结案了，我除了跑腿再没有别的事干，如果沃尔夫需要一筒鞋油，他会毫不犹豫地派我到默里街去一趟的。然而这次被派去买啤酒的是弗里茨。午饭刚过，他还没来得及洗碗，厨房里叫他的铃声便响了。他一接到命令，就出门坐进了我们一向停在房前的敞篷车里。一小时后他回来了，行李箱里装满了篮子，篮子里则塞满了瓶子。沃尔夫在办公室——沃尔夫和我都这么叫，弗里茨则叫它书房，我在前屋读一本让我越看越糊涂的关于枪伤的书。这时我瞟了一眼窗外，看见弗里茨正在路边停车。这可是个抻抻腿的好理由，于是我走出门去，帮他一起把篮子卸下来，搬进厨房。我们正准备把瓶子装进橱柜，铃声响了。我跟着弗里茨走进了办公室。

沃尔夫抬起了他的头。我专门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头实在太大了，他抬起头来看你，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他的头实际上也

许比看上去还要大，因为他身体的其余部分是如此庞大，如果不是他本人的头，而是其他什么人的头搁在上面，你肯定就完全注意不到了。

“啤酒在哪儿？”

“在厨房，先生，在右下方的橱柜里。”

“把酒拿到这里来。是冰镇的吗？再拿一个瓶起子和两个杯子来。”

“是的，是冰镇的，先生，凉极了。”

我咧嘴一笑，坐在了一把椅子上，心里思忖着沃尔夫在干什么。他把一些小纸片裁成了小圆盘状，在写字台记事簿的不同位置上摆来摆去。弗里茨把啤酒拿进来，每次都用一个托盘端六瓶。他跑了三趟后，我看到沃尔夫瞟了一眼桌上的“纸片阵”，又看了一眼弗里茨穿过房门的背影，咧嘴笑了。当弗里茨又端着满满的两大盘啤酒走进来的时候，沃尔夫叫停了。

“弗里茨，你能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能干完吗？”

“很快，先生。还剩十九瓶，总共四十九瓶。”

“废话，哦，抱歉，弗里茨，但很显然这是废话。”

“是，先生。你说在一个地方就能买到各种啤酒，而我却跑了一打商店，至少一打。”

“好吧。把它们搬进来。再拿些清淡的咸饼干来。弗里茨，你应该给每个商店一次机会，不然有失公平。”

沃尔夫一边让我把椅子拉近桌边，一边打开瓶盖，同时向我解释着他的想法。原来是这么回事：如果他能发现一种适于饮用的合法啤酒，他就要戒掉多年来他成桶地买来藏在地下室冷库里的私酿

啤酒。他说他还想明白了，一天喝六夸脱[1]是没必要的，而且太浪费时间，因此他将给自己限量为五夸脱。我咧嘴一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到。当我想象着这地方将怎样七零八落地堆满空瓶子，而这会让弗里茨整天忙个不停时，不禁又笑了。我对他说了些先前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啤酒会使人头脑迟钝，而像他那样饮酒如水，一天六夸脱，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头脑如此敏捷、思想如此深刻，甚至这个国家无人能及的。他也像从前一样回答道，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下面的神经中枢在运转。当我打开第五瓶酒供他品尝时，他继续说道——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他感谢我的奉承并不是侮辱我，因为如果我是真心的那我就是个傻瓜，而如果我是蓄意的那我就是个流氓。

他咂了咂嘴唇，品味着第五种啤酒的滋味，又将酒杯举起，在灯光下审视了一番琥珀色的酒液。“这真是意外之喜，阿奇。我简直不敢相信。毫无疑问这是做悲观主义者的好处。悲观主义者得不到别的，只能得到意外之喜，而乐观主义者也得不到别的，只能得到意外之悲。迄今为止，这条规律颠扑不破。你看，弗里茨在标签上写上了价格，我是从最便宜的一种喝起的。好了，下次就买这种来。”

就是在那一刻，厨房里传来了微弱的嗞嗞声，意味着前门有动静，正是这嗞嗞声开始了一切。不过在那时，还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是德金前来求助。

德金看上去一切都好。一想到他总是那么那么笨，我就很奇怪他居然能干得了盯梢的活儿。我知道好狗不叫的道理，但当个好尾

① 一夸脱等于一点一三六升。

巴却绝不仅仅意味着紧追不放，而弗雷德·德金的确是条不错的尾巴。我曾有一次问他是怎么做的，他说："我只不过是走到跟踪对象面前，问他去哪儿，这样如果跟丢了就知道到哪儿去找。"我猜他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但我百思不解。每当一个案子了结时，从银行家到流浪汉，所有人都会削减开支，沃尔夫也不例外。于是绍尔·潘策尔和我的钱包就会瘪下去很多，而德金则会被彻底停薪。当沃尔夫需要他时，就会把他召来，按日付酬，所以我可以时不时地见到他，并且知道他刚刚过了段苦日子。那阵子情况不大好，直到那天门铃声响起时，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弗里茨领着他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沃尔夫抬眼看了看，又点了点头。"你好，弗雷德。我没欠你什么吧？"

德金把帽子拿在手上走到桌前，摇了摇头。"你好吗，沃尔夫先生？我曾向上帝祈祷你一切都好。如果有谁欠我东西的话，我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他的。"

"坐下吧。想尝点儿啤酒吗？"

"不了，谢谢。"弗雷德仍然站着，"我来是想请你行行好。"

沃尔夫又抬起了头，他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向外努了一点点，又闭紧了，只是一个极微小的动作，然后又努出来又缩回去。我多喜欢看他这么做呀！当沃尔夫的嘴唇像这样动来动去时，我就变得非常激动，不过，也就这点事能让我激动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定是有什么令他感到非常紧急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心急如焚，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在一瞬间毁灭了。然而没有人能真正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他百般解释。不过他从来没把事情说清楚过。有时候，如果他有耐心，也向我解释，我会很快明白他的意

思，不过那是因为我自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所以才能明白的。有一次我曾对绍尔·潘策尔说，这就像你和他共处在一间黑屋子里，此前你们从未见过面，而他向你描述着屋里的一切，突然灯亮了，他所解释的似乎也都听着合理，不过那是因为一切都已展现在你面前，和他描述的也是一样的。

沃尔夫对德金说："你知道我的财务状况一塌糊涂。但既然你不是来借钱的，那我大概会帮你的。是什么事情？"

德金的脸沉了下来。沃尔夫总是搅得他心烦。"再没有人比我更需要借钱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借钱的？"

"没关系。阿奇会说明白的。你还没穷到家呢，你不该带个女人来的。到底是什么事？"

我侧了侧身子，打断了他的话："该死的，他是一个人来的！不管怎样，我的耳朵还好使着呢！"

一丝小小的波纹掠过了沃尔夫庞大的肚子，一般这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逃不过我的眼睛。"当然，阿奇，你的耳朵挺好使。但这儿没什么需要你听的；那位女士离得那么远，什么声响也听不到。弗里茨也没和她说话；但在迎接弗雷德时，他的语调显得格外彬彬有礼，只有口腔肌肉非常放松才能发出那种声音。如果弗里茨是对一位男士那样说话，我会立刻送他去看心理医生的。"

德金说道："那是我太太的一位朋友。她最好的朋友。你知道我太太是意大利人，也许你不知道，不过她确实是。现在，她的这位朋友有了麻烦，或者是她自己认为有了麻烦。我看她快要垮了。玛丽亚不停地求范妮，范妮又不停地求我，然后她们俩又一起不停地求我。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有一次跟范妮吹牛，说你这个家伙简直神了，能发现世界上任何秘密。我太蠢了，沃尔夫先生，可你知道

男人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的。”

沃尔夫只说了一句：“叫她进来吧。”

德金走进了厅里，再回来时前面多了位女士。她身材娇小，但并非皮包骨头，黑头发黑眼睛，一看就是个意大利人，只是没戴披肩。她大概已到中年，穿着粉红色的棉质连衣裙和一件黑色人造丝外套，看上去干净整洁。我拉过一把椅子，她坐下了，面对着沃尔夫和灯光。

德金介绍道：“这位是玛丽亚·马费伊。这位是沃尔夫先生。”

她向弗雷德微笑了一下，露出了几颗洁白的牙齿，然后对沃尔夫说：“我是玛丽亚·马费伊。”她的口音与德金非常不同。

沃尔夫问道：“不是马费伊太太吗？”

她摇了摇头：“不，先生，我没有结婚。”

“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遇到了麻烦。”

“是的，先生。德金先生说你很擅长……”

“直说是怎么回事吧。”

“是，先生。是我的哥哥卡洛。他走了。”

“去哪里了？”

“不知道，先生。这正是我担心的。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他了。”

“他去哪儿了？不，不，这些不是现象，只是事实。”沃尔夫转向了我，“阿奇，继续。”

在他说完“不，不”时，我已经掏出了笔记本。在沃尔夫面前，我比在任何其他场合都更喜欢做这件事，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擅长记录。不过这次倒不怎么费事，这个女人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像我知道该记些什么一样。她迅速而直率地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帕克街一座高级公寓的管理员，自己也住在那里。她哥哥卡洛比她大两岁，

住在沙利文街一间寄宿公寓内。他是一名金属加工匠，据她说是一流的。多年来他为拉思本和克罗斯公司加工珠宝，收人不菲，但因为他好喝两口，时而旷工，所以大萧条来临时，他就成了第一个被开除的人。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四处打短工，花光了他小小的积蓄，从去年冬天开始，他就靠着妹妹的接济过活。大约在四月中旬，他彻底灰心了，决定返回意大利，玛丽亚同意为他置办必要的盘缠；实际上，她还为他预付了轮船票钱。但一个星期后，他突然宣布旅行推迟了。他不肯说为什么，但宣称自己不再需要钱，并且将很快归还向她借的所有的钱，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用离开这个国家了。他从来没有这么健谈过，但关于计划的变更，他闭口不谈。现在他不见了。星期六他曾打电话给她，说星期一晚上她不值班时，他将在他们经常一起吃晚饭的王子大街的意大利餐馆跟她见面。他还欢快地说到时候他会带很多钱来，能够偿还所有欠她的钱，如果她需要，还能借给她一些。星期一晚上她一直等他到十点，然后又去了他的寄宿公寓，那儿的人说他七点多一点儿就出去了，此后再也回没来。

“是前天。”我说道。

我看见德金也打开了一个笔记本，然后他点了点头说：“星期一，六月四日。”

沃尔夫微微摇了摇头。他的下巴一直搭在胸前，安坐如山且漫不经心，他咕哝道：“德金，今天是星期三，六月七日。”

“是吗？”弗雷德瞪大了眼，“哦，是的，沃尔夫先生。”

沃尔夫向玛丽亚晃了晃一根手指。“是星期一？”

“是的，先生，当然，那天晚上我不值班。”

“你该知道那天晚上的。德金，在你的本子上做上注释吧，或者，也许最好是干脆扔了它。你的时间整整提前了十二个月，明年

六月四日才是星期一。”他又转向了那位女士，“玛丽亚·马费伊，抱歉我不得不给你一个令你失望的忠告，去报警吧。”

“我报警了，先生。”她的眼睛里射出了一丝怨恨的光，“他们说他拿着我的钱去意大利了。”

“也许是这样的。”

“哦，不，沃尔夫先生，你更了解情况。你打量过我，你能看出我不会对一个哥哥那么不了解。”

“警察告诉过你你哥哥坐的是什么船吗？”

“他们哪能告诉我啊？他根本没坐船。他们根本没调查，甚至连想都没想。他们只是说他去意大利了。”

“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凭想象办事。不过，我很抱歉我也帮不了你。我也只能猜。我猜是抢劫。那么他的尸体在哪儿呢？还是去跟警察商量商量吧。早晚有一天，有人会帮他们找到尸体的，那时候你的谜也就解开了。”

玛丽亚·马费伊摇了摇头。“我不相信，沃尔夫先生，我就是不相信，而且还有那个电话呢。”

我插话道：“你没提到有什么电话呀。”

她露齿向我微笑了一下。“我应该提到的。快到七点的时候，有个电话打到寄宿公寓里找他。电话在楼下的厅里，那儿的女孩听到了他讲话。他很激动，并且约好七点半时会见什么人。”她又转向了沃尔夫，“你能帮助我，先生。你能帮我找到卡洛的。我学会了表面像清晨的草一样冷酷，是因为我在这帮美国佬堆里待得太久了，可我是意大利人啊，我必须找到我的哥哥，不管是谁害了他，我都要找到那个人。”

沃尔夫只是摇了摇头，而她根本没注意到。

“你一定要帮我，先生。德金说你手头很紧，我还有些钱，我可以付一切费用，也许还能多付些。而你是德金先生的朋友，我是德金太太的朋友，我是范妮的朋友。”

沃尔夫说：“我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你能出多少钱？”

她犹豫了一下。

“你有多少钱？”

“我有，嗯，一千多美元。”

“你打算拿出多少呢？”

“我出——全部。如果你发现我哥哥还活着，我出全部。如果你发现他死了，让我看到他，并看到害了他的那个人，那么我仍然会出一大笔。只是我得先付殡葬费。”

沃尔夫的眼皮慢慢地垂下又慢慢地抬起。我知道这意味着他同意了。我有事向他报告时，经常指望他做出这个动作，却每每落空。他说：“你是个实际的女人，玛丽亚·马费伊。而且，也许，是个自尊的女人。你说对了，我的确有能力帮助你，那是我的天赋，但你刚才没把它唤醒并刺激起来，所以，在寻找你哥哥的过程中它是否能够觉醒，就很成问题了。不管怎样，先要例行公事，费用不会太高的。”

他转向了我。

“阿奇，到卡洛·马费伊的寄宿公寓去一趟；他妹妹理所当然将陪你一起去。见见听过电话的那位姑娘，也见见其他人。检查检查他的房间，如果有任何线索，五点以后随时给绍尔·潘策尔打电话。回来时把所有你认为不重要的东西都带上。”

我觉得他没必要当着陌生人的面这么挖苦我，但我也早就明白了对他的打趣话提出抗议是没用的。玛丽亚·马费伊从椅子上站起

身来，向他致谢。

德金向前迈了一步。“至于说手头钱紧，沃尔夫先生，你知道男人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的……”

我救了他一把。“来吧，弗雷德，咱们一起坐敞篷车走，我可以在半路上把你放下。”

第二章

当我将锃光发亮的黑色大敞篷车停在沙利文街玛丽亚·马费伊告诉我的门牌号前时，我感到了它的恐惧，仿佛它再也没法快乐地存活了——我指的是敞篷车——街上到处堆着垃圾，到处是大喊大叫的意大利野孩子，像黑眼睛的魔鬼一样疯跑着。不过我以前倒是也让敞篷车陷入过更糟糕的境地，例如那次追小格雷夫斯，他两腿间夹着一包绿宝石坐在一辆皮尔斯双人小汽车中。我从新米尔福德一直追到派克郡，在我遭遇过的最大的一场暴雨和一地烂泥中翻越了十几座山。沃尔夫曾命令，敞篷车每次剐蹭后都必须修复得像新车一样，当然这倒也令我很高兴。

又是一座寄宿公寓。不知什么原因它们看上去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五十街的高帽案件中，还是中央公园西边那群诚实的学画画的女孩住的褐砂岩房子，还是沙利文街的这个意大利人窝。当然，会有些小小的差别，例如大蒜味。玛丽亚·马费伊先带我去见了女

房东，那是一个胖胖的女人，双手湿乎乎的，鼻子扁扁的，手指上还戴着戒指。随后我们上楼来到她哥哥的房间。在玛丽亚·马费伊去找那个听过电话的女孩时，我四处打量了一下。这是三楼的一个很大的房间，有两扇窗户。地毯磨损了，家具是旧的，甚至有些破，但房间还算干净，除了我打开窗户想看看敞篷车是否还立着时，从楼下传来了野孩子们嘈杂的叫声，这的确是间不错的房子。两个大大的旅行包堆在一个角落里，其中一个又薄又旧，看来不大中用了；另一个虽然也很旧，却显得很结实。两个包都没有上锁。瘪的那个是空的，结实的包里装了许多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小工具，有的上面还挂着当铺的标签，此外还有一些木片和金属片，以及弹簧之类的小零碎。壁橱中有一套旧衣服、两条工装裤、一件大衣、两双鞋和一顶毡帽。两个窗户之间有一张桌子，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于一个一年多来都靠妹妹的接济过活的男人来说，数量可真不算少，衬衫、领带、手帕、袜子，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零碎，如鞋带、铅笔、照片，还有一个空烟叶盒。上层的一个抽屉里有一束用胶皮带扎起的信件，共十七封，都装在信封里，信封上全都盖着意大利邮戳。同一个抽屉里还散落着一些收据和已付的账单，有一小沓信纸、一些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的纸片，还有一只硬领。桌子上方除了梳子和刷子外，还有一些沃尔夫会说是累赘的东西——五六本书，全都是意大利文的，只有一本上面全是图片；一大堆杂志，是三年来不同月份发行的，但名字都一样：《金属工艺》。右边窗户的角落里有一张带皮原木制成的桌子，桌面上满是刻痕和划痕，桌上放着一把小老虎钳，一个研磨器和减震器，带着一节长得足以伸到电灯插座的电线，旅行包里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工具。我正仔细审视着研磨器，想看看它多久没被使用了，玛丽亚·马费伊领着

那女孩进来了。

“这位是安娜·菲奥雷。”那女人说道。

我走上前和她握了握手。安娜二十岁左右，相貌平平，皮肤像是不新鲜的面团。她那副表情就仿佛还在摇篮的时候就被吓着了，至今都没恢复过来。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并说我听马费伊小姐说星期一晚上马费伊先生外出前，她听见了他接的一个电话。她点了点头。

我转向了那妇人。“我想你一定想回城了吧。安娜和我会相处得很好的。”

她摇了摇头。“我只要在晚饭前回去就可以了。”

我有点儿生气了。事实上是我同意了德金的说法：她是个废物，除了说废话外一点儿用也没有。于是我对玛丽亚·马费伊说，如果她不在场，我和安娜会谈得更好，所以她最好是快些走开，如果有什么需要她听的，沃尔夫会通知她的。她瞟了一眼那女孩，然后向我微笑了一下，就走了。

我拉过两把椅子，让那姑娘坐在我对面，然后掏出了笔记本。

“你什么也不用怕，”我对她说，“你可能得到的最坏的结果就是你将帮马费伊小姐和她哥哥一个忙，而她会给你一些钱。你喜欢马费伊小姐吗？”

她似乎有些吃惊，好像是奇怪居然有人会费心问问她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不过答案是不假思索的。“是的，我喜欢她。她人很好。”

“你喜欢马费伊先生吗？”

“喜欢，当然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他。除非他喝酒了，那时候姑娘家倒是得离他远点儿。”

“星期一晚上你怎么会听到那个电话呢？你知道有人要打

来吗？”

“我怎么会知道有人要打来呢？”

“我不知道。是你接的电话吗？”

“不是，先生，是里奇太太接的电话。她让我去叫马费伊先生，我就上楼去叫了。然后我在餐厅里擦桌子，门是开着的，我就听见他说话了。”

“你能听清楚他说什么吗？”

“当然。”她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神情，“不管是谁打电话，我们全都听得到。里奇太太也听见他打电话了。她听到的和我一模一样。”

“他说了些什么？”

“他先说：‘喂。’然后他说：‘我是卡洛·马费伊，你想要什么？’接着他说：‘这不关你的事，等我见到你时我会告诉你的。’再接着他说：‘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到我的房间里。’后来他说：‘不，我不怕，我可不是个会害怕的人。’里奇太太说她听到的是‘害怕的不是我’，不过她记不大准了。接着他又说：‘我当然想要钱，还想要得更多。’接着他说：‘好吧，七点半在街角见。’接着他说：‘闭上你的臭嘴，我怕什么。’接着他又说：‘好吧，七点半见，我认识那辆车。’”

她停住了。我问道：“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我想当然地以为她会说她不知道，因为玛丽亚·马费伊不知道，然而她立刻答道：“就是以前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

“以前？什么时候？”

“好长时间了。五月份的时候。一天打两个电话。里奇太太说星期一之前总共打了九个电话。”

“你听见过他的声音吗？”

“没有，先生。都是里奇太太接的电话。”

“你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吗？”

“没有，先生。里奇太太感到奇怪时曾经问过他的名字，可他总是说：‘没关系，告诉他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就行了。’”

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有点意思了，也许还涉及钱。不过钱并不吸引我，那是沃尔夫感兴趣的事情，吸引我的是这件事情包含的趣味性。不管怎么说，这恐怕不是一桩简单的抢劫案，卡洛·马费伊也不是一个东河[1]的酒鬼。我决心试着挖出点什么，于是继续和那女孩攀谈下去。我听说沃尔夫很多次都是从谈话中发现线索的，尽管我知道那大都是缘于一种我不具备的感觉，但我仍然认为有不少也是凭借耐心和运气。所以我顺着那女孩的话题又谈了下去。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收集到不少事实，但没一件在我看来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当我听说卡洛·马费伊曾在不同场合公开与两个不同的女人出双入对，并且其中一位还是已婚时，我兴奋了起来；但当我发现这事与那个电话一点关系也没有时，便放弃了。马费伊曾说过要去意大利，但没透露任何细节。他是一个自作主张、从不与人商量的人。除了他妹妹和一个在他有钱时曾偶尔和他吃过饭的朋友之外，再没有人来拜访过他。我细细地盘问了她两个小时，却没看到一丝曙光，不过那个电话还是没让我灰心。最后我对她说：“你在这里待一会儿，安娜。我要下楼去见见里奇太太。”

女房东证实了女孩对电话的陈述，并说她也不知道打电话的是什么人，尽管她也曾好几次试图打听过。我随便问了她几个问题，然后请求她准许我将安娜带回城。她拒绝了，说她不能一个人做晚

[1]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一海峡，在曼哈顿和长岛之间。

饭。于是我掏出了一美元，她又问那女孩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说不能晚于九点。

在她拿走了那一美元后，我对她说："我没法打包票，里奇太太，我们老板问话可不管白天黑夜。不过她肯定会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地回来的。"

我上楼叫了安娜，又拿上了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来到街上时，我看到敞篷车的挡泥板还在，轮子也没瘪，感到了一阵欣慰。

开车回城时，就仿佛悠闲地溜达一般，不想太快回到三十五街，因为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沃尔夫总是在楼上摆弄花草，除非迫不得已，在那两个小时里打扰他可没什么好事。安娜完全被敞篷车震住了，两脚始终缩在后面贴着座位，两手紧紧地按在大腿上。这让我感到很好笑，觉得该对她友好一些，便说如果她能告诉我老板任何有用的事情，我就再给她一美元。六点过一二分时，我将车停在了距哈得孙河不到一条街的那幢褐砂岩房子前。沃尔夫在这里住了二十年，而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我陪他度过的。

安娜没能在那天晚上九点前赶回家。沃尔夫派我到《纽约时报》办公室拿报纸时，就已经过十一点了；而当安娜在报上指出了那篇文章时，午夜也已过了；里奇太太打过三回电话，我在凌晨一点前带着那女孩回到沙利文街时，女房东仍然在门前等着，也许袜子里藏着一把刀。但她一言未发，只是瞪了我一眼。我给了安娜一美元，因为她的确说出了些情况。

我把安娜留在了楼下的办公室里，自己上楼到前花房——也就是日光室，向沃尔夫汇报了情况。他坐在一把大椅子里，用一枝宽八英寸的红色和棕褐色的兰花搔着自己的脖子背后，看上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的确是不感兴趣，对于我从马费伊屋里带回来的那些

纸片和东西看都没看一眼。他承认那个电话可能对破案有帮助，但也看不出他对此有多重视。我竭力劝说他，既然那女孩已经在楼下了，他还是应该见一见，看看能不能问出些情况来。我还带着怨气补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她是我花了一美元才请来的。我还给了女房东一美元呢。"

"那是你的钱，阿奇。"

"不，先生，那是业务开支，应当记在账上。"

我和他一起走向了电梯。我想如果需要他自己爬楼梯的话，他是决不会上楼的，哪怕是去花房。

他立刻开始盘问安娜，问得太精彩了，而五年前我对此还不大欣赏。我说他问得精彩，是因为他问得绝对全面。如果那姑娘真有什么价值，真的知道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有什么明显的遗漏，或者有什么丝毫的感情流露或反应，只要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或对我们有所提示，都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问了那姑娘五个多小时，问她卡洛·马费伊的声音、习惯、衣着、餐食、脾气、进餐礼仪，以及与他妹妹、与里奇太太、与安娜本人，还有任何安娜见过和他有来往的人的关系。他问了里奇太太的情况、两年来居住在那幢楼里的所有房客的情况、所有邻居的情况，以及到那幢房子里送过活计的商人的情况。所有这些问题他都问得轻松悠闲，小心翼翼地不让她感到厌烦。这与我有一次看到的他盘问朗·格雷夫斯的情况大为不同，那天下午他穷追猛打，简直要把朗逼疯了。在我看来，他只从那姑娘身上问出了一个情况，而且还很不充分，只是她承认了那天——星期三——早上从马费伊屋里拿走了一些东西。是从他的桌子抽屉里拿走了一些背后有胶的小纸片，纸片正面印着"露西娅号"

和“菲奥伦扎号”的字样。这当然是轮船行李标签。翻过报纸后我了解到“露西娅号”是五月十八日起航的，而“菲奥伦扎号”则是六月三日起航的。显然马费伊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打算返回意大利，但两次都放弃了。安娜拿走了标签，她说它们的颜色实在太好看了，她想把它们贴在自己装衣服的小箱子上。晚饭是我们三人一起在餐厅吃的，但沃尔夫根本没理安娜，只与我交谈，主要是谈啤酒，不过喝咖啡时他又带我们回到了办公室，又询问起了安娜。他的思路重新回到了饭前，接着原先的话题，他漫无边际地问着一些互不相干、无关紧要的事情。任何先前没见过他像变戏法般找到线索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个疯子兼傻瓜。到十一点时我已经挺不住了，哈欠连天并打算放弃了，令我愤怒的是他竟然没表露出丝毫的不耐烦和泄气。

突然之间，他捕捉到了目标。

“那么马费伊先生从来没给过你什么礼物吗？”

“没有，先生，除了我刚才跟您说过的那盒粉笔，还有报纸，如果您认为那是礼物的话。”

“是的。你说他总是把早晨的报纸给你。是《纽约时报》吗？”

“是，先生。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买《时报》是为了看分类广告。您知道，就是招聘广告。”

“星期一早上他给你报纸了吗？”

“他总是在下午给我报纸。星期一下午，给了，先生。”

“我猜，那天早上的报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没有，先生。”

沃尔夫显然是从她的眼睛里捕捉到了某种微微的闪动，某种我没注意到的轻微动作。不管怎样，他追问了一句。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没有，先生。除了，那剪掉的一块。”

“剪掉的一块？”

“是剪掉的一块。一大块。”

“他经常剪报吗？”

“是的，先生。剪的大部分是广告。也许一直都是广告。我用报纸把脏东西盛走，所以我老得注意那些窟窿。”

“但这次是一大块。”

“是的，先生。”

“那么星期一的报纸上他剪掉的不是广告喽？”

“哦，不，那是在第一版。”

“真的？他以前剪过第一版的文章吗？”

“没有，先生，我敢肯定没有。”

“以前除了广告再没剪过别的？”

“嗯，我不敢肯定，也许只是广告，我想是这样。”

沃尔夫将下巴搭在胸前坐了一分钟，然后转向我说：“阿奇，快到四十二街去，拿二十份星期一的《纽约时报》来。”

我正希望有什么事情能把我从昏昏欲睡中唤醒。这倒不是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我觉得只不过是沃尔夫瞟见了唯一露出些光芒的缺口。我并不抱很大希望，我想他也是如此。但那的确是六月一个怡人的夜晚，天气凉爽，微风习习，令人愉快。当我开车穿城来到百老汇再向北拐弯时，我感到肺里吸满了清风带来的新鲜空气。在时代广场上我看见了一个熟人，警察马沃·多伊尔。他通常是在第十四街干捣毁水泥的活儿。他准许我把车停在百老汇的路边，然后跑步到街对面的《时报》办公楼。戏迷和影迷们正从人行道拥向街

上，寻思着是花两美元看一场话剧，还是花两个钢镚儿看一场尼德克主演的电影。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已经准许那个女孩休息一下了。他让弗里茨又拿了些啤酒来。女孩正啜吸着杯子，仿佛那是一杯热茶，她的上嘴唇边还留着几丝干了的泡沫。尽管我出去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沃尔夫已经又喝了三瓶了。我进屋时他说道：

“我应该告诉你是要城市版。”

“没错，我拿的正是城市版。”

“那好。”他转向了那女孩，“菲奥雷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你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也许会更好。把她的椅子转过去，阿奇，转到那边，转到那张小桌子边上让她喝点儿啤酒。现在把报纸拿过来，别撕破了，我想最好是让它完好无损，就像她第一眼看到时那样。把第二沓拿开，把它们送给菲奥雷小姐，想一想它们将承载的所有那些脏东西吧。给我拿一份来。”

我把一份报纸的第一沓打开，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从椅子上起了起身，俯向报纸，就仿佛动物园里的河马接受喂食一样。我把所有报纸的第二沓抽出来，堆在了椅子上，然后给我自己也拿了一份，浏览起第一版。第一眼看上去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宾夕法尼亚的矿工正在罢工；有三个标题都是关于全国工业复兴总署正在怎样拯救国家的；有两个小男孩乘一条三十英尺的船横渡了大西洋；一位大学校长在高尔夫球场上心脏病突发；一个歹徒被催泪瓦斯逼出了布鲁克林的公寓；一名黑人在亚拉巴马遭到私刑处死；还有某人在欧洲的某地发现了一幅老画。在我看来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那幅在瑞士发现，据猜测是在意大利丢失的画。但是当沃尔夫从抽屉里掏出剪刀后，他剪下的却不是这块，而是歹徒那块。然后他把报纸

放到一边，叫我再拿一份来。我给了他，当我看到他剪下了关于画的那块时，我咧嘴笑了。不管怎么说，我的猜测是排在第二位的。当他要第三份时，我感到有些奇怪了，而当他拿剪刀沿着边缘剪下了大学校长那条消息时，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头也不抬地说："为这条祈祷吧，阿奇，如果真是这条，我们圣诞节时就有安格莱卡姆兰花[1]喽。"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像管理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也为他管着兰花，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位大学校长能与卡洛·马费伊有什么关联。

沃尔夫说："给她看看。"

他将最后剪的那份放在最上面，我却把下面的那份抽了出来，剪的是关于画的那篇文章，是右下角的一大块。当我将它展开在安娜面前时，沃尔夫说道："菲奥雷小姐，请看一看，星期一的报纸剪掉的是这块吗？"

她只瞟了一眼便说："不，先生，是上面的一大块，在这里，我来指给您看……"

我在她触到报纸前就将它抓了起来，扔回到桌子上，然后捡起另一份，在她面前铺开。这回她瞟了两眼，然后说："是的，先生。"

"你是说剪的是这块？"

"就是这么剪的，没错，先生。"

沃尔夫沉默了片刻，继而我听见了他沉重的呼吸声，然后他说："把她转过来吧，阿奇。"我抓住了她坐的椅子的把手，将她连人带椅子一起转了过来。沃尔夫盯着她问道："你肯定吗，菲奥雷小姐，那张报纸就是这么剪的吗？"

---

[1] 沃尔夫酷爱兰花，文中多次出现的兰花品名均为珍稀罕见品种。

“就是这样，先生。我敢肯定。”

“你看见过他剪掉的那块吗？在他的房间里，也许在废纸篓里，或者在他手里？”

“没有，我没看见过。它不可能在废纸篓里，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

“好的。但愿一切理由都能这么肯定。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菲奥雷小姐。你是个好姑娘，又善良，又宽容，又耐心，不像我躲在屋子里不愿见的好多人，你愿意让你的舌头发挥出适当的功效。不过你还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算我求你了。”

那姑娘已经疲惫不堪了，但她还有足够的活力使眼睛里闪出困惑的光芒。她紧盯着他。沃尔夫说道：“就一个问题了。你在卡洛·马费伊的屋里看见过高尔夫球杆吗？”

如果他一直在寻找最大的兴奋点，那么现在他得到了，因为几个小时以来那姑娘第一次缄口不言了。而且这一切发生得这么明显，你会觉得很滑稽。有那么一瞬间那姑娘只是看着沃尔夫，但是问题一问出，她脸上原本不多的色彩一消而散，只剩下一片煞白，她的嘴巴半张着，简直像个傻瓜，随即又浑身颤抖起来。

沃尔夫安静而耐心地等着她。“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突然之间，她紧紧地闭上了嘴唇，铺在大腿上的双手也握成了拳头。“不，先生，”她简直是在喃喃自语，“不，先生，我从来没看见过。”

沃尔夫盯了她一秒钟，然后说道：“很好。非常好。菲奥雷小姐。”他又转向了我，“送她回家吧。”

她根本没想站起来，直到我走过去扳住了她的肩膀。于是她撑着椅子扶手站了起来。他无疑是以某种方式击溃了她，但她似乎并

没有真正被吓倒，只是屈服了。我从椅子背上拿起了她的外衣帮她穿上。当她开始向门口走去时，我转身想同沃尔夫说句话。结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居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千真万确。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一位身家两千万美元的英国公爵夫人在离开这间屋子时，他都懒得起身。但是不管怎样，我不得不说了：

“我跟她说过我要给她一美元的。”

“那你怕是得给她了。”他稍稍抬高了声音向门口说道，“晚安，菲奥雷小姐。”

她没有回答。我跟着她到了厅里，然后领她到外面上了敞篷车。当我们到达沙利文街时，里奇太太正在门外等着，眼里闪烁着怒火，这使我决定不停车做任何客套了。

第三章

当我把车停进车库，走过两条街回到三十五街时，办公室的灯已经灭了。我走上楼梯，看见沃尔夫卧室门缝里还露着一线灯光。我时常纳闷他是怎么把衣服脱掉的，但我知道弗里茨从来没帮过他。弗里茨睡在楼上，与花房隔着一个厅。我和沃尔夫的卧室都在二层，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有自己的浴室和两扇窗户。我在这里住了七年了，这当然是我的家，而且似乎我还会再住七年，甚至二十七年，因为唯一让我动过感情的姑娘另攀高枝了。我也是因此才认识了沃尔夫的，但这故事不该由我来讲，至少不是现在。其中还有一两个疑点有待在将来查清。但是这间房子无疑是我的家。床很大很舒服，有一张桌子，上面有好多抽屉，还有三把椅子，都很宽大舒适。地上还铺着一张真正的好地毯，绝没有一小块脱落，像烤饼上的黄油一样跟着你滑来滑去。墙上挂的画是我自己画的，我觉得选得别具匠心。一幅是弗农山，乔治·华盛顿的家乡；一幅彩色的，画的是

狮子的头；另一幅彩色的是有着青草和鲜花的森林。还有一个大大的相框，里面是我父母的照片，在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们就双双去世了。此外还有一幅叫做《九月的清晨》的彩色画，画的是一位显然没穿衣服的年轻姑娘，长长的头发垂在了前面，不过那是在卧室里。房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个适合居住的好房子，除了床下的那个嵌在墙上的大电铃，它被隐藏得很好。电铃是连接起来的，因而当沃尔夫打开他屋子里的开关后——他每晚都会这样做——如果有人走进厅里到了离他的门五英尺的范围内，或者碰了他的任何窗户，电铃都会响起。电铃也连着花房的所有门窗。有一次沃尔夫曾对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绝对不是个胆小鬼，只是他极度讨厌被别人触摸，或者被迫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做出快速的动作。我一想到他移动时需要的能量，就很愿意相信他了。不知什么原因，我倒从来没对沃尔夫算不算胆小鬼这种问题产生过兴趣，虽然，如果必须要我说出有什么人比我胆子还小的话，那他是绝对跑不了的。

我从办公室里拿了一份报纸上楼。脱了衣服穿上睡袍和拖鞋后，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椅子里，点上了一支烟，将烟灰缸放在手边，把大学校长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它的标题是这样的：

荷兰大学校长倒在了高尔夫球场上

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猝死

朋友们赶到身旁时，他已经咽了气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占了头版整整一栏以及内页的一栏半。此外还有一篇很长的讣告，有很多大人物发表了评论。这消息本身

没什么意思，要不是跟另一个人的失踪有关，倒真是无足轻重。我每天都看报纸，这只是两天前的新闻，而我却根本记不起曾读过它了。五十八岁的荷兰大学校长巴斯托，星期天下午在纽约以北三十英里的普莱森特维尔附近青草地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他们打的是四人对抗赛，另外三人是他的儿子劳伦斯和两位分别叫E.D.金布尔和曼纽尔·金布尔的朋友。在打第四洞时，他突然向前扑倒，脸朝下摔在了地上，挣扎了几秒后就不动弹了。他的球童立刻冲向他，抓住了他的胳膊，但当其他人赶过来时，他已经咽气了。从俱乐部会所中拥来的人群中有一位医生，也是巴斯托的朋友。他和巴斯托的儿子一起将尸体抬上了巴斯托自己的汽车，送回了六英里外巴斯托的家中。这位医生说他是因心脏病突发而死的。

报道的其余部分都是装饰点缀了，全都是关于巴斯托的生平和成就的，有一幅他的照片，还提到他被抬回家时他的夫人怎样崩溃了，而他的儿女们又表现得怎样坚强，诸如此类。我读完第三遍后便哈欠连天了，只好放弃了努力。我能看到的巴斯托之死与卡洛·马费伊之间的唯一联系便是沃尔夫曾问过安娜·菲奥雷是否看见过一根高尔夫球杆，于是我扔掉了报纸，站起身来对自己大声说道："古德温先生，我猜你还没能准备好将这个案子归入结案档案中呢。"然后我喝了杯水，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时，已经将近十点了，因为我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睡足八个小时。当然，沃尔夫是直到十一点才会下楼的。无论何时入睡，他都会在八点钟起床，在自己的屋子里吃早餐，读几份报纸，然后从九点到十一点再在花房里泡上两个小时。有时候，当我穿衣服或洗澡时，会听见打理花草的老霍斯特曼冲他咆哮几句。

沃尔夫对于霍斯特曼，就像裁判员对约翰·麦格劳[1] 一样。并非这位老人真的讨厌沃尔夫，我敢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想他一定是担心沃尔夫早已超限的体重碰倒并压坏了兰花。霍斯特曼对这些花草的爱惜丝毫不亚于我对自己的眼睛。他睡在角落里用挡板隔出的一个小屋中，如果他晚上捧着花草踱来踱去，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我在厨房里吃了一碟腰子和乳蛋饼，喝了几杯牛奶——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吃早餐，所以坚决不肯让弗里茨为我收拾餐桌——然后到码头附近转了转，呼吸了十分钟新鲜空气。接着回到办公室，收拾一下房间，打开了保险柜，为沃尔夫的钢笔灌上了水，就坐在角落里我自己的桌前处理起文书来。沃尔夫的信我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了他的桌上，这是惯例；没有给我的信。我填写了两三张支票，结清了我的开支簿，我花得并不多，因为前一段实在是没什么事。接着我开始浏览花房记录，以确认霍斯特曼的报告是及时的。就在这时，我听见厨房的门铃响了。一分钟后，弗里茨走进门来，说一个叫奥格雷迪的人想见沃尔夫先生。我接过名片看了看，发现这是个我不认识的人。警察局凶杀重案组的很多人我都很熟，却从未见过这位奥格雷迪。我叫弗里茨领他进来。

奥格雷迪非常年轻，从他的气质和步伐可以看出他一定非常热爱运动。他的眼神不大好看，全神贯注又凶狠好斗。看他打量我的方式，你一定会以为我口袋里装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他问道："你是尼禄·沃尔夫先生？"

我坐在椅子里摆了摆手："请坐。"然后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

---

① 约翰·麦格劳（John J.Mcgraw，1873—1934），1891—1900为美国棒球运动员；1902—1932为纽约巨人队经理，在他主持下该队共获十次全国棒球锦标赛冠军和三次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冠军。

"沃尔夫先生将在十九分钟后下楼。"

他皱起了眉头瞪起了眼。"这事很重要。你难道不能叫他下来吗？我送上名片了，我是凶杀重案组的。"

"是的，我知道，没问题。但还是请坐吧。如果我这会儿去叫他，他会拿东西砸我的。"

他坐下了，我继续看花房记录。有一两次我想问他几句话，拿他打打趣，但只需瞟一眼他的脸就足够了。他太年轻了，肯定是一激就恼。在十九分钟的等待中，他就仿佛坐在教堂里，一言未发。

当沃尔夫走进办公室时，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沃尔夫缓步从门口走向办公桌，向我问了早安，要我打开另一扇窗户，然后瞟了一眼来访者。在桌前坐下后，他看了看我放在那里的名片，接着看了看信，像银行出纳员点钱一样用手指迅速地点了点信封的角，然后把信件推到了一边，转向了那位警探。

"你是奥格雷迪先生？"

奥格雷迪上前一步。"你是尼禄·沃尔夫先生？"

沃尔夫点了点头。

"好的，沃尔夫先生，我想要你昨天从卡洛·马费伊房中拿走的那些纸件和其他东西。"

"不！"沃尔夫抬起了头，想更好地看看他，"真的吗？那太有意思了，奥格雷迪先生。请坐吧。阿奇，给他拉一把椅子过来。"

"不了，谢谢，我还有事。我只想拿走那些纸，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

"你拿走的东西。"

"列举几样。"

警探抬起了下巴。"别开玩笑了，快点吧，我很着急。"

沃尔夫竖起一根手指头向他晃了晃。“好说，奥格雷迪先生。”沃尔夫的声音又低又清楚，用的是一种他很不大常用的语气。他只对我用过一次这样的语气，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而我始终没有忘记他那样的声音，就仿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连手都不抬就让我人头落地似的。他又继续用这种语气说道：“好说。坐下吧。我说话算数，真的。坐下吧。”

我将一把椅子推到了警探的身后，他慢慢地坐下了。

“你将上一堂免费但很有价值的课，”沃尔夫说道，“你还年轻，会对你很有用的。自我进了这间屋，你就一直在犯错误。你没有礼貌，令人生气。你说的话与事实相反，非常愚蠢。你将推测与已知的情况相混淆，缺乏诚意。你愿意听听我来解释该怎样做吗？我的动机完全是友好的。”

奥格雷迪眨了眨眼。“我不是有意冒犯您的——”

“好的。你当然一点儿也不知道，觉得我跑到卡洛·马费伊的住处去是多么没头脑；你不了解我的习惯，不明白我决不会干这种事，哪怕是奖励我一枝德嘉利亚兰花。我当然不会去找什么纸，或者像你所说的——东西。阿奇·古德温，”他用一根指头朝着我的方向画了个圈，“不在乎这种事情，所以他去了。你该做的应当是这样：首先，当我向你道早安时要回答我；其次，要彬彬有礼、完整而符合事实地提出你的要求；最后——尽管这点不那么重要，你也许应当表现出一点职业礼仪，简短地通知我遭到谋杀的卡洛·马费伊的尸体找到了，并经过了鉴定，因此需要这些文件来协助找到凶手。你是否同意这样做会好一些呢，奥格雷迪先生？”

警探瞪大眼睛盯着他。“你怎么会——”话出口后，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那么这事已经见报了。我没看报，不过他的

名字不会披露的，因为我也是两个小时前才知道的。您真会猜，沃尔夫先生。”

“谢谢。我也不是从报上看到的。不过既然玛丽亚·马费伊报警说他哥哥失踪了，都没能唤起警察猜测一番的兴趣，那么在我看来，恐怕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谋杀更能让他们如此狂热，以至于发现阿奇去过他的房间还拿走了一些纸。那么，你是否介意告诉我尸体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奥格雷迪站了起来。“您今晚就能读到消息。您真是个神人，沃尔夫先生。现在给我那些纸吧。”

“当然。”沃尔夫一动没动，“不过有一点我要请你考虑。我向你要的只是三分钟的时间，以及一些几个小时后就能从公共信息渠道得到的信息。然而，谁知道呢？也许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明年，关于这件案子或其他案子，我碰巧了解些稀奇的小小事实，告诉了你却意味着提升、荣耀和加薪呢。不过，我重复一遍，如果你忽略了职业礼仪，你就要犯错误。那具尸体是否恰好是在韦斯特切斯特郡发现的？”

“天哪，”奥格雷迪说道，“要不是我刚刚见识过您的本领，要不是很明显您只能坐着载重汽车出行，我简直要怀疑这事是您干的了。没错，是在韦斯特切斯特。在斯卡斯代尔城外三英里，离一条肮脏的道路一百英尺的灌木丛里。昨天晚上八点，两个逮鸟的男孩发现的。”

“是枪杀吗？”

“是刀捅的。法医说刀子一定是在他体内停留过一段时间，大概是一小时吧。不过尸体被发现时刀子已经没有了，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他的口袋是空的。衣服上的标签表明那是在格兰德街的一家商

店买的，他的洗衣店标签是今天早上七点送到我这里的。九点钟时我知道了他的名字，然后我就搜查了他的屋子，并见过了房东太太和那个女孩。”

“很好，”沃尔夫说道，“实在是太好了。”

警探皱起了眉头。“那个女孩，”他说道，“要么是知道些什么事情，要么是脑袋进水了，她居然记不起她早餐吃了些什么。您把她接到这里来过，那么您怎么看呢？她一点儿也记不起那个电话了，而房东太太说她听见了每一个词。”

我瞟了一眼沃尔夫，而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只是说道：“安娜·菲奥雷小姐没有充分准备好应对这一变故，奥格雷迪先生。那么你发现她的记忆出了问题喽？”

“岂止是出了问题，她连马费伊的名字都忘了！”

“哦，真可怜。”沃尔夫动了动放在桌子边上的手，并向后挪了一下椅子。我猜他是想站起来。“现在给你那些纸。除此之外只有一个空烟盒和四张快照。请你原谅，能否请你跟古德温先生出去一下？这只是个人习惯：我很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打开我的保险柜。当然我丝毫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即使你是银行职员也一样，我甚至还会更苛刻一些。”

我追随沃尔夫这么久，通常都能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但这回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我张开了嘴，本想说那些东西在他桌子抽屉里，我昨晚是当着他的面放进去的，但他的表情阻止了我。那警探有些犹豫，沃尔夫又坚定地对他说：“请吧，奥格雷迪先生。你没必要猜测我是在为抽出几样东西创造机会，因为即使我想那样做，你也没法阻止。专业人士之间产生这种怀疑是徒劳无益的。”

我领着警探到了前屋，把门在我们背后关上。我想沃尔夫会摆

弄摆弄保险柜门，让我们听到点声响的，但为了防备他连这点麻烦都不肯付出，我有意与奥格雷迪搭了搭讪，以免他的耳朵闲着。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叫了回去。沃尔夫站在桌子旁，手里拿着烟草盒以及我用来装那些纸和快照的信封。他把它们递给了警探。

“祝你好运，奥格雷迪先生。我向你保证，而你无论如何都应当相信我的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现了任何我们认为对你有意义或有帮助的情况，我们都会立刻与你联系的。”

“非常感谢。希望您说话算数。”

“是的，我说到做到。”

警探走了。我听到外面的大门关上后，跑到前屋，透过窗户看着他走远。然后又返回办公室，走近沃尔夫的桌子。他又坐下了，我咧嘴笑着对他说：

“你真是个无赖。”

他脸颊上重重叠叠的肉自嘴角处起向两边扩散了一点。他这样做时一定是认为自己在微笑。我问道：“你留下了些什么？”

他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了一片两英寸长、半英寸宽的报纸，递给了我。这是从马费伊写字台最上层的抽屉里取回的剪报之一，天知道沃尔夫是怎么知道它的存在的，因为昨天晚上他对这些东西连瞟都没瞟一眼。但他不厌其烦地把奥格雷迪支出了屋子，以便把它留下。

> 招聘金属加工匠，必须既精于设计，也有娴熟的手法，愿意返回欧洲永久定居，待遇优厚。时代广场中心区 L467 号。

我看了两遍，但没觉出与昨天下午第一次在马费伊房里看到它

时有什么不同。我说："好吧，如果你想确认他曾打算漂洋过海，我可以再跑一趟沙利文街，把那些行李签从安娜的衣柜里撬出来。不过，就算这纸片很重要，可你是什么时候看见它的？你可别跟我说你不用眼睛就能看见东西。我发誓你不能……"我停住了。是的，他当然是看过的。我冲着他笑了。"昨天晚上在我送安娜回家时，你看了那些东西。"

他直到走回桌旁，重新坐进椅子里，才嘲讽般地咕哝了一句："聪明，阿奇。"

"好了，"我坐在他对面，说道，"我可以问问题了吗？我有三件事想问。不过我猜，我也许该到前屋去做功课？"我有些恼火，当然了，每次当他了然于胸时，我都还蒙在鼓里呢。

"没有功课，"他说，"你需要发动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去一趟怀特普莱恩斯。不过，如果你的问题简短的话——"

"它们不可能更简短了，不过，如果有事情要办，我可以以后再问。既然是去怀特普莱恩斯，我想我应当去看看马费伊的伤口，以及其他在我看来不重要的细节。"

"不。该死的，阿奇，别再当着我的面胡猜了，如果最终你不可避免地要与奥格雷迪先生之类的人为伍。让我们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吧。"

"奥格雷迪今天早上干得不错，才用了两个小时，从衣服标签、洗衣店标签，到那个电话，就都查清了。"

沃尔夫摇了摇头。"一个脑筋有问题的傻瓜。不过，你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等。如果不是为了马费伊，要我到怀特普莱恩斯去做什么？"

沃尔夫又向我做了一遍他那个替代微笑的动作，只是这次持续的时间非同寻常地长。最后他说道："一个发点小财的机会。如果你不翻档案，能记起弗莱彻·M. 安德森这个名字吗？"

"希望如此。"我哼了一声说道，"你也不用感谢我的聪明了。一九二八年，在戈德史密斯一案中，他担任助理检察官。一年后调到了乡下，现任韦斯特切斯特郡检察官。他只有在关起门来对你耳语时才会承认欠你些什么。你去发财吧。"

沃尔夫点了点头。"完全正确。你的确很聪明，阿奇，不过我能做到不感谢你。你将到怀特普莱恩斯去见安德森先生，给他带去一个很刺激的，也许是很诱人的口信。至少这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正在等一位来访者给我带来消息，他可能随时会来。"他的手经过他那圆滚滚的身躯，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块巨大的铂金表，看了一眼，"我发现送货工的信用简直为零。我是九点钟打的电话，他十一点怎么也该送到了，而现在都十一点四十了。当前的确需要消灭一切可以避免的延误。当初如果派你去就好了——啊哈！"

门铃响了。弗里茨出门穿过了大厅，接着传来了打开前门的声音，随后响起了一个与弗里茨问答的说话声，继而沉重的脚步声淹没了弗里茨的声音，一个像足球运动员一样的小伙子出现在了门口，肩上扛着一个三英尺长、足有沃尔夫本人那么巨大的包。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是科利斯·霍姆斯商店的。"

沃尔夫点了点头，我上前帮忙。我们把包卸在了地板上，那小伙子跪在地上开始解绳子。他笨手笨脚的，半天都没解开，我有些不耐烦了，伸手到口袋里去掏刀子。沃尔夫在椅子里咕哝道："不，阿奇，这点绳结用不着拿刀子。"我又把刀子放了回去。他终于把绳子解开了，我帮他一起把纸和麻布展开，然后站起身来。我看了一

眼沃尔夫，又看了看地板上那堆东西。那不是别的，是一堆高尔夫球杆，少说也有一百根，我想这些足够杀死一百万条蛇的，因为在我看来，用它们打蛇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对沃尔夫说："这种运动对你会有好处的。"

沃尔夫依然坐在椅子里，叫我们把球杆抱到桌子上去，于是我和那小伙子一人抱了一大摞。我把球杆平摊在桌子上。它们有长有短，有重有轻，有铁的，有木头的，有钢的，有铬的，有你能想象出的一切。我每放下一根，沃尔夫都要看一看，看了十二根后，他说："不是这些铁梢儿的，把它们拿开。只要那些木梢儿的。"然后他问那个小伙子，"恐怕你们不管它们叫梢儿吧？"

那小伙子看上去很诧异，随即傲慢地说："那叫头儿。"

"抱歉——你贵姓？"

"我？我姓汤森。"

"抱歉，汤森先生。有一次我的小汽车车胎瘪了，我去商店换车胎的时候，才在橱窗里看到过一次高尔夫球杆，但是那梢儿上没贴标签。这些是某一个种类中的所有样式吧？"

"啊？它们可全都不一样呀。"

"哦，是的，是的，是的。木头的平面，嵌入面是骨头的；成分是象牙的——既然这个叫头儿，我猜那就叫面儿了？"

"是的，那叫面儿。"

"当然。那么这个嵌入面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兰花文化之外，生活中的一切都必有目的。"

"目的？"

"没错，目的。"

"嗯，"那小伙子踌躇了一下，"当然是为了冲力。那是用来击球

的，用嵌入面击球就是为了有冲力。”

“我明白了，不用再多说了。这样是挺管用。还有这杆柄，有些是木头做的，的确是又精致又灵敏，还有钢做的——我猜这些钢柄是空心的吧？”

“空心钢杆，是的，先生。这要看个人的喜好了。这种球杆是发球用的。这样的是铜头二号球杆。您看见底部镶的铜皮了吗？所以是铜头球杆。”

“完美无缺的推理，”沃尔夫咕哝道，“那么，我想，这就够了，我知道这么多就可以了。你知道，汤森先生，人天生及后天养成的迫切需求使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变得势利，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不懂这些特殊的术语，这为你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而你不懂基本的思维方法，又为我提供了机会。至于你来的目的嘛，我不能买你的任何东西，这些球杆对我来说永远是毫无用处的。你可以把你的球杆重新装起来，全部拿走。不过让我们假设一下，我应当购买三根球杆的，那么每根球杆的利润应当是一美元。总共三美元，对吧？如果我给你三美元，你满意吗？”

那小伙子即使不为自己的尊严，至少也要为了科利斯·霍姆斯商店的尊严。他说道：“先生，您不是一定要买的。”

“不，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事要求你。你能拿一根球杆，嗯，这根吧，站到那里，站到椅子后面，然后用正规的方式旋转它，行吗？”

“旋转它？”

“是的。拿着球杆，击，打，随你怎么叫。假设你要给球一股冲力。”

这回就不止是势利了，那小伙子根本无法掩饰他的轻蔑。他从

沃尔夫面前拿起了球杆，退后几步，将椅子一把推开，然后四下望了望，向后引杆，抬杆，然后嗖的一声将杆挥过肩膀向下沉去。

沃尔夫一阵战栗。“真是锐不可当，”他咕哝道，“再来一遍，慢一点。”

那小伙子遵从了。

“汤森先生，还能再慢一点儿吗？”

这回他像个滑稽的卡通人物一样，来了个慢动作，但沃尔夫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然后说道：

“很好，万分感谢，汤森先生。阿奇，既然我们在科利斯·霍姆斯商店没有账户，你能给汤森先生三美元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快一些。我刚才要请你办的那件差事非常急迫，现在看来更是刻不容缓了。”

在一连好几个星期无所事事后，一听到沃尔夫要求快些，我的心跳立刻加剧了。我和那小伙子立刻将球杆重新装好，我领着他出了前门，又返回办公室。沃尔夫坐在那里吹口哨，可是在六英尺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你只是看到他的胸脯在一起一伏，才知道有空气在进进出出。有时候，当我离他足够近时，我曾努力想听一听他是否当真要吹出什么曲调，但都没有成功。他一看见我进来，就停住了口，说道：

“我只讲一分钟，阿奇。坐下吧，用不着拿笔记本。”

第四章

我开车时除了路几乎不看别的，因为我只能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那天我开得很快。因为堵车，到达伍德朗费了不少时间，但从那里到怀特普莱恩斯，我的表显示只用了二十一分钟。尽管我全神贯注，尽管我开得很快，我仍然用眼角欣赏了路旁的绿化带。很多灌木丛上已经开满了鲜花，新生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翩翩起舞，青草又绿又密。我心想就算是花一万块钱买块地毯，也不及在这草地上漫步舒服。

我的神速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当我赶到郡政府大楼时，什么也没捞到，除了坏运气。安德森出去了，四天以后，也就是星期一，才能回来。他们说他去了阿德隆达克斯，却又不肯告诉我详细地址。假如当时我径直开上敞篷车，加速前往普莱西德湖，也就不至于有那些不快了。他的首席助手叫德温，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他这会儿也出去吃午饭了，半个小时内不会回来。周围的其他人看来没

有能帮得上忙的。

我走到街上找了部电话打给纽约的沃尔夫。他说等德温回来试试。在等他回办公室的这段时间，我吃了几块三明治，喝了一杯牛奶。当我返回时，德温已经在办公室里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又等了他二十分钟，我猜是要等他剔完牙。这地方真是麻木不仁。

我一想这地方与我以前见过的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就觉得这样想太傻了，不知何故所有律师在我看来都是一样，都是一种恐惧和满足的表情的混合，就仿佛他们正在穿过一条交通拥堵的街道，随时有可能被车撞倒，但他们知道一旦被撞该把哪份文件交给司机，而他们口袋中恰好备着这样一份文件。这位德温看上去正是如此，否则他就会显得衣着优雅、保养极佳，令人肃然起敬。他四十岁上下，只会比这年轻而不会更老。他的黑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脸上是一副幸福愉快的表情。我将我的巴拿马草帽放在他的桌角，拉了一把椅子坐下，然后说道：

"我很遗憾不能见到安德森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对我带来的口信感兴趣，但我相信他会的。"

德温将身子向椅背上一靠，脸上堆出了一副政客的微笑。"如果与我们的业务有关，我当然会感兴趣的，古德温先生。"

"当然有关。但你不认识我的雇主尼禄 · 沃尔夫，那对我就不大有利了。安德森先生认识他。"

"尼禄 · 沃尔夫？"德温的前额起了皱，"我听说过他。一个私家侦探，当然你是这意思。这里只不过是怀特普莱恩斯，这个省实际上是从北边一点开始的。"

"是的，先生。我不把尼禄 · 沃尔夫称为私家侦探。这种说法嘛——嗯，至少是太主观了一点儿。不过我是为这个人工作的。"

“你替他带了个口信？”

“是的，先生。正如我说过的，口信是带给安德森先生的，不过半小时前我给沃尔夫先生打过电话，他说告诉你也可以。但我想效果也许大为不同，因为我碰巧知道安德森先生是个有钱人，而我对你不了解。也许你像我一样，也许你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是要靠工资过活的。”

德温大笑起来，不过只是一种假笑，因为才过了一秒钟他的脸就又严肃起来，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也许是这样。不过尽管今天下午我的精神不那么好，但我还是愿意听听你的口信。”

“好的，先生。是这样的，四天前，也就是上星期六的下午，荷兰大学校长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在青草地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死亡。你知道这件事吧？”

“当然。这是学界的损失，实际上是全国的损失。当然。”

我点了点头。“他的葬礼是星期二举行的。他被埋在了阿格沃克公墓。尼禄·沃尔夫先生想和你打个赌。他本来是要和安德森先生打赌的，但他说你也可以——如果你们把尸体挖出来进行尸检，你们会发现他是被毒死的证据。沃尔夫先生愿意押一万美元，可以把支票存在你指定的任何负责任的人手里。”

德温瞪大眼睛盯着我，我只是对他微笑着。他盯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尼禄·沃尔夫先生疯了。”

“哦，不，”我说道，“不管你打什么赌，都千万别打这个赌。我还没说完尼禄·沃尔夫先生的条件呢。在巴斯托腹部的某个地方，很可能就在胃下方，皮下一到三英寸处，会发现一根很短、很尖、很细的针，可能是钢的，也可能是很硬的木头的。如果没有被骨头改变方向的话，它应该指向上方，大约呈四十五度角。”

德温一直盯着我。当我讲完后，他又搬出了他的假笑，不过这回显然毫无意义。“这是我听过的最大的笑话，”他说，“如果你们没有发疯的话，我猜一定有点根据喽。”

“当然有根据。”我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了沃尔夫给我的那张支票，“世界上恐怕没多少人愿意拿一万块钱为笑话冒险，你可以相信我，尼禄·沃尔夫也不是那样的人。彼得·奥利弗·巴斯托是被谋杀的，他的体内还留着那根针。我这么说，尼禄·沃尔夫也这么说，这一万块钱也这么说。这就是充分的证据，德温先生。”

这位律师看上去不再像我刚进来时那样愉快和得意了。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又坐下了。我静观其变。他说道：“荒唐，实在是荒唐。”

“沃尔夫赌的可不是这个。”我咧嘴笑道，“他赌那是真的。”

“但不可能，这太荒唐了，而且——耸人听闻。不管你们想要什么把戏，你们找错人了。我碰巧和巴斯托一家很熟，所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必向你们详述。哼，何其荒谬的胡话。你知道是谁在死亡证明书上签的字吗？我不认为……”

“当然知道，”我插话道，“是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他说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症。但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像他那样，即使他们都说是冠状动脉血栓症，尼禄·沃尔夫的这笔钱仍然要在这里发言。”

我看出了德温脸色的变化。他已经摆脱了震惊，开始想表现得聪明一些。他的声音严厉起来：“看着我，你到底想要什么花招？”

“根本没有花招，没有，只是想赢一万美元。”

“给我看看那张支票。”

我将支票递给他。他仔仔细细地审视了半天，然后拽过桌上的

电话，拿起听筒说道："里特小姐，给我接大都市信托公司三十四街分部。"他坐下后继续看着支票，我则将双臂抱在胸前，耐心地等着。铃声响后他重新拿起电话开始问问题，问题可真不少，无疑他想确保万无一失。当他将听筒挂上后，我愉快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开始了。现在你知道你手上拿的是真正的美元了。"

他根本没注意我在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对着支票皱着眉。最后他用一种精明的语气说道："你当真是得到了授权，将这笔钱押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假设上吗？"

"是的，先生。这张支票是开给我的，并得到了确认。我可以保证是这样。如果你想给沃尔夫打电话，号码是布赖恩特九二八二八。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建议请你的打字员来打一份详细的备忘录，由我们共同签字。我还要告诉你，沃尔夫已表示过不会提供任何理由、建议或线索，也不会讨论此事。这就是一次打赌，就是这样。"

"打赌，见鬼。你别指望打任何赌。你想跟谁打赌，韦斯特切斯特郡吗？"

我咧嘴一笑。"我们本希望和安德森先生打这个赌，但既然他不在，我们也不是非找他不可。任何能出得起一万美元的人都行。沃尔夫不在乎对手是谁。无论是一位警官，一位报纸编辑，还是一位有强烈公民义务感的著名民主党人，什么人都可以。"

"当真？"

"是的，先生，当真。我得到的指示是尽力在天黑前达成协议。"

德温站起身来，将椅子向后一踹。"哼，打赌。别诈唬了。"

"你这么认为吗，先生？那你就试试吧。从我这儿试试吧。"

他很显然作出了某种决定，因为他走出了屋子。到门口时他转

身说道："你能在这里等我十分钟吗？我想你会的，因为你的支票在我口袋里。"

他没等我点头就出去了。支票上没有签字。我安静地坐下等待，心中思忖着，事情会怎样发展呢？我是否操之过急了？如果他比我想象的还固执，我刚才是否不发出那最后的威胁为好？我怎么能逼他那么快地采取行动呢？最重要的是，这个三流人物是否有权力和胆量在他的老板不在时，采取那样的行动呢？沃尔夫想要的就是迅速采取行动。我当然知道他根本不指望打什么赌，就像我不指望他在我生日时送我一万美元一样。他想要的就是验尸，找到那根针。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他怎么猜出有那根针，以及他怎么一下子就把它和卡洛·马费伊联系了起来。我停止遐想，让思绪又回到当下的任务上来。如果德温放弃努力，跟我装死，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在四点到六点之间我只能自作决断，当沃尔夫在楼上侍弄那些该死的花草时，我可不敢打电话去打扰他。现在是两点五十。德温已经出去了十分钟了。我开始感到自己在犯傻了。假如他把我晾在这里一下午怎么办？那张支票还在他手里呢。如果我让这样的三流货色给耍弄了，我就再没法去见沃尔夫那张大肥脸了。我真不该让他拿着那张支票离开我的视线。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是到门口时我又冷静下来，放松了心情。我轻轻地扭动把手拉开门，将头探了出去。外间办公室之外还有个小巧的厅，我听见一个姑娘正在接电话。

"不，接线员，只能与安德森先生直接通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我一直等她挂上电话，才出去走到她的桌前。"你方便告诉我德温先生去哪里了吗？"

她好像对我很感兴趣，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但她的回答足够直

率：“他在安德森先生的屋里打电话。”

“你不会是例行公事，在骗我吧？”

“我没必要例行公事，谢谢。”

“好吧。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这儿坐会儿。一个人坐在里面可不好受。”

我坐在了离大门三英尺的地方，当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衣黑鞋的壮汉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时，立刻高兴起来。他从我面前走过，径直到了那姑娘的桌前，背对着我，很容易看出他的屁股后面插着把枪。那姑娘说道：“你好，库克先生，德温先生在安德森先生屋里。”等那人从另一扇门出去后，我问那姑娘：“这位是本·库克？”她看都没看我就点了点头。我咧嘴一笑，又坐下来等着。

又过了一刻钟，安德森的房门才打开，德温出来招呼我：“到这儿来，古德温。”

我走进屋里，看到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受审的位置，不由得大笑起来。本·库克拉了把椅子坐在办公桌前的另一把椅子旁——那把椅子无疑是德温的——给我留的椅子在他们和灯的对面，离得不远。

“很好玩，是吗？哼！”那壮汉咕哝道。德温一言不发，直到回到座位上，才向我通报说：“这位是警长。”

我假装对灯眨了眨眼，说道：“不用告诉我了。你难道认为本·库克的名声仅限于布朗克斯公园吗？”

德温对我板着脸。天哪，真是太滑稽了。更过分的是，他还伸出一根指头向我晃了晃。“古德温，我刚才忙了半个小时，现在我要告诉你接下去该怎么办。你要告诉我们你知道的一切，同时我们在这里等着沃尔夫。你们有什么理由……”

我并不想中断他的表演，但我实在忍不住说道："你们等沃尔夫？在这里？"

"当然，就在这里，如果他识相的话。我想我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忍住没笑，只是说："听着，德温先生，今天是你的不幸日。你一生都没有机会打这么好的一个赌了。尼禄·沃尔夫不可能来这里，正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谁杀了巴斯托一样。"

"是吗？"这回是本·库克说道，"你必须向我坦白。充分坦白。"

"也许。不过我不能告诉你是谁杀了巴斯托，因为我也不知道。现在如果你们想问问路的话，例如——"

"别废话了。"德温越发严厉了，"古德温，你以最耸人听闻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指控。我不打算假装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因为很显然我没有根据。我只有一个问题，我希望得到一个迅速而完整的回答。你的雇主今天派你来，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

我叹了口气，表情庄重起来。"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德温先生，只是为了打一个赌。"

"行了，正经一点儿吧。你这样说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一点你完全清楚。好了，跟我们说实话吧。"

本·库克说道："别想要滑头。如果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滑头，你会非常意外的。"

我想，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把这游戏玩下去，但时间不允许了，而且他们刺痛了我。于是我说："请听我讲一分钟，先生们。你们无疑是生气了，这很糟糕，但我爱莫能助。

如果我对你们说见鬼去吧，然后站起身来走出这间屋子，你们会怎么办呢？是的，警长，这儿离警察局不远，但我不会去那儿的。说句实话，你们俩就像一对白痴。我真对你感到吃惊，德温先生。尼禄·沃尔夫先生本来给你提供了一次成大事的机会，而你先是泄露给了本·库克，接着又逼着我把这个机会从你们俩身边撤走，投入狼群。你们别想碰我，别犯傻了。尼禄·沃尔夫将很愿意打一场非法拘留官司的，我除了拜访朋友，从来不去警察局，除非你们能向我出示逮捕证，并且，请想一想，当记者们知道了我的遭遇以及随之揭晓的巴斯托被谋杀的证据后，该会多么有趣啊。实际上，我已经感到有些痛心了，我开始考虑把那张支票要回来，从你们这里走出去了。请记住，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明白吗？现在，你们要么给我那张支票，要么变得讲理一些。”

德温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胸，紧闭着嘴唇看着我。本·库克说道：“那么你到乡下来，是想教训教训乡巴佬喽？宝贝，只要我愿意，什么也不需要，就能把你带进警察局。而这正是我想做的。”

“但愿你能承担得起你傲慢的代价，”我对他说，“德温把本该由他发射的炮弹交到了你手上，你明白这一点。”我又转向了德温，“你给纽约的什么人打了电话？总部吗？”

“不，是郡检察官。”

“你找到他了吗？”

德温将双臂摊开，身子向后一靠，无助地看着我。“是莫利接的电话。”

我点了点头。“迪克·莫利。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跟我说，如果尼禄·沃尔夫想出一万美元打什么赌，不管他喜欢与否，如果我肯再出一千美元加上他的话，他输了愿意给我十

倍的钱。”

我太痛心了，以至于笑不出来。我说：“然而你仍然邀我到这儿喝茶，而不是拿起铁锹直奔阿格沃克公墓。我再重复一遍，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沃尔夫也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情。但如果你们想掌握一些确切的情况的话，那就必须立刻行动了。接下去的事情便是你得还给我那张支票。再接下去呢？”

德温长叹一声，然后清了清嗓子，然后不得不又清了一次。“古德温，”他说道，“我坦白地对你说，这事我干不了。我不愿意公布出去，本，但这是事实。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仁慈的主啊，你们难道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把彼得·奥利弗·巴斯托挖出来验尸？”

我插话道：“笑话。至少有一打充分的理由。”

“好吧，也许我不善解释。不管怎么说，我认识那一家人。我做不了这事。我给普莱西德湖的安德森打了电话，但是找不到他。不过我会在六点前找到他的，最晚七点之前肯定能。他可以坐一趟卧铺车明天早上赶回来，然后由他来决定吧。”

“那就是说今天不行喽？”我说。

“是的，事不凑巧，我不会做那件事的。”

“好吧。”我站起身来，“我要到街角去给沃尔夫打个电话，看看他是否愿意等那么久。如果他说可以，那我就要南下离开乡巴佬们。不过也许我该要回那张支票。”

德温从口袋里掏出了支票递给了我。

我对本·库克咧嘴一笑：“警长，愿不愿意搭我的车回警察局？”

“滚吧，宝贝，滚吧。”

第五章

沃尔夫那天晚上情绪非常好。我回到家时还赶上了和他一起吃晚饭。他不让我说任何关于怀特普莱恩斯的事情，直到晚饭结束。实际上，我们根本没进行任何谈话，因为他一直在听收音机。他时常讲对于久坐不动的人来说如今是个美好的时代，因为以往这样的人想满足对过去事情的好奇心，可以坐下来读吉本[1]、兰克[2]、塔西佗[3]等人的书，但如果想要了解当代人的情况，就只能上马路；而今天的人，在厌倦了加尔巴[4]和维特利乌斯[5]时代的事情后，只需回到椅子上打开收音机就可以了。沃尔夫从不错过的节目之一是“快乐男

---

① 吉本（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

② 兰克（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著有《教皇历史》等。

③ 塔西佗（Tacitus，56—120），古罗马官员和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和《编年史》。

④ 加尔巴（Galba，公元前3年—69年），罗马皇帝。曾举兵反对暴君尼禄，后为近卫军所杀。

⑤ 维特利乌斯（Vitellius，15—69），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罗马皇帝，同年年底即在内战中战败被杀。

孩”。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听的时候，手指交叉放在肚子上，眼睛半闭着，嘴也嚅动着，仿佛有什么东西随时会吐出来。通常在那个时候我都会出去散会儿步，但如果离晚饭还有段时间的话，我自然也会跟着听一会儿。我也喜欢听广播，不过“快乐男孩”在我看来实在是太俗了。

晚餐后在办公室里的汇报没有花多长时间。我后悔向沃尔夫道了歉，因为他情绪那么好，对我的道歉完全无动于衷。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我的举动无可挑剔，事情没成完全是形势不利，他就是这么说的。对于我的报告和道歉，他没作任何评论，甚至都不大感兴趣。我竭力想让他打开话匣子，例如想让他说出他是否真的想骗郡检察官来打一场一万美元的赌，但他只是愉快而安静地坐着。我问他是否认为我有可能采取某种措施说服德温在那天下午就开始掘墓。他说恐怕不可能。

“青蛙飞不了。”他坐在桌前，用放大镜仔细研究着霍斯特曼自枯萎的茎部拔下的一棵亚历山大兰花的蕊喙，“他需要有一点想象力，只需要一点点，但我从你的描述判断，他没有。我求你不要再责备自己了。这件事情最终也许会毫无结果。如果弗莱彻·M．安德森在，情况就不同了。他是个有职业雄心的有钱人，脑子也不笨。也许他会很容易就明白过来，如果悄然无声地验了尸，证明我错了，他就能赢一万美元；如果证明我对了，他得给我钱，但他会因此拿到一件引人注目、激动人心的大案而得到回报，而且他也许还能推测出我在这笔钱进了口袋后，还会向他提供进一步的情报。你到怀特普莱恩斯的这趟差事实际上就是一桩初级的商业行为：提出以一物换另一物。如果安德森先生在的话，他也会这样认为的。交易还没达成，还值得再付出些小小的努力。不过我看就快要下雨了。”

“你想干什么，转变话题吗？”尽管我感到自己被当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讨厌鬼，因为我有这么多的问题要问，我还是紧挨着他桌旁的椅子，问道：“我进门时就已经阴云密布了。这场雨会浇灭你所有的线索吗？”

他仍然伏在放大镜上，不动声色。“阿奇，如果有朝一日我觉得你再也不值得我包容了，你就不得不去娶一个智力极其低下的女子，那样你才能得到一位合适的听众，来听你这些低劣的风凉话。我提到雨时，心里想的是你本人的方便和舒适。今天下午我本想让你跑一趟沙利文街的，但是明天去也行。”

除非你像我一样熟悉他，否则你很难相信他的话。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他认为无论什么时候离开这幢房子都是令人不快的冒险，而下雨的时候还要出行，就简直是白痴了。我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老爷兵吗？我当然会去的。我也想去那儿弄清我的一些疑问。你说为什么安娜·菲奥雷对奥格雷迪守口如瓶呢？是他不如你我有风度、有魅力吗？”

“很可能。阿奇，这真是绝妙的猜想。今天我派潘策尔去请她来，她除了极不情愿地承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步也不肯迈，因此就需要你的风度和魅力了。如果方便的话，明天上午十一点把她请到这儿来。晚一点也没关系，不碍事。对于她这么固执的人，需要死缠烂打。”

“我这就去找她。”

“不，我是认真的。明天再去吧。坐下。我宁愿你在这里优哉游哉、无所事事，看着我检查这些没用的花。它们既没用也不结果实。正像我以前说过的，有你这样陪着我，总是令人精神焕发，因为这种情形时常会提醒我，如果有一个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开除的人——例

如妻子——在身旁，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

“是的，先生，”我咧嘴一笑，“请继续讲。”

“现在不说了。下雨的时候不说。我讨厌下雨。”

“那好，那就再告诉我点别的事吧。你怎么知道卡洛·马费伊被谋杀了？你怎么知道巴斯托是被毒死的？你怎么知道他体内有根针？当然，自从你让科利斯·霍姆斯商店的小伙子给咱们表演过击球后，我就明白它是怎么进去的了。但你怎么会了解得那么深刻？”

沃尔夫放下手中的放大镜，长叹一声。我知道这些问题令他不快，但这除了是为满足我的好奇心外，也是为了公事。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虽然我打心眼里相信他不会让我们犯错误，但如果我能了解事情的原委，岂不是更能见机行事。任何事情，无论大小，如果我不逼他，我相信他是决不会主动开口的。

他叹道：“阿奇，难道非要我再一次提醒你，假如你问委拉斯开兹[①]为什么伊索的手是插在长袍里而不是垂在身体两侧，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吗？难道非要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要求科学家在教你时，让你一步步踩着他的脚印走，你却不能要求艺术家也这样做，因为艺术家就像天上的云雀或苍鹰一样，从不留脚印？难道非要我再告诉我一次我是个艺术家吗？”

“不，先生，我只想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巴斯托是被毒死的。”

他拿起了放大镜。我坐下等着，点起了一支烟。然而直到我吸完了，并决定到前屋去找本书或杂志看看时，他才开了口。

---

① 委拉斯开兹（Diego Velasquez，1559—1660），西班牙画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师。

“卡洛·马费伊不见了。这太寻常了，很可能是被打被抢了，然而有了那个电话和那个广告，就不寻常了。总体来说电话没什么意思，但那句威胁的话，‘我可不是个会害怕的人’，就很耐人寻味了。那个广告更说明问题。在此之前马费伊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家伙，这时却变成了一个可以制作一种很复杂、很不易制作，却能发挥作用的工具的人。那句‘有娴熟的手法’是句很好的广告词，但对于一个正在探索、寻找的头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启示。接下去，正如生命的创造是偶然的一样，马费伊也极其偶然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在他失踪的那天早上剪下了巴斯托那条新闻的人。于是，再读一遍巴斯托的新闻，找找它和卡洛·马费伊密切相连的地方。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意大利移民金属加工匠，另一个是名声显赫、学识渊博、财大气粗的大学校长。但这其中必有联系，如果你有本事挖掘深层含义的话，就能更加明白地看到元素的不相称加固了这种联系。还有那篇文章，要从其中找找是否有联系。要字斟句酌，只有确信是没用的语句才能放过。不过这篇文章不需要费多大劲，两者的联系如此明显，一目了然。巴斯托在倒下的一刹那，以及在此之前的一小段时间，手里用过不是一根，而是一整套工具——如果不是精细复杂的机械被极其巧妙地派上了这样的用场的话。这是一幅构图非常巧妙的图画。虽然完成这样的构图不需要判断力，只需要思考，但是作为一件艺术品，如果要使它圆满完成，还需要一些定色剂。于是我便问了菲奥雷小姐是否在马费伊的屋里看到过高尔夫球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那好，”我说道，“但是如果那女孩隐瞒了事实，说她从来没看见过，该怎么办？”

“我早就告诉过你，阿奇，即使是为了让你高兴，我也不愿意回答假设的问题。”

“哼，这可是个好借口。”

沃尔夫遗憾地摇了摇头。“回答就等于承认了你的胡猜的合理性，但我早就明白了对你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值。我怎么会知道在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做？也许祝她晚安吧。我能在别处为我的图画找到定色剂吗？也许能，也许不能。我是不是该问问你，如果你的脑袋长反了，你该怎么吃饭？”

我咧嘴一笑。“我饿不着。你也饿不着。这点我非常清楚。但你是怎么知道马费伊被谋杀了呢？”

“我不知道，直到奥格雷迪来了。你听见我怎么跟他说的吗？警察搜查了他的房间。这种事情只会在他犯了罪或他被谋杀的情况下发生。根据其他情况判断，他犯罪是不大可能的。”

“好吧。但我要把最好的问题留到最后。是谁杀了巴斯托？”

“嗯，”沃尔夫轻轻地咕哝道，“那是另一幅图画了，阿奇，而且我希望是一幅很贵的画。对购买者来说很昂贵，却能让艺术家赚到钱。并且，其中的某个人物还非常值得一画。不过还是要搬出我那句老生常谈，我们只有在谈妥佣金后才会支起画布。然而事实上也不那么严格。明天早晨如果你能把菲奥雷小姐带到这儿来，我们就能够了解一些背景情况。”

“我现在就去把她接来。才九点刚过一点儿。”

“不，听听外面的雨声。明天就可以了。”

我知道争也没用，于是在看了几本杂志，情绪好起来而又对杂志厌烦后，从楼上拿了件雨衣，出去看了一小时的电影。我不会向任何人承认，却不能不向自己承认的是，我的头脑一点儿也不轻松。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经历，却还是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情绪。我打心眼里坚信沃尔夫绝不会让我们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的，但有时也会产生强烈的怀疑。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忘记有一次他没有任何其他依据——除了办公室桌上的自来水笔干了之外——令那位银行行长，或者说令我，感到难受。当一小时后我听说那家伙开枪自杀了以后，我平生再没有如此宽慰过了。但要让沃尔夫做出哪怕一点点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我几乎从来不浪费时间去尝试。如果我去解释在某件事情上他很有可能犯错误，他就会说："阿奇，当你看到一件事实时你能明白，但你对现象没有感觉。"我在词典上查了"现象"一词的含义后，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道理，但跟他争论是没用的。

所以我又一次感到不安了。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于是我披上雨衣去看电影，这样我就可以坐在黑暗中，让某些东西吸引着我的眼睛，同时让我的头脑思考。不难看出沃尔夫是怎样推理的。有人想杀巴斯托，姑且称之为 X 先生。他在报上张贴了广告，招聘一名专家为他制作某种东西，并要求这个人将永远离开这个国家。这样如果日后这个人产生了什么好奇心，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马费伊前去应聘并得到了这份差事，即在高尔夫球杆中置入某种装置，这样当球杆表面的嵌入物击到球时，就会触动扳机，使杆柄的另一端射出一根针来。X 先生也许会说这是为了随后欧洲的差事测试一下技巧，但他为此付了太多的钱，以至于马费伊决定索性不回故乡了。不管那嵌入物是怎样出现在了球杆表面，它都拉开了高尔夫球俱乐部中的下一幕。X 先生将球杆放进了巴斯托的包中——当然其外表与巴斯托本人的球杆是一模一样的——达到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继而马费伊碰巧读到了星期一的《纽约时报》，两相对照，他对自己遇到的蹊跷事思考一番就不奇怪了。马费伊给 X 先生打了电

话，与他会了面，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试图敲诈一笔。X 先生这回没再费工夫去招聘专家设计另一个装置，他只是用一把刀结果了马费伊，并让刀一直留在他的背部，以免弄脏了小汽车的内饰。接下去他开车绕过了韦斯特切斯特的群山，发现了一处隐秘之地，将尸体扔进了灌木丛中并拔出了刀，随后将刀丢进了路旁的小河或水库中。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开车回到了家，喝了一两杯酒后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穿上了礼服而不是工作装，因为他要出席他的朋友巴斯托的葬礼。

当然这是沃尔夫勾勒出的图画，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我坐在影院中想的是，尽管勾勒这幅图画运用的全都是事实而没有任何臆想和夸大，但在一千多年前当人们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时，他们也可以这样说呀。他们没有臆想和夸大他们了解的任何事实，但是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事实呢？而在这件事情上，沃尔夫却敢拿一万美元和他的名声冒险，要把巴斯托挖出来。沃尔夫的客户中从没有人说过他冒失得令人难以忍受。对此我很高兴，沃尔夫本人也很高兴。但这仍然无法阻止我想象，假如他们将巴斯托切开，只在他的血管里发现了血栓，而没有在他肚子里发现任何小零碎的话，那么整整一个星期，上至地区检察官，下至一个普通警察，不用去电影院看米老鼠而只需待在家里就可以哈哈大笑，每人还能节省二十美分。我没那么傻，我知道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我也知道当一个人像沃尔夫那样信心十足时，他总会是正确的。

然而我一直在为我坚信沃尔夫是正确的而感到不安。当我从电影院回到家中，发现沃尔夫已经上楼回到他自己的房中时，我不得不带着这样的想法入睡。

第二天早晨七点刚过我就醒来了，但我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我

知道如果现在就起床穿上衣服，又得无所事事了，因为在沃尔夫从花房出来之前把安娜·菲奥雷带来是毫无用处的。我躺在床上，打着哈欠，看着有花有草的森林图画，看着我父母的照片，然后又闭上了眼睛，但我睡不着，因为我已经彻底清醒了，我只能听着街上传来的众多噪声，分辨到底有多少种。正在这时，我听见了敲门声，在我答话后，弗里茨进来了。

“早安，”我说，“我只要葡萄汁和一小盒巧克力就行了。”

弗里茨笑了笑。他总能呈现出一脸心不在焉却甜蜜的微笑。他能听出别人在开玩笑但从不回嘴。“早安。楼下有一位先生想见沃尔夫先生。”

我坐了起来。“他叫什么？”

“他说姓安德森。他没有名片。”

“什么？”我一跃而起，“好，好。他可不是一位一般的先生，弗里茨，沃尔夫先生正等着他呢。告诉他——不，不必麻烦了。我马上下楼。”

我往脸上泼了点儿冷水，匆匆穿上几件衣服，用梳子使劲梳了几下头，就下楼了。

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安德森没有从椅子上起身。他的皮肤晒得那么黑，如果走在街上，我得看两眼才能认出他来。他看上去还没有睡醒，表情有些痛苦，而且头发梳得一点也不比我好。

我说：“我叫阿奇·古德温。我想恐怕你不记得我了。”

他仍没有起身。“我想是的，抱歉。我是来见沃尔夫先生的。”

“是的，先生，恐怕你得等一会儿了。沃尔夫先生还没起床。”

“我希望不会太久。”

“我说不好。请稍候，我去看看。”

我快步走进厅里，但在楼梯下面停住了。我得想一想沃尔夫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破例。现在是七点四十五分。最终我决定上楼，穿过大厅来到距他的门十英尺的地方，那里的墙上有个按钮。我按了一下，立刻听到了他微弱的声音：

“呃？”

“关掉开关吧。我要进来。”

我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咔嗒声，接着是：“进来。”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床上的沃尔夫，你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景象。我经常看到，但仍然感到很有趣。顶部是一个无论冬夏他总是在用的黑绸鸭绒被。中间高高突起，四周急剧落下，所以，如果你想看到他的脸，你就必须站得足够靠前，然后弯下腰去，朝他在床头支起的一个遮篷下面看。那遮篷也是黑绸做的，顶端距离他的下巴有一英尺，但四周悬得很低。遮篷内的白枕头上，是他那张像庙里的神像一样的巨大的肥脸。

他的手从遮篷下面伸出来，拽了一下悬在他右边的一根绳子，遮篷便收了起来。他眨了眨眼睛。我告诉他弗莱彻 · M . 安德森在楼下想见他。

他大声骂了起来。我讨厌听他骂，因为这声音令我心神不宁。他对我说过，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咒骂只是一种声音的爆炸，在他却是一种深切欲望的强烈表达。他很少骂人，但那天早晨他是破口大骂。最后他喊道：“走开！出去！滚！”

我也讨厌结巴，却结巴起来。“但是——但是——安德森——”

“如果安德森先生想见我，他就该在十一点以后来。但那没必要。我花钱雇你们是干什么用的？”

“是的，先生，你当然是对的。是我坏了规矩，我该骂。但既然

事已至此，我想还是见见安德森先生为好……”

“不行。”

“一万美元呢。”

“不行。”

“看在上帝的分上，先生，为什么不呢？”

“该死的，别烦我了！”沃尔夫的头在枕头上摇了摇，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晃了晃，“是的，你在烦我。你经常烦我，我都没挑剔你。不过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见安德森先生，有三个原因：第一，我还在床上，没穿衣服，情绪也不好；第二，你跟他谈我们的交易就可以了；第三，我明白脾气古怪的技巧。如果一个人处心积虑地要建立古怪的名声，可是遇到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恢复常态，那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去吧。马上。”

我走出了房间，下楼来到办公室，告诉安德森如果他愿意等，可以在十一点钟见到沃尔夫先生。

他当然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一旦明白了事实确实如此时，他发怒了。令他尤其感到侮辱的是，他是下了一趟卧铺车，从中央车站直接来到沃尔夫的住处的，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向他百般解释，告诉他沃尔夫的确很古怪，但毫无办法。我还告诉他我昨天去了怀特普莱恩斯，很了解情况。这似乎使他冷静了一些，开始问我问题。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情况，当我讲到德温将本 · 库克叫来时，他脸上的表情令我感到非常有趣。他听完了全部故事后，靠在了椅子上，摩挲着自己的鼻子，仰望着我的头顶。

最终他把目光移向下方，看着我说：“沃尔夫作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是吗？”

“是的，先生，的确是这样。”

“那么他也一定掌握着一些惊人的信息喽？”

我咧嘴笑道：“安德森先生，和你谈话真是令人愉快，但没必要浪费时间了。至于惊人的信息，除非坟墓被掘开，巴斯托被切开，否则沃尔夫和我都会像博物馆里的木乃伊一样一字不吐的。不可能改变的。”

“是吗？那太糟糕了。我也许能为沃尔夫提供一笔费用，请他做个特别调查员——只需接受咨询、提供报告就可以。”

“一笔费用？能有多少呀？”

“嗯，五百美元吧。”

我摇了摇头。“恐怕他会很忙，无法接受。而我也很忙。今天早晨，我本来应当去一趟怀特普莱恩斯的。”

“哦，”安德森舔了舔嘴唇，看着我说，“你要明白，古德温，我一点儿没有冒犯你们的意思，但是，你难道不觉得整件事情都很下流吗？或者说得好听点，很不道德。”

我听了这话很生气，回头看着他说道：“你看，安德森先生，你说你不记得我，我却记得你。你没忘了五年前的戈德史密斯一案吧。让人们知道沃尔夫给了你什么，这对你不会有丝毫危害。但是不说了吧，就算是你需要保守秘密。我们并不是很介意的。但是你对舆论的引导，不仅使沃尔夫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反而被打了个鼻青脸肿，这是否道德呢？你也许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道德问题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好。不过如果今天我去怀特普莱恩斯，有人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而且这次无论你得到什么，都得付酬。”

安德森笑了笑，站起身来。“不必麻烦了，古德温，你今天不用去怀特普莱恩斯了。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我已经下定了挖出巴斯

托尸体的决心。你或者沃尔夫一整天都会在这里吧？我希望稍晚些时候能够联系到他。”

“沃尔夫总在这里，但在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和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你没法联系到他。”

“嗬，可真是个怪人！”

“是的，先生。你的帽子在厅里。”

我走到前屋窗前，目送着他坐出租车一溜烟走了，然后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我有些犹豫，但我相信沃尔夫是正确的，而且即使他错了，一点点媒体曝光对我们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拨通了《公报》办公室，找哈里·福斯特，幸运的是他恰好在。

“哈里吗？我是阿奇·古德温。我给你爆点料，但你一定要保持安静，要安静到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见。今天上午在怀特普莱恩斯，地区检察官安德森将得到一纸法庭命令，将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的尸体挖出来进行检验。他也许想保守秘密，但我想你会愿意帮助他的。听着，有朝一日，当时机成熟时，我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让安德森如此好奇。先别把这事说出去。”

我上楼刮了脸，穿戴整齐，吃了早餐，又在厨房里和弗里茨聊了一会儿鱼。九点三十分，我走进车库，给敞篷车加满了油，向南开往沙利文街。

由于正是学校上课时间，这回沙利文街不像上次那样喧闹和脏乱。我本以为街上的装饰会有变化，但没有。里奇太太家门上方有一个大大的黑色玫瑰花饰，垂着长长的黑色缎带，再往上是一个花和树叶编成的巨大的花圈。一些人在围观，大部分都站在街对面。稍远一些有一个警察无精打采地站在人行道上，当我将敞篷车停在了有花圈的门前几码之外时，他睁大了眼睛。我径直走向他打了个

招呼，递给他一张名片。“我是尼禄·沃尔夫办公室的阿奇·古德温。在马费伊的尸体被发现前一天，我们受他妹妹委托，去寻找他。我曾经到这里见过房东太太，还作过一些调查。”

“是吗？”那警察将我的名片放进了口袋，“除了让我站在这里，我什么也不知道。阿奇·古德温？很高兴认识你。”

我们握了握手。我离开时请他帮我照看敞篷车。

里奇太太看到我似乎很不高兴，但我充分地理解她。那个警探奥格雷迪也许因为我从马费伊屋里拿走东西而责备了她。他当然是既无权利也无理由那样做，但他不管不顾。当我看到里奇太太闭紧嘴唇，准备应付她认为我会问的问题时，不禁咧嘴笑了。有一个被谋杀的人躺在楼上，哪怕他只是一名房客，无论如何也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所以我先是安慰了她几句，才提出我想见见安娜·菲奥雷。

“她现在很忙。”

“是的，但这事很重要。我的老板想见见她。只要一个小时左右就行。看，我再给你几美元……”

“不！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难道不能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吗？你难道不能让那可怜的女人在埋葬她哥哥时耳根清净一些，不至于发疯吗？你以为你是谁……”

她无疑是想惹我发火。我看请她帮忙是毫无希望了，她根本就不肯听我说话，于是我转身走开，回到了前厅。餐厅的门开着，屋里空无一人。我刚溜进去就听见了厅里的脚步声。我从门与门柱之间的缝隙向外看，里奇太太开始上楼，接着听见她上了第二段楼梯。我躲在门后等着。十分钟不到，幸运降临了，我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透过门缝看到了安娜。我轻声地叫了她的名字。她停住脚步

四下张望。我又轻轻地喊了一声："在餐厅。"她走到了门口，我转到了她能看见我的地方。

"你好，安娜。里奇太太告诉我在这里等你。"

"哦，是阿奇先生。"

"是的。我来是请你出去一趟。里奇太太对我来找你很生气，不过你还记得星期三我给过她一美元吧？今天我给了她两美元，所以她放行了。不过请快些，我告诉她我们中午前会回来的。"

我抓住了安娜的手，她却抽了回去。"还是那天那辆汽车吗？"

"是的。来吧。"

"我的外套还在楼上，您看看我穿的这身衣服。"

"天这么热，用不着穿外套。快点吧，万一里奇太太改了主意呢？我们可以给你买一件外套——来吧。"

我抓着她的手臂出了餐厅，穿过前厅，来到大门口，不过我可不想让外面的人看出我很着急。我不知道那个警察多么看重他的职责，但万一他要阻拦，那事情就全黄了。于是我打开门，对她说："到车里去吧，我还要跟里奇太太说声再见。"过了几秒钟我才走了出去，她已经坐进了开着门的敞篷车里。我绕到司机座旁爬进去，发动车子，向那警察挥了挥手，便飞奔出了沙利文街。巨大的引擎声使得从楼上窗户里传来的叫声没能传入安娜的耳中。

她无疑算得上衣衫褴褛。但我让她坐在身旁，却丝毫没感到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开车进城，绕过了华盛顿广场，进入了第五大道。时间还早，仪表盘上的时钟显示的是十点二十分。

安娜问道："我们去哪里，阿奇先生？"

我说："你看，你坐得这么低，穿什么衣服根本无所谓。别人除了能看见你的脸，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穿这样的衣服毫无问题。

你说咱们开车绕着中央公园转一圈怎么样？今天天气多好呀。”

“哦，好的。”

我没再说话，她也没说话，转过了十条街后，她才又说了一句：“哦，好的。”

她无疑在心潮起伏。我开车从第十六街进入公园，又向上走，来到第一百街和第十街的西端，过河后沿着河滨大道到了格兰特公墓，在那里转了一圈后又向城里开去。我觉得她一眼也没看树、草或者是河，她一直在看其他车里的人。差五分十一点时我将车停在了沃尔夫的房前。

里奇太太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弗里茨在告诉我此事时表情很是滑稽。我给她回了电话，只说了几句她在妨碍司法，就把这事摆平了。她大喊大叫着，我不知她听进了多少，但我觉得我的话是奏效的。在我送安娜回家前，我们没有再听见她来电话。

在我给里奇太太打电话时，沃尔夫走了进来。我注意到他在走向办公桌时，停步向那女孩道了早安。他在妇女面前总是很彬彬有礼。他对她们持有某种变态的态度，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每次我看到有女人在他身旁时，他都彬彬有礼。我无法描述他的举止，因为我模仿不了。很难想象他身上那巨大的肉块和褶子怎么会让他看上去上彬彬有礼，但他的确可谓彬彬有礼。甚至在他欺负某位妇女时，他也表现得彬彬有礼。就像那次在外交俱乐部案中他让纽拉·普罗诺吃尽了苦头。那是我看到的把海绵挤干的最佳范例。

他对安娜·菲奥雷非常温柔。在点过信件后，他转身盯着她看了一分钟，然后才说：“我们不用再猜测你的朋友卡洛·马费伊在哪里了。请接受我的哀悼。你看见遗体了？”

“是的，先生。”

“可怜，真是可怜。他没有寻求暴力，他的遭遇完全是因为不幸。人的命运悬在多么脆弱的一根线上啊，就像杀害卡洛 · 马费伊的凶手悬在他头上的那根线一样，真令人惊奇。菲奥雷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在马费伊屋里看到高尔夫球杆的？”

“是的，先生。”

“是的，现在告诉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也许我那天提的问题使你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是的，先生。”

“你的确看见高尔夫球杆了？”

她张大嘴巴，但什么也没说。我一直注视着她，她看上去很奇怪。沃尔夫又问了她一句：“你看见高尔夫球杆了？”

她沉默了。我看不出她有一丝的紧张和胆怯，她只是沉默着。

“菲奥雷小姐，我那天问你这个问题时，你好像有点不安。我对此表示抱歉。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安吗？”

“是的，先生。”

“也许你记起了看到高尔夫球杆那天发生的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

她又一次沉默了。我看出其中有些蹊跷。沃尔夫先前没问过这最后一个问题，好像里面有什么意味。我听出了他语调的细微变化，我知道他不感兴趣了，至少是对最后一个问题不感兴趣了。有什么事情促使他改弦更张了。突然，他以另一种语调向她抛出了另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对我的所有问题都回答‘是的，先生’的？”

没有回答。但沃尔夫没有等待就继续问道：“菲奥雷小姐，我想

让你明白这一点。这最后一个问题与高尔夫球杆和卡洛·马费伊没有任何关系。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所以对于我问的有关卡洛·马费伊的任何问题，如果你决定除了‘是的，先生’之外什么也不回答，那也没关系。你有绝对的权利这样做，因为你已经下定了决心这样做。但如果我问你其他事情，你就没有权利只回答‘是的，先生’了，因为你并没有决定这样做。对于其他问题，你应当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来回答。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决定除了‘是的，先生’之外什么也不回答我呢，那是否是因为卡洛·马费伊做的什么事情呢？”

安娜冷冷地看着他，直盯着他的眼睛。很显然她并不怀疑他，也不想和他作对，她只是想看透他。她凝视着他，他也回视着。这样过了一分钟后，她说道：

“不，先生。”

“啊！好的。那不是因为他做过的任何事情喽？那么也就是说与他一点关系没有喽？所以你也就能回答我的所有问题了。你当然明白这一点。如果你决定了不告诉我关于卡洛·马费伊的任何事情，我也就不问了。但这是另一回事。你是否也决定了对奥格雷迪先生也只回答‘是的，先生’？就是昨天早上去问你问题的那个人。”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皱了皱眉，说道：“因为有事情发生。”

“好的。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摇了摇头。

“说吧，菲奥雷小姐。”沃尔夫很平静，“你根本没有理由不告诉我。”

她扭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要对阿

奇先生说。”

“好的。告诉阿奇先生吧。”

她对我说道：“我收到了一封信。”

沃尔夫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你是昨天收到的信？”

她点了点头。“昨天早晨。”

“是谁写的信？”

“不知道。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没有署名。信封上只写着地址和‘安娜收’，连我的姓都没写。里奇太太从信箱里把信拿来交给了我，但我不想当着她的面拆信，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信。我下楼到我睡觉的地方拆开了它。”

“里面说些什么？”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回答。突然，她微笑起来。她的表情很滑稽，令我感到很奇怪，很不舒服，但我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接着她说：“我要让你看看里面的东西，阿奇先生。”然后她弯下腰去，将裙子撩到膝盖上，把手伸进了她的长筒袜中，掏出了些什么东西。我看着她将五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展开，铺在了我面前。

“你是说这些是信封里的东西？”

她点了点头。“一百美元。”

“我明白了。不过还有用打字机打的信。”

“是的。信上说如果我永远不对任何人说关于卡洛·马费伊和他做过的事，这些钱就归我了。但如果我不愿意，如果我谈起了他，我就必须把它烧掉。我烧了信，但不打算烧掉钱。我要留着它。”

“你把信烧掉了？”

“是的。”

“信封也烧掉了？”

“是的。”

“你想不对任何人再谈起马费伊先生或高尔夫球杆的事了？”

“永远不会了。”

我看了看她。沃尔夫的下巴搭在了胸前，但他也在看着她。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好吧，这个该死的神话故事……”

“阿奇！道歉。”

“但是老天……”

“道歉。”

我转向了那女孩。“我道歉。但我一想起我拉你围着公园转时所消耗的汽油……”我坐下了。

沃尔夫问道：“菲奥雷小姐，你是否碰巧注意到邮戳？也就是信封上说明信是从哪里寄来的那个小圆圈？”

“不，先生。”

“当然不会了。顺便告诉你一声，那钱并不属于给你寄信的那个人。他是从卡洛·马费伊口袋里掏出那些钱的。”

“我要留着它，先生。”

“毫无疑问你会的。你也许不知道如果警察听说了这些钱，他们会无情地从你手中夺走的。但是，不必担心，你对阿奇先生的信任没有错。”他又转向了我，“风度和魅力总是令人钦佩的品质，有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送菲奥雷小姐回家吧。”

我想表示反对。“为什么不……”

“不。让她烧掉那些钱，然后从你的开支簿支钱代替吗？不，她不会那样做的。但即使她愿意，我也不愿看到用烧钱的办法把美人从为她挖掘的坟墓中拯救出来。烧钱的行为是我们所能憎恶的唯一真正的渎神行为。你也许还没有意识到那一百美元对菲奥雷小姐意

味着什么。对她来说，那代表着因为奋不顾身和英雄行为所得到的奖励。既然她已经安全地得到了那笔钱，并收藏好了，那么送她回家吧。”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再见，菲奥雷小姐。我给了你少有的赞扬，我相信你能够说话算数。”

我走到了门口，告诉她跟我走。

返回的路上我始终没跟她说话。我感到很痛心，辛辛苦苦地把她骗来，处心积虑地拉着她在城里转了将近一小时，最终的结果却是让她在我们面前装傻充愣，但是没必要再跟她费口舌了。到了沙利文街，我将她放在了人行道上，心里泛起了很大的满足，心想沃尔夫对她和我都够彬彬有礼的。

她站在那里。当我挂上挡准备走时，她说道：“谢谢你，阿奇先生。”

她也够彬彬有礼的！这是跟沃尔夫学来的。我说：“你令我很不快，安娜，但是再见吧，别往心里去。”说罢便飞驰而去。

第六章

就是在我送安娜·菲奥雷回家的那半个小时，沃尔夫旧病复发了。这次他病得可不轻，而且持续了三天。当我回到三十五街时，他正坐在餐厅里我通常吃早饭的小桌子旁，一边喝着啤酒——旁边已经有三个空瓶子了——一边与弗里茨争论着西红柿馅饼里是否该加细香葱。我站着听了一会儿，一言未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拉开壁橱拿出了一瓶黑麦威士忌，痛饮了一番。

我始终没弄明白沃尔夫所谓的旧病复发。有时候病因似乎很清楚，就是寻常的泄气和沮丧，就像松树街一案中被我们甩掉的那位出租车司机那样，但其他一些时候就根本无法解释了。一切都顺风顺水，在我看来好像我们马上就能打好包，只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他却无缘无故地丧失了兴趣。恐怕只能说他熄火了。无论我说什么，对他都毫无作用。这种状态可能持续一下午，也可能持续好几个星期，甚至有时候他似乎永久地熄火了，除非有什么新事物出

现，才能让他重新精神焕发。这种状态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情况下他会赖在床上一直不起，只靠面包和洋葱汤过活，除我之外拒绝见任何人，但也严禁我提及任何我正在日思夜想的事情；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坐在厨房里教弗里茨如何烹制某种食品，再在我的小桌子上吃掉这些食品。有一次他在两天内吃掉了整整半只羊，羊的不同部位总共用了二十多种不同的方法烹调。在这种时候我通常都闭口不言，满街跑着为他们采购做菜要用的药草、植物根，甚至是兴奋剂。我平生只向沃尔夫请过一次假，就是那次他派我去布鲁克林码头，向被扣押的一条亚洲商船的船长购买巴藤根。那船长肯定是带了些鸦片什么的才被怀疑的，于是他想当然地以为我是来寻衅闹事的，不由分说便叫了五六个皮包骨头的野蛮人把我暴打了一顿。第二天下午我在医院里打电话向沃尔夫请了假，但只过了一天沃尔夫就来接我回家了。我很惊讶他居然亲自来了，于是便忘了我是请了假的。他的那次发病也就到此结束了。

这次我一看到他坐在厨房里跟弗里茨争论，就知道他又发病了。我厌烦至极，上楼喝了几杯酒后又下楼出门了。我开始漫无目的地散步，但走过几条街后，那几杯酒带来的食欲越来越强，于是我便在一家餐馆里大吃了一顿。在吃了七年弗里茨做的饭以后，任何餐馆对我都没有吸引力了，但我仍不想回家吃。一则我心里反感，二则那些在沃尔夫发病的状态下做出的饭是靠不住的——有时候是为饕餮之徒准备的盛宴，有时候是在路边花八美分就能买到的小吃，有时候则是一团糟。

但吃过饭后我感觉好了一些，又走回第三十五街，告诉了沃尔夫安德森那天早上说过的话，并补充了一些个人看法：天黑之前他们一定会动手做些什么的。

沃尔夫仍然坐在小桌子旁，看弗里茨搅拌着平锅里的什么东西。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在努力回忆先前在哪里见过我。他说："别再跟我提那个混账律师的名字。"

为了刺激他，我说："我早上给《公报》的哈里·福斯特打过电话，告诉了他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你是想广为宣传的。"

他根本没听我说话，而是对弗里茨说："准备好开水，免得它裂开。"

我上楼告诉霍斯特曼，下午——也许是一个星期，他都得独自照顾那些花草了。他将很难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沃尔夫在他身旁时他总是佯装恼怒，而当有任何事情发生，导致沃尔夫没能在早上九点或下午四点出现在花房时，他又非常担忧和焦虑，那表情会让人误以为有粉蚜在不停地追逐他。于是我上了楼，让他独自难过去。

那时候是星期五下午两点，而我再次看到沃尔夫露出正常表情是在六十九小时后，也就是星期一上午的十一点。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是星期五下午大约四点钟，哈里·福斯特打来了电话。我一直在等这个电话。他说他们把巴斯托挖了出来，进行了验尸，但什么消息也没发布。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他的独家新闻，很多媒体都听到了风声，都派人在验尸官的办公室外打转。

六点稍过一点儿第二个电话来了。这回是安德森。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不禁咧嘴一笑，并特意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我能听出他对于要等到六点感到很气愤。他说他要与沃尔夫谈谈。

"抱歉，沃尔夫先生正在忙。我是古德温。"

他说他想要沃尔夫到怀特普莱恩斯来一趟。我嘲笑了他。他挂

上了电话。事情闹成这样令我很是不快，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坏家伙。沉思了一会儿后，我又拨通了亨利 · H. 巴伯公寓的电话，向他详细咨询了诸如窝藏犯和捕捉物证等很多问题。然后我到厨房将两个电话的情况告诉了沃尔夫。他向我挥了挥勺子。

“阿奇，那个安德森有病。去把电话机消消毒。难道我没说过不要提他的名字吗？”

我说：“很抱歉，我应当知道的。但你明白我是怎么想的，先生。怪人永远是怪人，哪怕这个怪人是你。我想和弗里茨说几句话。”

沃尔夫根本没有听。我对弗里茨说我要去买一些三明治当晚饭，并且将在办公室吃。我还对他说，如果门铃响了，除非我另有吩咐，否则他不要到门口去，一切由我来应对。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要开门。

我明白我也许是小心得过头了，但我可不愿意有任何人在沃尔夫犯病时前来打搅。我很高兴他没有派我去买这买那，希望此后也不要，因为我不能离开。即使我们赌输了也没问题，但只要我能阻止，我就决不让他们戏弄我们。那天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第二天早晨我没有掺和沃尔夫他们的事情，大部分时间待在前屋，开门接待了一名煤气工、一名递送员，还有一个希望我们为他上大学提供帮助的油滑的年轻人，我对他的帮助是一直把他扶到了台阶下。大约十一点的时候，门铃又响了，这回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他径直往里走，我一把把他推了出去，然后自己也走了出去，将门在背后关上。

我说：“早上好。谁请你来的？”

他说：“当然不是你。我要见尼禄 · 沃尔夫。”

“不行，他病了。你有什么事？”

他笑了，笑得很平和，并且递给了我一张名片。我看了看。

“哦，是安德森的人。你是他的助手？有什么事吗？”

“你当然知道我有什么事，”他微笑道，“咱们进去好好谈谈吧。”

我想含糊其辞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沃尔夫什么时候能康复，这令我很为难，所以我尽可能少说话。我告诉他沃尔夫了解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多，至少是对与巴斯托有关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都是从梦中得到的。我告诉他如果想让沃尔夫参与此案，就请出个价，他将待价而沽。我告诉他如果他们想弄个什么可笑的逮捕证来，不等沃尔夫打发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有多可笑。我还告诉他我能看出他比我重二十磅，因此除非他离开，否则我不会回屋的，而如果他肯离开，我将非常感激，因为我正在看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在我说话时他多次插嘴，但等我说完后，他只是说道：

“告诉沃尔夫他脱不了干系。”

“没问题。还有什么话要留下？”

“见你的鬼去吧。”

我咧嘴一笑，站在台阶上目送他向东边走远。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他，不过我对韦斯特切斯特就不大熟。名片上写的是“H.R.科贝特”。我回到前屋，坐下抽烟。

午饭后，大约四点钟，我听见街上卖报纸的在喊“号外”。我出门叫住他买了一份。第一版有半个版都是“巴斯托系被毒死——体内发现暗刺”的内容。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如果说什么时候我的脖子酸过的话，就是这次了。当然我和沃尔夫都没有被提及。我本来也没指望提到自己的名字，但想想这条消息本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吧！我气恼自己先是跟德温，继而跟安德森，都把事情搞糟了，否则这事一定会让我们介入的，尽管很难说是怎样介入。我也气恼沃尔夫那该死的旧病复发，真想狠狠地踹他一脚。我又读了一遍，发现根本不是暗刺，而正如沃尔夫所说的，是一枚短短的钢针，而且是在胃下。尽管我对沃尔夫很恼怒，还是决定把报纸交给他。这正是他所描绘的画面。

我走进厨房，将报纸摊在他面前的桌上，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他在后面叫我："阿奇！去开车跑一趟，这儿有一张购物清单给你。"

我假装没听见。后来是弗里茨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所有的报纸上都充斥着此事。他们纷纷派出大批狗仔，在韦斯特切斯特郡四处打探消息，但一无所获。我读过了所有文章，就青草地俱乐部、巴斯托家庭、参加了高尔夫球赛的两位金布尔、犯下可笑错误的医生，诸如此类，了解了大量详细情况。但是自沃尔夫于星期三晚上问过安娜·菲奥雷是否在卡洛·马费伊的房子里看见过高尔夫球杆之后，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沃尔夫了解的情况多，因为谁都不知道那根针是怎么进了巴斯托的肚子里的。所有报纸都请了专家分析毒药及其对人体的作用。

星期天晚上我去看了场电影，吩咐弗里茨不要给任何人开门。我倒不是在期待什么事。安德森好像已经另起炉灶了。很可能他已经根据犯罪动机或他自己的发现理出了头绪。如果不是星期天，那天晚上我会喝醉的。当我从电影院回来时，沃尔夫已经上楼回自己房间了，但弗里茨还在厨房里洗洗涮涮。我煎了一片火腿，给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还倒了一杯牛奶，因为我晚饭没怎么吃。我注意到我早上拿给沃尔夫看的那份《纽约时报》还在冰箱顶上，像我离

开时一样。他十有八九是没看。

我在自己的屋里读书直到午夜，因为脑子里思虑过多而难以入睡。然而一旦睡着了却又睡得很死，因为第二天早上我睁眼时，一看钟已经九点多了。我正坐在床沿上打哈欠，忽听见头顶上一阵响，于是我完全清醒了。这要么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两对脚步声，要么就是我还在做梦。我走进厅里听了一分钟，然后又跑下楼。弗里茨正在厨房里喝咖啡。“是沃尔夫先生和霍斯特曼一起上楼了吗？”

“那还用说。”这是弗里茨唯一的口头禅，而他不放过任何可以说这句话的机会。他冲我微笑着，看见我很激动，他也很高兴。“现在我只需要做一条羊腿，涂上蒜汁就可以了。”

“如果你愿意，涂上毒青藤汁也没问题。”我说着，回屋去穿衣服。

沃尔夫的这次犯病结束了！我激动万分，刮胡子时刮得格外干净，还躺在浴缸里吹起了口哨。一旦沃尔夫恢复正常，任何事情就都可能发生。当我回到厨房时，那里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盘无花果和一张厚厚的煎蛋饼。报纸也被展开放在咖啡壶边上。我一边浏览着标题，一边吃着无花果。才吃了半个，我就停止了咀嚼。我迅速地扫视报纸，把满嘴的东西囫囵吞下以免碍事。报上说得很清楚，也很确定。尽管不需要核实，我还是把报纸都摊开，上上下下地扫视着。那条在第八版的下缘，是一个用线条简明的小框子框着的小广告：

如有任何人能提供线索，促成杀害我丈夫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的凶手落网并受到严惩，我愿出五万美元予以奖励。

伊莲·巴斯托

我读了三遍，然后将报纸扔到了一边，冷静下来。我吃完了水果和煎蛋饼，又吃了三片吐司面包，喝了三杯咖啡。五万美元哪，而沃尔夫的银行户头正像湿鞍褥重压下的晒衣绳一般岌岌可危呢。而且，这也是我们再次扬名立万的好机会。我非常冷静，但这才十点二十分。我走进了办公室，打开了保险柜，四处扫了扫灰尘，等待着。

沃尔夫十一点钟下楼时，看上去精神不错，却少了往日引人注目的幽默感。他只是点了点头，算是道了早安，然后径直坐进椅子里开始看信，似乎根本没注意我是否在场。我只是等着，心想我要让他看看别人也会像他一样冷酷无情，但是当他开始核对每月账单时，我突然对他说道：

“我希望你度过了一个很好的周末，先生。”

他没有抬眼看我，但我看见他脸颊上起了个褶。“谢谢你，阿奇。我周末很愉快，但今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完全陷入了泥沼中的感觉。如果只考虑我自己的话，我会继续躺在床上等着腐朽。但是一个个名字向我袭来：阿奇·古德温、弗里茨·布伦纳、西奥多·霍斯特曼。我有责任哪，所以我起来又重新挑起了担子。我不是抱怨，责任是相互的，但我那一份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

“请原谅，先生，但你是个可恶的骗子，你所做的就是看报纸。”

他一边核对着账单上的项目，一边说道：“你没法激怒我，阿奇，今天不行。报纸？我今天早上除了人生什么也没有看，而那也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那么你不知道巴斯托太太悬赏五万美元捉拿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喽？”

正在打钩的铅笔停住了。他没有抬眼看我，但有那么几秒钟，铅笔在他手指间一动不动。接着他将账单压在镇纸下，将铅笔放在账单旁，抬起了头。

“把报纸拿来我看看。”

我先给他看了广告，然后才是头版的文章。他逐字逐句读完了广告，而对头版的文章只是瞟了一眼。

“的确，”他说道，“的确。安德森先生不需要这笔钱，即使是假设他有可能挣到这笔钱，而片刻之前我还在谈责任。阿奇，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在床上想什么吗？我在想，如果我把西奥多打发走，让所有那些活着并且呼吸的花草，所有那些高傲而娇贵的可爱的小家伙，都渴得气喘吁吁，然后再枯萎掉，该有多么可怕，又有多么好笑呀。”

“天哪！”

“是的。那只是个大清早的异想天开。我一点儿也没有要那样做的意思。假使我真的决定卸下责任了，我更有可能的是把它们拍卖掉，然后出发去埃及。你当然知道，我在埃及还有一幢我从来没见过的房子。十年前把它给我的那个人……嗯，弗里茨，什么事？”

弗里茨出了点岔子，他是匆匆忙忙地穿上外衣去开门的。

“有一位女士想见你，先生。”

“叫什么名字？”

“她没有名片，先生。”

沃尔夫点了点头，弗里茨出去了。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门前，深鞠一躬领进了一位年轻的女士。我站起了身。她先是看着我，我将头摆向了沃尔夫的方向。她看着他，停住脚步问道：

“你是尼禄 · 沃尔夫先生？我叫萨拉 · 巴斯托。”

“请坐，”沃尔夫说道，“你必须原谅我，因为物理的缘故，我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从椅子上站起来。”

“现在就是紧急情况。”她说道。

第七章

我已经从报纸上对萨拉·巴斯托相当了解了。她二十五岁，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是个大红人，无论在荷兰大学的各种学生团体还是在韦斯特切斯特的各种夏令营中都极其活跃。当然，按照报纸上的说法，她很漂亮。当她坐在沃尔夫对面的椅子上，并用眼睛盯着他时，我心想，媒体报道的这个细节倒很准确。她穿着配有外套的褐色亚麻布连衣裙，斜戴着一顶帽子。她戴着手套，表明她自己驾车。她的脸盘很小，但上面的一切都排列得恰到好处。她的瞳孔很亮，眼圈却很黑，可能是因为疲劳，也可能是哭得太多。她的皮肤很白，但不是苍白，而是透着健康和快活。她声音不高，说话得体。我很喜欢她。

她开始介绍自己，但沃尔夫伸出一根手指向她晃了晃。“没必要了，巴斯托小姐，我知道，说这些也许会让你很痛苦。你是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唯一的女儿。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找我有什么事

情就可以了。”

“好吧。”她犹豫了一下，“您当然知道了，沃尔夫先生。这话有些难以启齿——也许我该有些铺垫的。”她试着微笑了一下，“我要求您开恩，我不知道这恩到底有多大。”

“我可以告诉你。”

“当然。首先我必须问您，您知道今天早上我妈妈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吗？”

沃尔夫点了点头。“我看见那广告了。”

“那好，沃尔夫先生，我——嗯，是我们，我们这家人——必须请求您不要理会那广告。”

沃尔夫喘了口气，将下巴耷拉了下来。“一个非同寻常的请求，巴斯托小姐。是让我想当然地认为它非同寻常呢，还是告诉我理由呢？”

“当然有理由。”她犹豫了一下，“这已经不是家庭秘密了，人们都知道我妈妈——多少有些，并且是在不同情况下——不负责任。”她的眼睛热切地望着他，“您千万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或者与钱有什么关系。我们家有好多钱，我和我哥哥也不是小气鬼。您也千万不要以为我妈妈是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从法律的意义上讲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多年来她经常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而这次——这次可怕的事件恰好发生在她的一次发作当中。她不是正常地寻求复仇，那个广告，用我哥哥的话来说，简直是嗜血。我们亲密的朋友当然都会理解，但还有社会呢，我爸爸——我爸爸的社交圈子非常大——如果他们哀悼他，我们会很高兴，但我们可不希望——爸爸也不会希望——他们看着我们驱动猎犬……”

她有些喘不过气了，停了下来，瞟了我一眼，又转回到沃尔夫

身上。沃尔夫说："是的，巴斯托小姐，你说我是猎犬，我不生气。请继续讲。"

"我很抱歉。我太缺心眼了，不会说话。如果布拉德福德大夫来了就好了。"

"是布拉德福德大夫给你出的主意？"

"是的，正是。他认为应当这样做。"

"那你哥哥呢？"

"嗯，是的。我哥哥对此非常遗憾，我说的是那个广告。他不大同意我来找您。他认为这——根本没用。"

"从理论上讲，想叫停猎犬是很难的。他也许比较了解狗。你说完了吗，巴斯托小姐？我的意思是，你还有更多的理由要讲吗？"

她摇了摇头。"当然，沃尔夫先生，这些理由已经很充分了。"

"那么照我的理解，你希望的是不要花费任何力气去寻找并惩罚杀害你父亲的人喽？"

她紧盯着他。"啊——不。我没有那样说。"

"你请求我开的恩，就是要我克制自己不去付出那样的努力吗？"

她的嘴唇闭上了，再张开时仅够挤出这样一句话："我明白了。您是尽可能地把我的话往坏处想。"

"绝非如此。是往清楚里想，而不是往坏处想。很显然，你的思维是混乱的，而我的思维是清晰的。你迄今所表达的意见显然是不明智的。你向我提出的要求，可以分批一项项地提出来，却不能一下子同时提出来，因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例如，你也许是在告诉我，你虽然希望我找出凶手，却请求我不要指望得到你妈妈提供的酬金。是吗？"

“不，您知道不是这样的。”

“那么也许你是在告诉我，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可以去抓到凶手；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法律责任而得到那笔酬金，但你们家出于道德的原因而不同意出那笔赏金。是吗？”

“是的。”她的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但仅仅是一瞬间便又坚定地闭上了。然后她突然站了起来，向沃尔夫喊道：“不！我后悔来了这里。戈特利布教授错了。您也许很聪明——再见，沃尔夫先生。”

“再见，巴斯托小姐。”沃尔夫一动不动，“因为物理的缘故，我只能坐在椅子里了。”

她向外走去，但走到距门一半处又犹豫了，站了片刻，转过身来。“您是只凶猛的猎犬。是的。您冷酷无情。”

“很可能如此。”沃尔夫弯起了一根手指，“回到你的椅子上吧。来吧。你的差事太重要了，不要让一时的冲动毁了它。自我克制是一种可敬的品质。现在，巴斯托小姐，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我坦率但礼貌地拒绝你刚才的请求，我们达不成任何协议；或者你回答一些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哪个更好些呢？”

她晃悠了几下，又坚定地站住了，然后回到了椅子上，机警地看着他，说道：“最近两天我已经回答了太多的问题。”

“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我能想象出他们问题的大意以及他们的愚蠢。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也不会侮辱你的智力。你是怎么知道我了解这件事情的？”

她看上去有些意外。“我怎么知道的？嘿，那全是因为你呀。是你发现那秘密的。所有人都知道呀。报纸上写着呢——不是纽约的

报纸，是怀特普莱恩斯的报纸。”

我听后不禁咧嘴笑了。德温会打电话叫本·库克来抓我了，是吧？

沃尔夫点了点头。“你是否向安德森提出了与我同样的请求？”

“没有。”

“为什么？”

她犹豫了起来。“嗯——好像没必要。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动动脑子，巴斯托小姐。是不是因为他好像不大可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她浑身紧绷着。她的手——好漂亮的一双手，有着修长的手指和优美的关节——攥成了一个小拳头放在了大腿上。“不！”她说。

“很好。是什么原因让你认为我的发现更像是，或者至少可能是更正确？”

她说：“我并不认为……”但他制止了她。

“行了，克制点吧。这是个非常清楚明白的问题。你的确认为我比安德森先生更有能力发现真相，难道不是吗？是因为我最初的发现吗？”

“是的。”

“那就是说，是因为我发现了你父亲是被从高尔夫球杆柄中推出的一根毒针杀死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沃尔夫先生。”

“拿出点勇气来。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会结束的。单是好奇心就能推测出下一个问题来。是什么竟使你产生了这么奇怪的念头，认为我是那样一个怪人，居然有可能答应你那么愚蠢的请求？”

“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那么想。但我想试一试，我听一位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戈特利布，提起过你的名字——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现代犯罪侦查》……”

“是的。一本聪明的罪犯应该当做礼物寄给所有他认识的侦探的书。”

“也许是吧。他提起您时却是大加赞赏。我给戈特利布教授打过电话，他说您的分析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您有一种天生的直觉，您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个正直的人。这听起来……嗯，所以我决定来找您。沃尔夫先生，我求求您……我求求您……”

我相信她马上就要哭了，我可不希望她这样。然而沃尔夫生硬地打断了她的话：

“这就够了，巴斯托小姐。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一切。现在该我求你了：你能否准许古德温先生带你上楼去，看看我养的花草？”

她目瞪口呆。他继续说道：“没有任何阴谋。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吧，我要打个电话。等你回来时，我会有建议给你的。”他又转向我说道，“弗里茨会去叫你们的。”

她站起身来，一言未发就跟着我走了。我想这样很好，因为她已经动摇了，而且满腹狐疑。我没有让她步行上两层楼，而是带着她穿过大厅，用了沃尔夫的电梯。当我们来到顶层时，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古德温先生，沃尔夫先生为什么要送我到这里来？”

我摇了摇头。“别问了，巴斯托小姐。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而既然我不知道，我们还是看花吧。”我打开了过道的门，霍斯特曼从陶器室里走了出来。“你好，霍斯特曼。我们能随便看看吗？”他点了点头，一溜小跑着走开了。

沃尔夫使用混凝土的花台和角铁的花架，还有霍斯特曼发明的喷水装置。花房主要有三大间，一间养卡特米兰及杂交品种，一间养齿舌兰、金蝶兰及杂交品种，还有一间是热带植物室。此外有一间陶器室，也是霍斯特曼的蜗居，还有一个供繁殖用的小屋。储备罐、沙土、泥炭藓、腐叶土、肥土、紫萁根茎、木炭和花盆则收藏在房子后面的外部楼梯旁的一个没装暖气和窗户的屋子中。

由于时值六月，窗户上钉着木板隔条，一缕缕阴影和阳光洒在阔大的叶子、盛开的花朵、窄小的过道和成千上万的花盆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图案。我喜欢这幅情景，太令人兴奋了。

带巴斯托小姐看花就像是给她上课。当然她刚进门时根本不想看花，正如我根本不能不想她妈妈的广告一样。在看第一排卡特米兰时，她尽量装得彬彬有礼，仿佛这里的确值得看看。真正打动她的第一种花是一束小小的次要品种，只有二十朵左右。但我很高兴，因为那是我喜欢的品种之一。我停在了她身后。

"令人惊奇，"她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这颜色——太不可思议了。"

"是的，这是个属间杂交品种，并非天生如此的。"

她来了兴致。第二排是布劳绍卡特莱丽亚兰花，我剪了几枝递给她。我给她讲了一些关于杂交和籽生之类的知识，但她可能根本没听进去。接着，在第二间房子，我深深地失望了。她居然喜欢齿舌兰胜于卡特米兰及杂交品种！我猜那是因为它们更贵更难伺候，但似乎她并不知道这些。真没品位，我想。更有甚者，在进了热带植物室后，她竟说她喜欢一些我连第二眼都不愿意看的货色。她津津乐道于它们的雅致和优美。我点着头，却感到兴味索然了，而且不管怎样我总想着沃尔夫下一步会做什么。终于，弗里茨出现了。

他走到了过道中央就停住了脚，说沃尔夫先生在等我们。我咧嘴一笑，从他身旁走过时真想在他肋间捅一下，但我知道那样的话他永远不会原谅我的。

沃尔夫依然坐在椅子里，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离开过。他点了点头，指明了巴斯托小姐和我的座位，等我们坐定后，他才开了腔：

“你喜欢那些花吗？”

“太棒了。”我能看出，她对他刮目相看了，“那些花太美了。”

沃尔夫点了点头。“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如果你跟它们待的时间再长一些，对它们再熟悉一些，你就不会产生那些错觉了，并且会了解到它们是多么缺乏个性。它们给你造成的印象只是因为它们乍一看太唬人。它们根本谈不上太美。”

“也许。”她对兰花的兴致完全丧失了，“是的，也许。”

“但无论如何它们帮你打发了时间。想必你也想知道我是怎么打发这段时间的。首先，我给我的银行打了电话，请他们立即帮我准备一份伊莲·巴斯托——也就是你母亲——的财务状况报告，还有彼得·奥利弗·巴斯托——也就是你父亲——的遗嘱详情。接着我给布拉德福德大夫打了电话，努力劝说他今天下午或晚上来拜访我，但他另外有事。然后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五分钟前，银行打来电话，提供了我要的报告。我就派弗里茨去找你们。这些就是我刚才的活动。”

她又变得激动起来。她的嘴唇紧闭着，显然不打算张开。

沃尔夫继续说道：“我说过我要给你一个建议。现在我要说了。准备好你的笔记本，阿奇，逐字记录。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找到杀害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的凶手。我将把我努力的结果透露给你，

萨拉·巴斯托，如果你不提出反对，我也将透露给适当的政府机构，并且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你母亲承诺作为酬金的数目的支票。但如果我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凶手实际上是一个你害怕的人，一个你正在努力遮掩以免其受到法律惩处的人，那么我将不会进一步披露情况。真相只限于古德温先生和我之间，其他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知道。请稍候，巴斯托小姐，听我把话说完。还有两点。你必须明白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非常得体的。我不是政府公务员，我也不是律师。我没有宣誓遵守任何法律。一个窝藏犯可能面临的危险境地我是毫不关心的。再有，如果你的担心被证明是正当的，而我不向外透露实情，你打算给我多少报酬？我觉得我这个人太感情用事，太浪漫了，以至于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把应当付酬金作为建议的一部分。敲诈勒索这个词会让我听起来很不舒服。但尽管我受制于浪漫和感情用事，却没有骄傲来进一步限制我。如果你选择送上一份礼物，我会接受的。阿奇，大声读一遍，以确保巴斯托小姐明白我的意思。”

巴斯托小姐的声音先响了起来：“可这……这太荒唐了！这……”

沃尔夫伸出一根手指向她晃了晃。“请别这么说。你难道想否认你来这里说这些废话，是为什么人遮掩吗？巴斯托小姐，现在千万别这么说！咱们还是尊重彼此的智慧，心照不宣为好。阿奇，读吧。”

我读了自己的记录。读完后，沃尔夫说道：“我劝你还是接受吧，巴斯托小姐。无论如何我将继续我的调查，而假如结果是你所担心的，你将很方便地得到我提供的保护。顺便说一句，我提出的条件纯粹是自私的。有了这样的协议，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兴趣跟合

作，因为这将对你有利，无论结果如何，还是让这件事快些过去为好，免得夜长梦多。我不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我只是一个想挣些钱的人。你说楼上的花太美了，然而它们的开销也太大了。你知道养那些兰花需要花多少钱吗？”

萨拉·巴斯托只是使劲盯着他。

“好吧，”沃尔夫说道，“当然不需要签什么字。这就是人们幽默地称之为君子协定的那种东西。达成协议的第一步是请古德温先生明天上午访问你们家——你可以到那时再作决定——在你的允许下，与你本人、与你的兄弟、与你的母亲，或者随便什么人谈谈……”

“不！”她爆发了，但随即又闭上了嘴。

“但的确要这样做。我很抱歉，不过这很关键。古德温先生是个谨慎的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个无比勇敢的人。这的确很关键，我会跟你细说分明的，巴斯托小姐。”他把手放在桌沿上推了一把，使他的椅子向后退去，然后又将手撑在椅子扶手上，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你回家去吧，或者不管有什么事，先去办吧。人们一般很难当着我的面思考问题，因为我不会给人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我知道你很痛苦，你的感情折磨得你难以承受，但你必须解放出你的头脑，让它工作。去吧。不管是去买帽子，还是去约会，还是去跟你妈妈谈谈，还是有别的什么计划。今天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古德温先生明天上午几点可以去，或者告诉我他不能去，不过那样我们就是敌人了。去吧。”

她站了起来。“嗯……我不知道……我的天哪，我不知道……”

“请吧！你现在不是凭理智在说话，而是凭着被搅得一塌糊涂的感觉的泡沫在说话，那毫无意义。我可不希望与你为敌。”

她站在他面前，脸正对着他，下巴稍稍翘起，以便与他目光相

对。“我相信您，”她说，“我的确相信您不会那样做的。”

“的确，我不会的。再见，巴斯托小姐。”

“再见，沃尔夫先生。”

我领她来到前门，让她出去了。我本以为她也会向我道声再见的，但她没有。她什么也没说。她向外走时，我看到她的车停在路边，是一辆深蓝色的双人小轿车。

回到办公室后，沃尔夫已经坐回椅子里了。我站在办公桌的另一侧，看着他。

“那么，你又知道了些什么情况？”我说。

他的下巴折叠起来。“我知道我饿了，阿奇。我又有了食欲，这真是让人高兴。几个星期以来我什么胃口也没有。”

我自然很生气，瞪着他说：“你可以这么说。在经过了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后……”

“但是没有胃口。我曾经千方百计地想唤起食欲。现在我饿了。午餐将在二十分钟后准备好。同时，我了解到一个与高尔夫球杆有关的人请了一位职业运动员。查一查青草地俱乐部谁符合这个条件。看看有没有什么对我们心存感激的当事人能通过电话介绍些情况。请那位职业运动员与我们共进晚餐，这事很紧急。午饭后你去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的办公室一趟，顺便在图书馆借几本我需要的书。”

“是，先生。你认为巴斯托小姐担心的人……”

“我现在不想说，阿奇。我现在只想安静地在这里坐一会儿，我饿了。午饭后再说吧。”

第八章

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十点，我开着敞篷车进了巴斯托家的大门。是一名站岗的州警察为我开的门。他身旁还有一个壮汉，是巴斯托家的看门人。我不得不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我就是萨拉·巴斯托正在等待的阿奇·古德温。看来过去三天很多报社都派出记者爬到了周围的树上。

宅子坐落在普莱森特维尔东北七英里处，两山之间山坳的最低点，房子是石头建成的，非常大，足有二十多间屋，还有很多附属建筑。路的两边布满了树和灌木。走了大约三百码之后，车道沿着一个巨大的斜坡草坪转了个弯，伸向一个屋檐下有两层台阶的台子。这是宅院的侧门，绕过屋角才是正门，俯瞰着山下的草坪。进入正门后，迎面是一个花园，而草坪的另一边还有更多的花园，花园中有假山和水池。我放慢了敞篷车的速度，心想对他们来说，那五万美元真是不在话下。我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蓝色的衬衣，打着褐色

的领带，当然还戴着我那顶巴拿马草帽，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1]前刚刚清洗过。我认为根据目的地来决定穿着打扮，是个好主意。

与萨拉·巴斯托约的是十点，我正好准时到达。我把敞篷车停在了门的另一端布满沙砾的空地上，走上台阶，按下了门铃。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但里面还有双层网格门，所以我也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很快就听见了脚步声，接着网格门开了一层，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穿着黑西装的家伙。

他彬彬有礼地说："请原谅，先生。您是古德温先生？"

我点了点头。"巴斯托小姐在等我。"

"我知道。请这边走。巴斯托小姐希望在花园里会见您。"

我跟着他穿过台子，沿着一条步行道来到房子的另一侧，接着走进一片灌木丛中的树荫，来到一大片花地中。巴斯托小姐坐在角落里树荫下的一条长椅上。

"好了，我看见她了。"我说。

他停住了脚步，微微鞠了个躬，就转身走了。

她气色很差，比前天还要差，可能是睡得很不好。她忘记或者是没理会沃尔夫的叮嘱，六点之前就打来了电话。当时是我接的，她的声音听上去仿佛在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的话很简短，而且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只说了声她上午十点等我就挂断了电话。

她邀请我坐在她身边的长椅上。

前一天晚上临睡前，沃尔夫没给我任何指示。他说他宁愿我自由发挥，并重复了一句他的老生常谈：任何话都可能把蚂蚁引向核心。他还提醒我：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① 原为五月三十日，现定为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美国大多数州均作为法定假日。

情况，而且由于我们最初那出人意料的发现，很多人都把我们当成了全知全能者。然后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嘴张得能塞进一个网球，最后说了句："回来时只要别损害我们已有的优势就行。"

我对巴斯托小姐说："你也许没有兰花，但你肯定也有一两种名贵的花。"

她说："是的，我想是的。我让斯莫尔带你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我们。你别介意。"

"不，不，这里很好。我很抱歉让你心烦了，但要查清真相，没有别的办法。沃尔夫说我来收集事实，他来感觉现象。我在字典上查了'现象'这个词，没觉出有什么意义，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重复一遍他的话吧。"我掏出了笔记本，"首先，随便跟我说些情况吧。你所知道的，比如这个家庭，你多大，打算跟谁结婚，随便什么都行。"

她两手合拢放在腿上，坐在那里说了起来。其中一些我已经在报纸上读过了，或者在《名人录》上查到了，但我没有打断她。这个家里目前只有她母亲、她哥哥和她本人了。她哥哥劳伦斯今年二十七岁，比她大两岁。他二十一岁那年从荷兰大学毕业，然后荒废了五年——这个我在报上读过了，而且他也因此耗费了他父亲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和耐心。一年前他突然发现了自己在机械设计方面的天赋，于是一门心思钻了进去，特别是对飞机机械。她父母相亲相爱了三十多年。她已记不住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犯病的了，因为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萨拉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她们家从不认为这是件丢人的事，也从不试图掩盖，这只是一个亲爱的人遭遇了不幸，应当给予同情并尽可能地帮助她。布拉德福德大夫和另两位专家从神经学上作出了解释，但这对萨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她

看来那些术语是死的、冷的，而她母亲是活的、温暖的。

韦斯特切斯特的宅第是巴斯托家的祖产，但这家人每年在这里连三个月都住不满，因为从九月到次年六月他们必须住在学校里。他们每年夏天带着仆人来这里住上十到十一个星期，秋天离开时将所有的门都关上。他们认识周围乡间的许多人。她父亲的社交圈子当然很广，不限于韦斯特切斯特郡，但他最好的和最老的朋友都住得很近，开车很快就到了。她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我记了下来。我还记下了仆人们的名字和相关情况。我正忙不迭地写着，巴斯托小姐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走出了遮蔽我们的树荫，来到阳光照耀的小道上。我们的头顶上响起了飞机声，如此之近使我们不得不提高了声音。我继续写着："芬兰人，六年，纽约……"随后又抬眼看了看她。她的头高高仰起，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向上望着天空，手里来回挥舞着一只手帕。我也从树荫里跳了出来，手搭凉棚望着飞机。飞机就在我们上方，飞得很低。飞机两侧各伸出了一只手臂，也向她挥舞着。飞机降下了一点，盘旋了一圈，然后又高高飞起，很快消失在了树后。她回到了长椅上，我也坐回她身旁。她说：

"那是我哥哥。自我父亲……他还是第一次上天。"

"他一定是个非常鲁莽的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自己不飞，至少不单独飞。是曼纽尔·金布尔和他在一起，这是金布尔先生的飞机。"

"哦，就是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四个人之一。"

"是的。"

我点了点头，又把话题扯回到询问事实上。我已准备好了问高尔夫球的问题。她说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并非狂热的高尔夫球爱好者。他在大学里很少打球，最多一星期一次，夏天的时候，偶尔

一星期会打两次。他总是去青草地俱乐部打球，他是那里的会员。当然，他在那里有一个柜子装自己的随身用品。鉴于不经常玩，他的技术算是相当不错了，平均成绩为九十五到一百杆。他通常都和年龄相仿的朋友一起玩，但有时候也和儿子、女儿一起打。他的妻子从来没下场打过球。她认为，出事的那个星期天打球的四个人——E.D. 金布尔和他的儿子曼纽尔、巴斯托和儿子劳伦斯——先前从来没一起玩过。也许那天是偶尔碰到一起的，他哥哥从来没说过那天是不是预先安排的，但她知道他的确有时候和曼纽尔一起玩。她非常怀疑那天的四人赛是事先安排的，因为那是她父亲今年夏天第一次出现在青草地俱乐部。由于巴斯托夫人的病情，巴斯托一家比往年提前了三个星期来到韦斯特切斯特，而巴斯托本人当天晚上原本打算回学校的。

萨拉·巴斯托说到这里时停住了。我从笔记本上抬眼瞟了一下。她的指头扭在一起，眼睛茫然地望着小路。她开腔了，却不是对我说："现在他再也回不到那里去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所有他该做的事，都完了……"

我稍等了片刻，然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把她从那种情绪中拽了出来："你父亲整年都把他的高尔夫球包留在青草地俱乐部吗？"

她把头转向了我。"不。嗯，当然不，因为他有时候也会在学校里用。"

"他只有一包高尔夫球杆吗？"

"是的！"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么他是随身带着它们喽？你们是星期六中午到这里的。你们开车从学校来，行李放在一辆跟随的卡车中。那个包是在小汽车里还是在卡车里？"

显然我触及了她的什么痛处。她喉部的肌肉僵硬了，两臂紧紧贴在体侧，她紧张起来了。我佯装没看见，只是手拿铅笔等着。她说："我不知道。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可能是在卡车里吧，"我说，"他不是那么着迷，恐怕不会费心把它放到小汽车里。那个包现在在哪里？"

我原以为她会更加紧张，但是没有。她冷静了下来，只是语气有些生硬。"我也不知道。我想你应该知道它已经找不着了。"

"哦，"我说，"高尔夫球包找不着了？"

"是的。怀特普莱恩斯和普莱森特维尔的人到处找过了，整个宅子，整个俱乐部，甚至一切有关联的地方，但就是找不着。"

是啊，我心想，还有你，小丫头，他们找不着，你才高兴呢！我说："你的意思是，对此谁都记不起任何事情了吗？"

"是的，是这样的。"她犹豫了一下，"我听爸爸的球童说，当拉里[1] 和布拉德福德大夫送爸爸回家时，他把包放在了小汽车里司机的座位旁。但拉里和布拉德福德大夫都说没看见。"

"奇怪。我知道我到这里不是来收集看法的，而是收集事实的。但是，巴斯托小姐，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问一句，你难道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

"一点也不奇怪。在那样的时刻，他们不大可能注意到一个高尔夫球包。"

"但是在他们到达这里后一定是有人把它拿开了，是某个仆人，或者是司机……"

"没人记得了。"

---

[1] 拉里是劳伦斯的昵称。

“我可以和他们谈谈吗？”

“当然。”她轻蔑地说道。我不知道她曾经作过怎样的人生规划，但我本该警告她别涉足这条道的。

就是这样。在我看来，果仁已经没了，剩下的坚果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我用眼睛直盯着她的眼睛。

“你父亲用的是什么样的发球杆？钢柄的还是木柄的。”

“木柄的。他不喜欢钢的。”

“表面是平的还是嵌入的？”

“平的，我想。我想是这样。我不敢肯定。拉里的杆是嵌入的。我的也是。”

“你好像对你哥哥的事情记得都挺清楚。”

“是的。”她的眼睛平视着我，“我想，这不是在审讯吧，古德温先生？”

“抱歉。”我冲她咧嘴一笑，“请原谅，我有些心烦了，甚至有些痛苦。在韦斯特切斯特郡，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个高尔夫球包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了，特别是那根发球杆。”

“我很抱歉。”

“哦，不，你不用道歉。这提出了很多问题。是谁把包从车里拿走了？如果是一个仆人，那么是谁，他有多忠实、正直、不易收买？五天后，当人们都知道了其中的一根球杆成了凶手专门设计的凶器时，是谁把它藏了起来或毁掉了？是你，还是你哥哥，还是布拉德福德大夫？你看看我面临的这些问题。还有它藏在哪里或者怎样被毁的？这么大的事情，心里头不惦记是不大容易的。”

我还没说完，她就站了起来，神情泰然自若，声音也很镇定。“够了。协议可没规定我要对胡猜乱想洗耳恭听。”

“说得好，巴斯托小姐，”我也站了起来，“你说得完全正确，但我并非有意冒犯，我只是有些心烦意乱。现在，如果我能见见你母亲，我就不会心烦了。”

“不，你不能见她。”

“这可是协议规定的。”

“你已经破坏了协议。”

“胡说。”我咧嘴一笑，“正是协议规定的我在你面前可以无拘无束的。但我不会对你母亲造次的。我虽然是个粗人，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彬彬有礼。”

她看了看我。“五分钟够不够？”

“不知道，我争取尽可能地短。”

她转身走上了通向房子的小道，我跟着她。路上我看见了很多鹅卵石，真想狠踢一脚。丢失的高尔夫球包是个关键之物。我当然没指望那天晚上能把那根发球杆带回给沃尔夫看，因为安德森肯定会把它拿走。我相信他有能力将所有的事实综合起来作出判断，我本指望求萨拉·巴斯托去说服他，让我草草看上一眼。但现在——该死的整个包都丢了！无论这是谁干的，给我的都不仅仅是痛苦，简直是让我完全麻木了。如果只是发球杆丢了还说得通，为什么是整个包都丢了呢？

房子内部很大，是那种大多数人除了在电影里，平时根本看不到的房子。虽然有很多窗户，但并不是到处都有光。光很柔和，地毯和家具都很干净，看上去很精致也很昂贵。室内到处摆着花，香气扑鼻。由于室外的阳光越来越热，室内感觉非常凉爽宜人。萨拉·巴斯托领着我穿过了一个大厅和一间大屋子，来到另一个厅，又进了厅的另一端的一扇门。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阳光房内，房

子的一面全是玻璃，不过大部分窗帘都拉着，并没有多少阳光进来。屋里种着一些植物，摆着许多柳条椅和长沙发。其中一张桌旁的椅子里坐着一位妇人，正在摆弄拼图玩具。巴斯托小姐走向了她。

“妈妈，这位是古德温先生。我跟您说过他要来的。”她又转向我指了指一把椅子，我坐下了。巴斯托夫人让拼图板从她的指间滑落下去，然后转头看着我。

她很端庄。她女儿说她五十六岁，可看上去像过了六十岁。她的眼睛暗淡无光，眼窝深陷，头发几乎全白了。尽管她那清秀的面孔非常镇定，但我仍然感到那表情很做作、不自然，是坚强的意志力的产物。她一直盯着我看，一言不发，直到我以为自己的表情太不镇定了。萨拉·巴斯托坐在了稍远处一把椅子上。我正想开口，巴斯托夫人却突然开了腔：

“我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古德温先生。”

我点了点头。“其实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而是我的雇主尼禄·沃尔夫先生。他请我感谢您准许我来访。”

“我们也欢迎他来。”深陷在眼窝里暗淡无光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实际上，我很感激有人——哪怕是我从没见过的陌生人——承认我有权力决定谁能进这个家的门。”

“妈妈！”

“是的，萨拉，别生气，宝贝。我知道这个权力没有被剥夺，不过这位古德温先生知不知道是无所谓的。不是你逼我放弃权力的，也不是你爸爸。按照坦的说法，是上帝。也许上帝歇手了，结果撒旦造成了这一不幸。”

“妈妈，求您了。”萨拉·巴斯托站起身来，走近了我们，“古德温先生，如果你有什么要问的……”

我说："我有两个问题。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巴斯托太太？"

"当然。那是你的差事。"

"好的。第一个问题好问但可能不好答。也就是说，需要思考和长久地回忆。而在所有人中，恐怕您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有谁想，或者是曾想过杀害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先生？谁和他有仇，不管是新仇还是旧恨？他有什么敌人吗？有谁恨他吗？"

"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四个。"

"嗯，也许我可以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没必要。"她依然很镇定，"这些问题都可以马上回答。是我。"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她女儿站到了她身旁，一只手搭在了她肩上。

"妈妈！您答应过我……"

"好了，萨拉。"巴斯托夫人伸出手拍了拍她女儿的手，"你没有准许其他那些人来见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古德温先生要问我问题，那我必须作出回答。你还记得你爸爸怎么说的吗？永远不要伏击事实。"

巴斯托小姐又转向了我。"古德温先生！求您了！"

"住口。"那暗淡无光的眼睛突然闪出光来，"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孩子，不比你可能给我提供的保护差。古德温先生，我已经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别催我，巴斯托太太。"我看出只要我权当萨拉·巴斯托根本不在场，那双暗淡无光的老眼就会始终盯着我，"我第一个问题还没问完。也许还有其他人，也许不止您一个。"

"其他想杀我丈夫的人？"她的意志第一次松弛了，结果一丝微笑浮现在她的嘴唇上，"没有，不可能有。我丈夫是个好人，正直、

仁慈，深受人们的爱戴。我明白你要我做什么了，古德温先生，你想让我回忆所有那些年，无论是幸福的日子还是悲惨的日子，然后搜肠刮肚地为你挑出一些我丈夫对别人犯下的残忍的错误或者造成的凶恶的威胁。我向你保证，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丈夫没有亏待过任何人，他没有任何敌人。他也没有其他女人。他没有对我做错事。我对你问题的回答是直率而坦诚的，这对我也是一个解脱。但既然你这么年轻，比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你也许像我女儿一样感到震惊。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解释我的回答的。我不想误导你。我不想让我女儿痛苦。上帝让我放弃权力，并不是这个原因。假如你理解上帝，你也就会理解我的回答。"

"好的，巴斯托太太。那么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要悬赏？"

"不！"萨拉·巴斯托挡在了我们中间，"不！不！别再问了……"

"萨拉！"巴斯托夫人的声音是严厉的，但随后又缓和了一点儿，"萨拉，亲爱的。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分内的事情。你要阻挡我们吗，萨拉？"

萨拉·巴斯托走到她母亲身旁，用胳膊抱住了她的肩膀，将额头埋在了她灰白色的头发里。

她又恢复了意志，也恢复了镇定。"是的，古德温先生，我悬赏了。我并没有神经错乱，我只是有些胡思乱想。我现在非常后悔，因为我觉得那太龌龊了。我是在异想天开的状态下产生了这个独特的复仇念头的。没有人会谋杀我丈夫，因为没有人想这么做。我确信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没有人希望他死了，而我也只是在上帝对我施加他哪怕对罪孽最深重的人都没有施加过的折磨时，才会有这种想法。我的突发奇想是，也许有人聪明得能对上帝本人进行审判。

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你，古德温先生。我不了解你的雇主。我现在很后悔那个悬赏，但如果有人能挣到那笔赏金，我会支付的。”

“谢谢您，巴斯托太太。坦是谁？”

“什么？”

“坦。您刚才说是坦告诉您上帝逼您放弃了您的权力。”

“哦，当然。是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

“谢谢您。”我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沃尔夫先生要求我感谢您的克制忍耐。我猜他知道，一旦我做了笔记，里面就一定会有线索的。”

“告诉沃尔夫先生我也欢迎他来。”

我转身走了出去，心想巴斯托小姐可以好好利用利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了。

第九章

巴斯托小姐邀我共进午餐。

我比先前更喜欢她了。我在连接日光室与其他房子的一个大厅里等了她大约十分钟。她进来后并没有责怪我，我明白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对巴斯托夫人死缠烂打，是她自己将那些情况和盘托出的，那怪不着我。但有多少人会像萨拉·巴斯托那样想问题呢？怕是一千人里也挑不出一个吧。即使他们明白我无可指责，仍然会疾言厉色的，但她没有。她跟我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忠实地履行了诺言，不管这给她带来了多少不眠之夜和厄运。她无疑承受了不少痛苦。我能看出无论十分钟前还是十分钟后，巴斯托夫人的想法都会是不同的，原本我这一天的时间只能换来彬彬有礼的沉默。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她改变了主意，一下子变得畅所欲言起来，如果是我的蓝衬衣和褐色领带，那我买它们的钱倒是真没白花。

绍尔·潘策尔肯定会说："好可爱的乖乖。"

她邀我共进午餐。她说她哥哥也会来，既然我想见他，那时会很方便。我谢了她，并说："你真幸运，巴斯托小姐，真的。谢天谢地沃尔夫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想出了与你达成的协议，因为如果你陷入麻烦，这是唯一能帮助你解脱的办法。"

"如果我陷入麻烦……"她说。

我点了点头。"没错，我知道你已经有很多麻烦了，但最让你烦恼的是，你担心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我只想说，你真的很幸运。"

最终的结果是，我不仅在午餐时见到了她哥哥，还见到了曼纽尔·金布尔。对此我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那天上午我了解到的情况使得参加了高尔夫球四人赛的人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此前的一天下午，我在打了两个小时电话后，终于辗转找到了青草地俱乐部的教练，他接受了沃尔夫共进晚餐的邀请。他以前从未与巴斯托打过交道，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但沃尔夫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大量有关该俱乐部总体设施和球道等方面的情况。那位教练将近午夜时分离开，那时他已经灌下了整整一瓶沃尔夫最好的葡萄酒，而沃尔夫对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了解，也足以让他本人去做职业教练了。他了解到俱乐部会员的包都是放在自己的柜子里的，而有些人的柜子是不上锁的，即使上了锁，别有用心的人也能不费吹灰之力搞到复制钥匙。当然，有了这把钥匙，瞅个空把柜子打开，从包里拿出发球杆另换一根，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这样看来，星期天和巴斯托一起比赛的人的嫌疑，丝毫不比那天进过休息室的所有打球者或旁观者大。

而现在情况不同了。鉴于巴斯托的球包自九月前起就不在柜子里，因为他是从学校带着球杆去的，这就改变了整个情形，使那天

一起打四人赛的人员比其他人更令人感兴趣了。

我们吃饭的地方肯定不是餐厅，因为不够大，但里面倒的确有桌有椅有窗户。窗外是浓密的树木，所以看不见外面的景象。有一个穿着黑制服、又高又瘦的家伙——或者说是管家斯莫尔，像我这样经常在外做客的人再熟悉不过了——在为我们服务，但饭菜的口味在我看来就太差劲了，简直会令弗里茨耻笑。桌子很小，我坐在巴斯托小姐对面，她哥哥在我左边，曼纽尔·金布尔在我右边。

劳伦斯·巴斯托一点儿也不像他妹妹，能看出和他妈妈有几分相像。他思路清晰，有着他那种生活所特有的自信。他面目清秀，五官端正，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像他这样的人，我在华尔街的餐厅里见过成百上千。他看人时是斜睨的，但我认为那也许是因为坐在小飞机里被风吹了眼睛。他的眼睛暗淡无光，像他母亲一样，但眼神中看不出有他母亲那么多清规戒律。

曼纽尔·金布尔则完全不同。他皮肤黝黑，粗壮敦实，短小精悍，黑色的头发直直地向后梳着，两只黑色的眼睛滴溜溜地在我们身上打着转，只有在看萨拉·巴斯托时才会停留片刻，露出些许的满足。他弄得我有些紧张，在我看来他也让萨拉·巴斯托有些紧张，不过这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我是怎样介入这场家庭危机的，而且似乎也不大可能知道了。那天上午巴斯托小姐告诉我金布尔家和巴斯托家并无交情，两家唯一的接触机会就是夏季住宅相距较近，再有就是由于拉里·巴斯托对飞机设计产生了兴趣，而曼纽尔是位熟练的业余飞行员，他能将拉里带上天，教他开飞机。今年夏天之前，她本人只和曼纽尔上过两三次天，另外几乎就没见过他，除了有几次陪着她哥哥。金布尔一家是新搬来的，他们三年前才买下了在此以南两英里外的房子。巴斯托家只是通过一些并不经常举行的大型

社交活动，才对曼纽尔的父亲E.D.金布尔略有了解的。据她模模糊糊地推断，曼纽尔的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拉里带曼纽尔来，在巴斯托家的网球场上为打赌赛了一场球，她父亲和她分别做了裁判和司线员，除此之外，她不记得她父亲和曼纽尔·金布尔还有什么别的交谈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曼纽尔·金布尔充满兴趣。不管怎么说，他是高尔夫球四人赛中的一员，他长得像个外国人，有个奇怪的姓名组合，而且他还让我感到了紧张。

午餐的话题大都是围绕飞机展开的。是萨拉·巴斯托坚持维系着这个话题的。一旦有冷场迹象她就续上。有一两次她哥哥想挑起那个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但都被她断然阻止了。我只是埋头吃饭。当巴斯托小姐最终将椅子向后一推，并碰到了斯莫尔的肚子时，我们就都站起来了。拉里·巴斯托几乎是第一次直接对我说话，从他的神态语气我能看出，他此前一定在背后痛骂过我。

“你想见我？”

我点点头：“如果你能抽出十五分钟的话。”

他转身对曼纽尔·金布尔说：“曼尼，你不介意等等吧？我答应过妹妹，要和这个人谈一谈。”

“当然。”他的眼光突然落在了萨拉·巴斯托身上，“也许巴斯托小姐可以赏光，陪我等一会儿。”

她说可以，却毫不热情。于是我插话了：“我很抱歉。”又对巴斯托小姐说道，“我能提醒你一句吗？你答应过和你哥哥一起同我谈话的。”我们其实从未这样说过，但我希望她在场。

她看上去如释重负：“哦，是的。我很抱歉，金布尔先生，我们能请你在这儿喝杯咖啡吗？”

“不了，谢谢。”他向她欠了欠身，又转向了拉里，“我先走了，我要去看看那些输气管。你有什么车能送我一趟吗？谢谢。我愿意随时在飞机库见到你——午餐很愉快，谢谢你，巴斯托小姐。”

他令我惊奇的事情之一就是他的声音。看他那副样子，我以为他会是个男高音，可他像个低声哞哞叫的公牛，声音很低沉，还夹杂着一些隆隆声，但他把声音放得很低，语气也令人愉快。拉里·巴斯托和他一起出去，找人送他回家。我和他妹妹一起等着他回来，然后我们三人走进花园，来到我早上坐过的那张长椅前。拉里坐在了草地上，巴斯托小姐和我坐在了长椅上。

我解释说，我希望巴斯托小姐在场，是因为她与尼禄·沃尔夫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她能因为我们没有说任何违反协议的话，没有做任何违反协议的事，而感到满意。我当然有很多问题想问劳伦斯·巴斯托，但如果有哪些问题她认为我无权知道答案，那就由她来回答。

她说：“很好，我在这里。”她似乎不再装腔作势了。上午她坐在这里，两肩直直地耸立着，现在却松弛了下来。

她哥哥说道：“就我所知，你姓古德温，对吗？”

“对。”

“好吧，就我所知，你们的协议，所谓的协议，不过是一份卑鄙的侮辱。”

“还有别的词吗？”

“有，如果你想听的话。是敲诈勒索。”

他妹妹顿时色变。“拉里！我怎么对你说的？”

“请等一等，巴斯托小姐。”我迅速翻着我的笔记本，“也许你哥哥应该听一听。我马上就能找到。”我翻到了那页，“在这里。”我一

字一顿地念完了沃尔夫的话，然后合上了笔记本，"这就是协议，巴斯托先生。我也许还应该说一点，我的雇主尼禄·沃尔夫先生很好地控制了他的脾气，但我经常管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你再说他敲诈勒索，那么恐怕一切就全完了。如果一个人不识别人施予的恩惠，我想他一定会认为给他嘴里塞上臭袜子倒是赞扬了。"

他说："妹妹，你最好还是进屋去。"

"她可以过一会儿再走，"我说，"如果协议被扔到船外，她应该看着它沉下去。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协议，你为什么要让她单独去沃尔夫的办公室商量？他本来很想见你的。他对你妹妹说过，无论如何我们会把调查进行下去。这是我们的事，不仅是这件该死的案子，还有很多案子我们都要调查下去。我再跟你说一遍：无论协议达得成还是达不成，我们都要找出杀害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的凶手。在我看来，你妹妹在这个协议中占了很大便宜。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一定有什么原因，而这也将是我们调查的项目之一。"

"拉里，"巴斯托小姐喊了一声，声音意味深长，她重复了一遍，"拉里。"既是在告诉他什么，又是在恳求和提醒他什么。

"来吧，"我说，"午餐时你们都在打量我、审视我，这没有用，但如果你的飞机出了什么故障，你不会只是又叫又跳的，你会脱下外套去帮忙修理的。"

他坐下了，不是看着我，而是看着他妹妹。他的下嘴唇向外撅着，使他看上去既像一个马上要哭出声的婴儿，又像一个要向世界怒吼"见鬼去吧"的男人。

"好吧，妹妹。"他最终开腔了。他没有表露出向我道歉的意思，但我想有朝一日他会的。

当我开始提问后，他的情绪恢复了平静。他回答得既迅速又直

率，在我看来，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就连那个像是把他妹妹变成了一条在岸上扑腾的垂死的鱼的高尔夫球包，他都回答得既清楚又毫无磕绊。那个包是放在卡车里从学校拉过来的，小轿车里除了他妈妈的一个手提箱外没有其他行李。卡车于下午三点到达后立刻卸下了行李并送至各处。那个高尔夫球包应该是直接送到了他父亲的房子里，不过他不能确定。星期天早餐时他和他父亲商量了下午打高尔夫球的事……

"是谁提出的？是你还是你父亲？"

他记不起来了。午餐后他父亲下楼时，腋下已经夹着那个球包了。他们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去了青草地俱乐部。停好车后，他父亲拿着自己的包径直去了第一发球区，拉里则四处去找球童。他们没有专门的球童，但他父亲去年夏天曾表示过对其中一个的喜爱，那男孩恰好在，拉里就带着他和另一个男孩回来了。在去第一发球区的路上，拉里碰到了金布尔父子，他们也正准备开球。由于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曼纽尔了，热切地想和他讨论夏天的飞行计划，于是他便提出他们一起打四人赛，他相信他父亲是不会介意的。当他们来到发球区时，他父亲已经到另一边去了，正在用五号铁头杆练习。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对金布尔父子很热情，并高兴地向他的球童打了招呼，吩咐他去捡球。

他们等别人打了两三场后才开球。曼纽尔·金布尔第一个开球，然后是拉里，然后是巴斯托，最后是老金布尔。拉里记不清他父亲是从球包里还是从球童手里拿过发球杆的了，在他们等待时，他一直在忙着和曼纽尔谈话。在他父亲准备发球时，拉里本人正在发球。但他的确记住了父亲挥杆击球的那一瞬间，因为出现了极不寻常的情况。球杆挥出后，突然奇怪地一晃，击球部位很不准确。球滑出

后，他父亲突然尖叫了一声，脸上也呈现出了惊愕的神情，并开始抓自己的肚子。他们忙问怎么回事，他说好像是被黄蜂或马蜂之类的蜇了一下，并开始解开衬衫纽扣。父亲的焦躁神情给拉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里仔细检查了他父亲的皮肤。有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穿孔，而他父亲此时恢复了平静，坚持说没有问题。于是老金布尔也开了球，他们都回到球道上继续比赛。

此后的情况被报纸详细描述了无数遍。三十分钟后，在第四洞前的球道上，巴斯托突然倒在地上，不停地蹬着腿抓着草。当球童抓住他胳膊时他还活着，但当其他人跑过去时，他已经咽了气。许多人围了过来，其中有巴斯托家的老朋友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曼纽尔·金布尔把小轿车开到了出事球道的边上。遗体被抬到了后座上，布拉德福德大夫坐在那里，将他老朋友的头放在了自己的腿上，是拉里开的车。

拉里记不起那个球包的下落了。一点也没有印象了。他知道那个球童的说法：球包被放在了前座旁边，但无论是在开车时还是在其他时候，他都不记得是不是见过它了。他说那六英里他开得很慢很小心，到家时他发现自己的下嘴唇上全是血，是被自己咬破的。他是个比他妹妹更好的撒谎家。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无意泄露，我真的要被他编的故事骗过了。我从能想到的各个角度试探过他，他都说得滴水不漏。

我放过了这个问题，又向他问起金布尔家的情况。他的说法和他妹妹一样。两家之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交往，唯一的联系就是他本人和曼纽尔，而这联系的枢纽就是曼纽尔是那架飞机的主人和飞行员。拉里希望自己考到驾照后也马上买一架。

然后我又问了午餐前引发巴斯托夫人激动的那个问题。既问了

拉里也问了他妹妹，但不仅没有点起他们的火，而且没有激起任何波澜。他们都说不知道什么人会与他们的父亲有深仇大恨，也不知道什么人会厌恶他或对他怀有敌意，这样的人简直不可想象。他四十八岁当上了荷兰大学的校长，迄今已有十年，在他非同寻常的一生中，也曾遇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但他都巧妙地化解了矛盾，而不是激发了冲突。他的私生活仅限于自己的家庭内。我猜测，他儿子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爱戴，而他女儿则深深地热爱他。他们一致认为没有人会恨他。由于三个小时前，他女儿刚刚听到她母亲告诉我的那些话，所以她在说这些话时，眼里既有对我的挑战，也有对我的恳求。

接着是关于布拉德福德大夫的问题，我没有再问劳伦斯，而是问了巴斯托小姐。他们似乎已串通好了，因为我希望她能在某些地方显示出犹豫或遮掩，但根本没有这样的迹象。她用很快的语速说，布拉德福德是她父亲的大学校友，他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而布拉德福德作为鳏夫，都快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特别是在夏季，因为这时他也是他们的邻居。他是这个家庭的医生，巴斯托夫人的病全都靠他治疗，尽管他也请了一些专家来协助。

我问萨拉·巴斯托："你喜欢他吗？"

"喜欢他？"

"是的。你喜欢布拉德福德大夫吗？"

"当然。他是我认识的最好最优秀的人之一。"

我又问她哥哥："巴斯托先生，你喜欢他吗？"

拉里皱起了眉头。他有些厌倦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很耐心，虽然我已经盘问了他两个小时了。"我很喜欢他。我妹妹说得都对，不过他有些爱说教。倒不是他现在让我烦，而是我小的时候，总是躲

着他。”

“你们是星期六中午从学校来到这里的。从那时候到星期天下午两点，布拉德福德大夫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星期六他在这儿吃的晚饭。”

“你认为他有可能杀害你父亲吗？”

拉里瞪大了眼睛。“哦，看到上帝的分上，你要吓死我吗？”

“巴斯托小姐，你呢？”

“简直是胡说。”

“好的，就算是胡说，不过，是谁最先向布拉德福德大夫提出死因应当是心脏病的？是你们俩中的哪一位？还是他本人？”

拉里的眼里闪出了怒火。他妹妹平静地说道：“你说你希望我在这里，是监督协议得到遵守的。那么，古德温先生，我已经——够耐心的了。”

“好的，这个问题不问了。”我转向了她哥哥，“你又生气了，巴斯托先生，消消火吧。像你这样的人不大习惯被人冒犯，但如果你明白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你会惊讶于其好处的。我只有一两个问题了。六月五日，星期一晚上七点到午夜之间，你们在哪里？”

他仍然怒目而视。“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能记起来的。这不是冒犯。我郑重地要求你回答这个问题。六月五日，星期一。你父亲的葬礼是星期二举行的。我问的是葬礼前一天的晚上。”

巴斯托小姐说道：“我来回答。”

“我希望他来回答，求你了。”

他说话了：“我没理由不回答，也没理由回答。我在这儿，在家

里。”

“整个晚上都在吗？”

“是的。”

“还有谁在这儿？”

“我妈妈和妹妹，仆人，还有罗伯逊一家。”

“罗伯逊一家？”

“我是这么说的。”

他妹妹接了过去：“罗伯逊一家是我们的老朋友。布莱尔·罗伯逊先生和太太，还有两个女儿。”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就在晚餐后。当时我们还没吃完呢。大约是七点三十分吧。”

“布拉德福德大夫在这里吗？”

“不在。”

“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特殊情况？为什么？哦，是的，当然有了。他去纽约开一个会，一个什么专业会议。”

“我明白了。谢谢你，巴斯托小姐。”我又转向了她哥哥，“我还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是请求。曼纽尔·金布尔的飞机库有电话吗？”

“有。”

“你能给他打个电话吗？说我想和他谈谈，而你希望他能见我一次。”

“不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巴斯托小姐说：“你没有权利提这样的要求。如果你想见金布尔先生，那是你自己的事。”

“正确，”我合上了笔记本，站起身来，“完全正确。但是在这件

事情上我没有任何官方的身份。如果我亲自打电话给曼纽尔·金布尔，他一定会拒绝的。他是你们家的朋友，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我需要人介绍一下。”

“你当然需要。”拉里也站了起来，拍打着沾在他裤子上的草，“但你得不到。你的帽子在哪里，在屋里吗？”

我点了点头。“等你进了屋，走到电话机旁，我就能得到。你看，是这样的，我需要你打电话给曼纽尔·金布尔，还有罗伯逊家，还有青草地俱乐部。这是我现在想得起来的，不过也许已经有点晚了。我需要见见这些人，问些情况，你们给我提供的方便越多，你们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尼禄·沃尔夫了解足够多的情况，他也告诉了警察不少，这才使他们挖出了你们父亲的遗体。这桩交易很公平，但他并没有把一切都透露给警方。你们是想逼我去找地区检察官，再倒出足够多的豆子，以便让他给我一份许可，去我想去的地方吗？他现在对我们很不满，因为他知道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可以马上去和他交个朋友。我不在乎。我很愿意交朋友。但你们这些家伙可不是。如果你认为这是敲诈勒索，巴斯托先生，那我就去拿上我的帽子，今天就算结束了。”

这是犯罪，但我不得不这么做。这兄妹俩，尤其是哥哥，他们一生都太平安、太独立、太有尊严了，所以他们总是忘记他们有多害怕，所以不得不时时提醒他们一下。但一到关键问题上，他们就怕得要死。如果那天下午我能为所欲为的话，真该好好吓唬吓唬他们。

当然，他们屈服了。我们一起进了屋，萨拉·巴斯托给罗伯逊家打了电话，她哥哥给青草地俱乐部和曼纽尔·金布尔打了电话。我想恐怕不大可能从仆人们那里挖出什么了，尤其是当他们受过那

个又高又瘦的管家的训练后。于是，电话一结束，我就去厅里拿上了我的巴拿马草帽准备走了。拉里·巴斯托陪着我走到侧门的台阶上，我估计他是想确认我不会溜回来透过钥匙孔偷听。我们刚到台阶上，就见一辆小汽车从路上开了过来，停在了我们面前。一个男人走了出来，我一看，是H.R.科贝特，就是那天早上我把门时试图闯进来见沃尔夫的安德森手下的侦探。我不禁喜笑颜开，欢快地向他敬了个礼，打算走开，但他叫住了我：

“嘿，是你？”

我停住脚步转过身。拉里·巴斯托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我说：“你在跟我说话吗，警官先生？”

科贝特走到我身旁，他没有注意到我的把戏。“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咧嘴向他微笑了片刻，然后转身对台阶上的拉里·巴斯托说道：“巴斯托先生，既然这里是你家，还是你来告诉他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吧。”

从拉里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他也许永远不会给我寄圣诞卡，但我得到圣诞卡的可能性远比科贝特大得多。他对那侦探说道：“古德温先生是应我妹妹之邀来为我们提供咨询的。你要对此进行调查吗？”

科贝特哼了一声，怒视着我。“也许你想去一趟怀特普莱恩斯。”

“一点儿也不。”我摇了摇头，“我不喜欢那地方，你们太笨了，连个赌都不肯打。”我迈开了步伐，“再见，科贝特。我不希望你走霉运，因为即便红运当头你们也成不了大事。”

不等他想出反驳的话，也不等他再发出什么警告，我径直走到停敞篷车的地方，钻进去发动了车，扬长而去。

第十章

我先去了罗伯逊家，因为我觉得在那里待不了多久，不妨先去。罗伯逊夫人和两个女儿都在家，因为萨拉·巴斯托打了电话，所以她们都在等我。她们说六月五日，也就是葬礼前一天晚上，她们在巴斯托家，大约八点前到的，午夜才离开。她们确认拉里、萨拉和巴斯托夫人整个晚上都在家。我确认了她们不会弄错日期，又随便问了一些关于巴斯托家的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罗伯逊一家不愿意在那天下午与一个陌生人谈论她们的老朋友，她们甚至不肯透露巴斯托夫人有病，说她完全正常。她们并没有说出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

五点刚过，我来到了金布尔家。这里不像巴斯托家那样装饰华丽，但要大得多。我驾车进入他们的私家道路后，还开了半英里多。宅院的主体在低地上，还有几段老石墙穿越草地，有几条小溪蜿蜒其间。左边有几片树林。房子在一个小丘上，四周是栽满常青树的

园子，有一片修剪得很好的草坪，我开车经过时没有看见花。房子不像巴斯托家那么大，却是崭新的，用木材和水泥预制板建成，房顶是一个既高又陡的大斜坡。这是一种我很不喜欢的风格，我称之为威廉王后式。

房子后面，也在小丘上，是一片巨大而平坦的草坪。我开过来时，一个身穿管家制服的胖男人从屋里走出来，向我指了那个方向，我沿着一条狭窄的碎石小路开了过去。这片大草坪上没有石墙，既平整又干净，显然不久前刚刚修剪过——这无疑是个私人飞机降落场。在其中线的边缘有一个矮矮的水泥房子，屋顶是平的，碎石小路将我带到了那里。房子前有一条又宽又长的跑道，上面停了两辆小汽车。

我在房子里看到了曼纽尔·金布尔，他正在一个水槽里洗手。房子的大部分都被飞机占满了。这是一个大家伙，机身是红色的，机翼是黑色的。机尾着地，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正在里面修补着什么。房子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净整洁。工具、油罐和许多杂物都被摆放在沿一面墙排开的钢架上。水槽旁甚至还有一个毛巾架，上面搭着三四条干净的毛巾。

"我叫古德温。"我说道。

金布尔点了点头。"知道了，我在等你。我一天都在这儿，咱们还是到屋里去吧，那儿舒服些。"他又对穿着工作服的人说，"斯金纳，如果你愿意，明天再干吧，我明天下午之前不会飞的。"他擦干手后，就领我出了机库。他坐进了自己的小汽车，我也钻进了敞篷车，一起开回了宅子。

虽然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并且在午餐时弄得我有些紧张，但毫无疑问，他端庄得体，彬彬有礼。他领着我走进了靠前的一间大

屋子，让我坐在一把舒服的皮椅上，又吩咐胖管家去拿些加冰威士忌来。见我四下张望，他说房子是他和父亲根据自己的口味布置的，因为家里不用考虑女人的需求，而他们俩都不喜欢装饰。

我点了点头说："巴斯托小姐告诉我，你母亲很久前就去世了。"

我是不假思索随口说的，但不管我同谁说话，眼睛都会看着对方，结果他脸上出现的表情令我大吃一惊。那是一阵痉挛，除此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词来形容了。尽管只持续了不到一秒，但那一瞬间无疑是触发了他内心深深的伤痛。我不知道仅仅是因为我提及了他母亲，还是他的确有什么苦衷，但无论如何我没有再尝试。

他说："我明白你是来调查巴斯托小姐父亲之死的。"

"是的。某种意义上，是应她之邀。死者也是拉里·巴斯托的父亲，巴斯托太太的丈夫。"

他笑了，黑色的眼睛突然转向了我。"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只能一言以蔽之：装腔作势。我的回答是'不'，我没有权利以那种方式来分析死者，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爱好。我——非常——钦慕巴斯托小姐。"

"很好。我也一样。这不是问题，只是一个提醒。我真正要问你的是星期天下午在第一发球区发生的情况。我想你已经多次对人谈过了吧。"

"是的。两次对一个侦探，我想是叫科贝特，一次是对安德森先生。"

"那你一定是烂熟于心了。你介意再谈一遍吗？"

我拿着威士忌向椅子上一靠，听他讲着，一次也没打断。我没有用笔记本记录，因为已经有拉里的叙述作参照，我可以随后把差异之处记下来。曼纽尔·金布尔讲得既详细又精确。当他讲完后，

已没什么问题可问了，但有那么一两处我不大满意，特别是有一处他与拉里讲得不一致。曼纽尔说巴斯托在认为有黄蜂蜇了他后，将发球杆扔在了草地上，他的球童捡了起来。拉里则说他父亲是一手高举着球杆，另一只手解开了衬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曼纽尔说他相信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但如果拉里还有别的说法，他也不坚持。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球杆被放回了包里。在其他方面，曼纽尔的叙述都与拉里别无二致。

他叫人送来了更多的威士忌，受此鼓励，我把话题范围稍稍扩大了一些。他似乎也不反对。我了解到他父亲是一位谷物经纪人，每天都要去纽约珍珠街的办公室，而曼纽尔本人则在考虑建立一个飞机制造厂。他说自己是一个技术已臻炉火纯青的飞行员，他曾在布法罗的法克勒工厂干过一年。尽管他父亲对飞机一窍不通，对飞机厂的前景也不看好，但答应提供必要的资金。曼纽尔认为拉里·巴斯托在结构设计方面绝对是个天才，希望能说服他入股。他说：

“当然现在拉里的情绪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不会催他的。这毫不奇怪，先是他父亲突然去世了，接着验尸又发现了如此惊人的结果。对了，古德温先生，毫无疑问所有的知情人都感到很奇怪，尼禄·沃尔夫——是这个名字吧？——他怎么如此精确地预测了验尸结果？郡检察官安德森暗示说线索出自他自己的消息来源——前些天他也来问过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但真实的情况已经广为人知了。前天我去了青草地俱乐部，那里的人们只有两个话题：谁杀了巴斯托，尼禄·沃尔夫又是怎么知道的。你打算怎么办，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揭开两个谜底吗？”

“也许。我希望是这样，金布尔先生。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先回答

后一个问题的。不，谢谢，不要再给我倒酒了。再喝上你一杯如此美味的威士忌，我会问什么答什么的。但即使你把我灌醉了，我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那就务必再喝一杯。当然，像所有人一样，我只是好奇。尼禄·沃尔夫一定是个奇人。”

“好吧，我来告诉你。”我将头猛地向后一仰，仿佛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但在光溜溜的冰块滑过我的上嘴唇时，我将剩余的酒轻轻地吐人冰块中，然后下巴和酒杯一齐落下。这只是我的小技巧之一。我看见曼纽尔·金布尔好奇地看着我，他刚才也说了他很好奇，所以这不能说明我有任何细微的发现。我说：“如果尼禄·沃尔夫不是奇人的话，拿破仑永远也升不到上士。我不能告诉你他的秘密，我很抱歉，但我必须赚他付给我的这份钱，哪怕是只需要我闭上嘴。这使我想起——”我抬腕看了一眼手表，“现在一定是你的晚餐时间了。你很热情，金布尔先生，我很感激，尼禄·沃尔夫也会感激的。”

“别客气。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着急。我父亲不回家，我不愿意一个人吃饭。稍晚些时候我会开车去俱乐部吃晚餐的。”

“哦，”我说，“你父亲不回家？这我倒没想到。我本打算到普莱森特维尔或怀特普莱恩斯找点吃的，然后再回来和他谈谈。说实话，我刚才想要求你告诉他一声，说我要来的。”

“我很抱歉。”

“他今晚不回家吗？”

“不回来。上星期他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去芝加哥了。你并不是第一个为此感到失望的人。安德森先生和那个侦探每天都打电话找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毕竟，他几乎都不认识巴斯托。我想尽管他们打

了电报，他也不会回来的，除非他把事情都办完。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一定会把事情办完的。”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也说不好。十五号左右吧，他走的时候是这么估计的。”

“嗯，那就太糟了。当然，这只是例行公事，任何侦探都会与当时打高尔夫球的四个人都谈一谈的。既然你没法帮我见到你父亲，你能帮我另一个忙吗？这更是例行公事了。请告诉我六月五日星期一晚上七点至午夜你在哪里。就是巴斯托葬礼前一天晚上。你参加葬礼了吗？”

曼纽尔·金布尔的黑眼睛直盯着我，眨都不眨，仿佛在努力回忆着什么。“我参加了葬礼，”他说，“是的，那天是星期二。一星期前的今天……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没错，我敢肯定，斯金纳也知道，我在天上飞呢。”

“在天上飞？”

他点了点头。“我一直在尝试夜间飞行和着陆。五月份已经试过好几次了，那个星期一晚上又试了一次。你可以去问斯金纳，是他帮助我起飞的。我让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以确保所有的灯都亮着。夜间飞行真的很难，和白天飞行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什么时候起飞的？”

“大约六点。当然，将近九点时天才黑的，但我想赶在黄昏前起飞。”

“那么你当然是赶在了黄昏前。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十点或者是十点过一点儿。斯金纳也知道。我们一起拿着计时器一直闲荡到半夜。”

“你是一个人上天的吗？”

“就我一人。”曼纽尔·金布尔动了动嘴唇向我微笑了一下，但我觉得他的眼睛并没有配合，“你必须承认，古德温先生，我已经够忍耐的了。我星期一晚上或其他晚上飞行与你有什么相干？如果我不是那么好奇，我恐怕有理由生气了。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没错。”我咧嘴一笑，“如果我是你，我也会生气的。但我也没办法。这是例行公事，金布尔先生，只是该死的例行公事。”我站起身，晃了晃腿，让裤子皱起来的部分落了下去。“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很感谢你的配合。我想夜间飞行一定也比白天飞行有意思吧？”

他也站了起来，依然彬彬有礼。“是的，但千万不用谢，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尼禄·沃尔夫的人交谈。”

他叫胖管家拿来了我的帽子。

半小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布朗克斯公园大道一路向南时，我脑子里仍在琢磨着这个人。由于他与巴斯托或发球杆或其他任何事情都根本没有联系，那就不可能是别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他曾使我感到紧张。然而沃尔夫仍然说我对于现象没有感觉！下次他再这么说，我一定要提醒他我对曼纽尔·金布尔神秘的怀疑。我拿定了主意。我要假设，当然只是假设，是曼纽尔杀害了巴斯托，不过我还不得不承认这似乎不大可能。

八点半左右我到家时，沃尔夫已经吃完了晚饭。我从大广场的药房打了电话，弗里茨正用他最好的奶酪酱在烤箱里烤着一盘鲟鱼，旁边还有一大盘莴笋、西红柿，以及好多美味的冷牛奶。想起在巴斯托家没吃饱的午饭和受别人招待的不自在，我心想这种经历绝不能再有了。现在终于可以把这些不愉快统统抛诸脑后了。弗里茨则说，看到我又能出去忙了，这感觉真是不错。

我说：“你说得太对了。要是没有我，这堆垃圾就都留给警察

了。”

弗里茨咯咯地笑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在咯咯笑时让你不会怀疑他本意的人。

沃尔夫正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里拍苍蝇。他讨厌苍蝇，很少有苍蝇能闯到他身旁。但有两只不知怎么飞了进来，正围着他的桌子飞来飞去。尽管他讨厌它们，却不打死它们。他说虽然一只活着的苍蝇会令他厌烦到憎恶的程度，但一只被打死的苍蝇又会破坏他对有尊严地死的敬畏，更为糟糕。这个问题令他非常苦恼。总之，他坐在椅子里，手拿着苍蝇拍，看自己能把苍蝇赶到多低而不让它们飞走。我一进屋，他就把苍蝇拍递给了我，我啪啪两下便打死了苍蝇，把它们扫进了废纸篓。

“谢谢你，”沃尔夫说道，“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差点儿让我忘了有一枝丹德罗比姆斯兰花发了两个芽。”

“什么？真的？”

他点了点头。“就是只能享受到一半阳光的那枝。其余的已经被挪开了。”

“给霍斯特曼腾地儿？”

“是的。谁杀了巴斯托？”

我咧嘴一笑。“饶我一回吧。我一下子记不起那个名字了——也许几分钟后我能想起来。”

“你该把它写下来的。不，只是谈谈你自己的看法，那样更好。你吃饱了吗？那就说吧。”

汇报的结果不好不坏，我既没什么可骄傲的，也没什么可羞耻的。沃尔夫自始至终没有插过一句话。在我发表长篇大论时，他总是那样坐着：身子后仰，下巴搭在胸前，两肘放在椅子扶手上，手

指交叉放在肚子上。他的眼睛半闭着，但始终看着我的脸。我说到一半时，他示意我停一下，叫弗里茨拿了些啤酒来。他将一个杯子和两个瓶子放在桌边能够到的地方，就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当我讲完时，已是午夜了。

他长叹了一声，我则去厨房喝了一杯牛奶。回来时，他正掐着自己的耳朵，看上去昏昏欲睡。

“也许你已经有了什么看法了。”他说。

我又坐下了。“很模糊。水分很大。巴斯托夫人是个怪人。她也许杀了她丈夫，也许没有，但她绝对不可能杀卡洛·马费伊。至于巴斯托小姐，你可以凭你自己的印象判断，也不可能。她哥哥也得排除在外。我是说他不可能杀马费伊，有五个人都能证明他不在现场。布拉德福德大夫是个令人很感兴趣的人物，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见见他。至于曼纽尔·金布尔，我猜他没有机会杀巴斯托，但我敢打赌他拿他那架飞机没干好事。”

“为什么？他很残酷吗？他很轻蔑吗？他的眼神很恶毒吗？”

“不。但你看看他的名字。他曾让我很紧张。他长得像个西班牙人。他和金布尔这个姓有什么关系呢？”

“你并没有见到他父亲。”

“我知道。当然，高尔夫球包从来没进过他的柜子这个坏消息让我有些惊慌失措，我一直想找到其他突破口。”

“坏消息？为什么是坏消息？”

“哦，天哪。原本我们只需把青草地俱乐部的会员查一遍就可以了，现在，在过去九个月中到过巴斯托在大学里的家的所有人，都有了嫌疑。”

“哦，不，不，一点儿也算不上坏消息。某种未知的毒药，在针

上蘸那么一点点，哪怕是暴露在空气中，药力仍足以在一两天后，也许只是几个小时后，杀死像巴斯托这样的人。这要看是哪种毒药了。”

我冲他笑了笑。“这倒很有帮助。你还看出什么了？”

“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许多都有些枯燥乏味。因此高尔夫球包的去向根本算不上坏消息。它后来的失踪也只是间接地令我们感兴趣，因为我们从未指望能看到那根发球杆。但是是谁造成了它的失踪，并且为什么呢？”

“不错。就此而言，是谁要求你拒绝那份赏金，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家里有人有些奇怪的想法。”

沃尔夫向我晃了晃一根指头。“从一句话比从一个单个的词更容易看出文风。但是就这件事而言，从事发现场把高尔夫球包拿开是够直接、大胆和直率的举动了，而来我们的办公室，尽管也够直接的，但不过是孤注一掷罢了。”

我说：“医生们都很了解毒药。”

“是的。而这位——这位布拉德福德大夫——也是直率得够符合条件的了。今天我给他打了三个电话，接电话的人都说他太忙，没时间接电话。估计再打下去还是这个结果。你明天早晨打算重新开始行动吗？”

我点了点头。“我想，先去俱乐部，然后去见验尸官，再赶回城里去布拉德福德大夫的办公室。我很抱歉让老金布尔跑了。我本来想见一见打四人赛的所有人的。你觉得让绍尔·潘策尔去一趟芝加哥怎么样？”

“那要花一百美元呢。”

“跟五万美元赏金比起来，那可算不得什么。”

沃尔夫摇了摇头。“你是个大手大脚的家伙，阿奇，而且这根本没有必要。让我们先确定凶手不在本市范围内再说吧。”

“好的。”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晚安，先生。”

“晚安，阿奇。”

第十一章

在公路上就能看见青草地俱乐部，但到达那里还有相当长一段路程。你得从公路上出去，钻进一片小树林。从树林里出来后，还得绕过一大片洼地。俱乐部会所有一片自己的树林，在一座平缓的小山顶上。会所的一侧是一排网球场和一个露天游泳池，在各个方向，到处都有平缓的球道，其间点缀着发球平台、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沙坑障碍，以及清晰得像割绒地毯一样的轻击区。这里总共有两块球场，各有十八个洞。巴斯托他们的四人赛是在北边较长的那块球场上进行的。

我到达时，星期一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的那位教练还没有来，而且最早也得十一点才能到，所以我能提供的唯一介绍就是拉里·巴斯托前一天下午打的电话，是一位主管接的。他非常友善，带我去见了球童老板。我想见的其中两名球童在工作日不来，因为要上学，另外两名球童正在场上为清早的比赛服务。我四处游荡了

一个多小时，想找些人聊聊，以便能在笔记本上记个一两页，但就提供信息的价值而言，他们简直算是一帮爱斯基摩人。我跳进了敞篷车，开向怀特普莱恩斯。

验尸官的办公室与六天前我曾经造访，想帮助沃尔夫赚上一笔的安德森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中。当我走过玻璃板上印着“地区检察官”字样的那扇门时，不禁吐了吐舌头。验尸官不在，但幸运的是有一位法医正在一堆单据上签字，而他正是为巴斯托验尸的大夫。早上离家前，我曾给萨拉·巴斯托打过电话，所以这位大夫说他接到了劳伦斯·巴斯托的电话，知道我将作为巴斯托家的代表访问验尸官办公室。我心想，在案子结束前我一定得好好利用利用巴斯托家这个旗号。

但我最终一无所获。这位大夫所能说出的一切，我都在三天前的报纸上读过了，除了一堆大概是害怕打字员罢工而没敢印上去的医学术语。我并非瞧不起技术术语，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不用术语是说不清楚的，但这位大夫冗长的解释只能归纳为以下几点：关于毒死巴斯托的毒药，尚无法作出任何结论，因为没人能够分析它。巴斯托的一部分身体组织已被送往纽约的一个实验室，但报告还没有出来。毒针被地区检察官拿走了，这会儿估计也正在其他什么地方进行化验。

我说：“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是死于年迈或其他什么原因，是吧？他千真万确是被毒死的，是吧？他属于暴力死亡，是吧？”

法医点了点头。“绝对如此。是某种极其剧烈的毒药……”

“是的。再问一个只限于你我之间的问题，如果一位大夫在检查了这样死去的人之后却说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你有什么看法？”

他浑身僵硬起来，就仿佛自己中了剧毒一般，只是比中毒的反

应还快。“这不是该我判定的问题，古德温先生。”

“我没有请你判定任何问题，只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实际上有，只是不想说，并且想让我因此而记住你。那好吧，非常感谢。”

在走出这座楼时，我曾想到德温办公室去一趟，问问本·库克的电话，或逗逗其他乐子，但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赶回青草地俱乐部时，已将近中午，我心想生活不是别的，就是一桩桩单调乏味的事务的轮回。这种情绪直到后来我愉快地会见了布拉德福德大夫后，才宣告结束。

两名球童都在。他们的老板帮我把他们找来了。我提出了一桩交易：我给他们每人买两个三明治，再买一些香蕉、冰激凌和汽水，我们一起在树下吃喝，而我也不再为他们损失的时间付钱了。他们同意了。我们在午餐柜台买了东西，一起来到了树下。

他们中一个脸色苍白、皮包骨头，长着一头褐发的孩子是曼纽尔·金布尔的球童，另一个是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的球童，矮矮胖胖，有一双活泼的棕色眼睛，长着满脸的雀斑，他叫迈克·艾伦。我们在树下安顿好后，他还没顾上吃一口，就说道：

“您知道，先生，我们没有报酬。”

“什么？你们干这活儿只是因为有趣吗？”

“他们并不是每次都付我们钱的，只有下场捡球时才有报酬。我们没有损失一点儿时间。只有午饭后才可能有比赛。”

“哦，你不用这么说。你简直太实在了。没准哪天你能进银行工作呢。快吃三明治吧。”

我们一边咀嚼着，一边聊起了巴斯托他们的四人赛。从他们的

不假思索、滔滔不绝的讲话来看，这个故事他们少说也讲了一千遍了，当然既给安德森和科贝特讲过，也给其他球童、家人、朋友讲过。他们口齿伶俐，能答得上所有细枝末节的问题，这使我对从他们口中挖出什么新东西绝不乐观。这幅图画他们已经画了这么多遍，现在闭着眼睛都能画了。我倒不是真指望他们有什么实在货，但我也早从沃尔夫那里学到了：光照不到的角落，才是钢镚儿滚去的地方。他们所说的，与我从拉里·巴斯托和曼纽尔·金布尔那里听到的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别。当三明治和其他食品饮料都吃光喝净后，我看出那个脸色苍白皮包骨头的男孩知道的情况已被榨干了，就打发他回去找他的老板。我又把矮矮胖胖的迈克留了一会儿，和他一起坐在树下。他很聪明，也许会注意到些什么，例如当布拉德福德大夫来到第四球道的现场时，是怎样表现的。但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什么收获。他只记得所有人都在等大夫，他跑过来时，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在检查完巴斯托站起身来时，他脸色煞白，却冷静了下来。

我又问起了高尔夫球包的问题。他一点儿也没有慌张。他肯定地说自己把球包放在了巴斯托小汽车的前排，靠在了司机座上。

我说："当然了，迈克，你那时一定很激动。在那种时候所有人都会激动的。你有没有可能把它放在了别的车上？"

"不，先生，绝对不可能。那会儿这里根本没有别的车。"

"也许你把别人的包放进了车里。"

"不，先生，我没那么傻。你是个球童，你就得经常数数杆头，以确保所有的球杆都在包里。我把包靠在车座上时，数过了杆头，我清楚地记得看见了所有新杆头。"

"新杆头？"

“没错，它们全都是新的。”

“它们怎么变成新的了？你是说巴斯托给球杆换了新头吗？”

“不，先生，它们全都是新杆。是他太太给了他一包新球杆。”

“真的？”

“没错。”

我不想惊动他，就捡起一片草叶咀嚼起来。“你怎么知道是他太太给的他新杆呢？”

“他告诉我的。”

“他怎么会告诉你呢？”

“嗯，当我走向他时，他和我握了握手，说他很高兴又见到了我，当然，去年他就是我的宝贝之一……”

“看在上帝的分上，迈克，请等一等。你说他是你的宝贝，是什么意思？”

那孩子咧嘴笑了。“这是我们的行话。如果一个人喜欢我们做他的球童，而不会再去找其他球童，他就是我们的宝贝。”

“我明白了。接着说吧。”

“他说他很高兴又见到了我，当我接过他的球包时，我看见里面全都是新杆，正宗的亨德森牌，他又说他很高兴我喜欢他的新球杆，这是他太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

还剩下几根香蕉，我递给他一根，他开始剥皮。我看着他，过了一分钟后说道：

“你知道巴斯托是被高尔夫发球杆杆柄上射出的一根毒针杀死的吗？”

他的嘴里塞满了香蕉，直到大部分被咽下去后他才回答：“我知道他们是这么说的。”

“那么，你不相信吗？”

他摇了摇头。“除非他们指给我看。”

“为什么？”

“嗯——”他又咬了一口香蕉并咽了下去，“我不信有人能做到这点。我见过那么多高尔夫球杆。我就是不信。”

我对他笑了笑。“你是个怀疑主义者，迈克。你知道我的老板怎么说？他说如果你懂得该在什么时候松开皮带，怀疑主义倒是一条好的看门狗。我想你不知道巴斯托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吧？”

他不知道。我开始东拉西扯，想再钓上些鱼来，但似乎池子已经空了。而且，午餐时间已过，下午来打球的人开始在场内游荡，我看见迈克的眼睛盯在了球童长椅上，并开始对我失去兴趣。我正打算收摊，对他说野餐结束了，他却等不及了。他突然一跃而起，只有像他那么年轻的腿才能做到。他对我甩了一句：“对不起，先生，那家伙是我的宝贝。”就跑开了。

我收拾了废纸和香蕉皮，走进了俱乐部会所。这时的人比我上午到达时要多得多，我不得不请一名服务员去找那位主管，因为凭我自己根本找不到他。他很忙，但还是抽空把我领到了图书馆，让我自己随便看。我浏览了一下书架，没一分钟就看见了那本厚厚的红皮《美国名人录》。我翻到了已经在沃尔夫的办公室读过的条目：巴斯托，彼得·奥利弗，作家，教育家，物理学家；一八七五年四月九日生于查塔姆……

我把书放了回去，走到了走廊里，那里有几个电话亭。我给萨拉·巴斯托打了个电话，问她我能不能顺路去看看她，谈一两分钟。我想在我返回纽约的路上，只需绕道几英里，就能澄清这个细节。当我沿着游廊走向敞篷车停放的地方时，碰见了曼纽尔·金布尔。

他和几个人在一起，但当他看见我时，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我能猜出他对那几个人说了些什么，因为当我走过时他们都扭头看着我。

十分钟后我已经开上了巴斯托家的行车道。

斯莫尔领我到了一间前天我没到过的屋子。过了一会儿萨拉·巴斯托进来了。她面色苍白但神色坚定，我意识到我的电话一定是无意中吓着了她。我本该稍作些解释的。

我站起身来。她也没坐下。

“我只占用你一分钟时间，”我说，“我并不想打扰你，只是我偶尔遇到了一些令我好奇的事情。请告诉我，你父亲的生日是四月九日吗？”

她看上去仿佛呼吸都很困难。她点了点头。

“在他最近一次过生日时，你母亲给了他一包新的高尔夫球杆，是吗？”

“哦！”她叫了一声，将手搭在了椅子背上。

“听着，巴斯托小姐，请振作一些。我想你知道尼禄·沃尔夫不会欺骗你，而既然他雇了我，你就可以把我看做尼禄·沃尔夫。我们会问你一些微妙的问题，但我们不会对你撒任何谎。如果你心里正在萌生这样的念头：杀死你父亲的发球杆在你母亲送他生日礼物时就在球包里，请忘掉它。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是这样的。这不可能。”

她看着我，嘴唇嚅动着，却没有张开。如果她的手没在椅子上，我不相信她还能站着。她的手紧紧地抓着椅子。

我说：“也许我告诉你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不是。但我一发现这个情况，就来告诉你了，并且是很直率地告诉你的。如果这对

你有什么帮助，请不必挂在心上，但我们一报还一报，岂不更好？我也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这个生日礼物是不是正在令你烦恼的事情？这是一切胡思乱想的缘由吗？”

她的舌头终于动了起来，但她说出的只有：“我不相信你会骗我。那太残酷了。”

“我不会的。但即使我会，无论如何我也知道了这件生日礼物的情况，所以你可以平静地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令你烦恼的原因吗？”

“是的，”她说，“那——嗯——是的，就是这样。”

“还有别的原因吗？”

“没有了。我母亲——”

“是的。”我点了点头，“你母亲有时候会犯傻，并且她对你父亲抱有不好的想法。她在你父亲生日时送了他一包高尔夫球杆。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她将手从椅子上抬起，但马上又扶了上去，“古德温先生，我想，我想坐下。”

我走上前去扶住了她的胳膊，用脚将椅子向后踢了踢，一直扶着她直到她坐下。她闭上了眼睛，我站着，直等到她又睁开眼睛。

“你说得对，”她说道，“我应该振作一些。我感觉不好。这是一种压力。不仅仅是现在，而且是长期的压力。我一直认为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我知道她是的。但这太让人恶心了！布拉德福德大夫说他相信，现在既然我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也就会痊愈了，从此不会再有任何困难了。但尽管我爱母亲，这个代价也太高了。我想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心理学会好得多，它告诉我们的一切都令人如此恶心。我是听了父亲的建议，才学心理学

的。”

“不管怎样，这件事不会再纠缠你了。”

“是的。我还不能解脱，但我会的。我应该感谢你，古德温先生，我很抱歉。你说我母亲没有——她不能——”

“我是说杀死你父亲的发球杆四月九日时还根本不存在。它是至少一个月后才出现的。”

“你有多肯定？”

“完全肯定。”

“嗯。这是桩公平交易。”她努力向我微笑了一下。我很佩服她的神经，因为很容易看出她刚刚从这样的忧虑、悲伤和失眠中走出，你原本以为她会爆发出约伯[①] 那样的狂笑的。此时此刻，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起身出去，让她独自享用我给她带来的这个好消息，但公事得公办，我不能错过她突然松弛下来的这个机会。我说：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当你妈妈给他那包高尔夫球杆时，那根球杆并不在其中，你难道不认为你该告诉我是谁从小汽车里拿走了高尔夫球包，它现在在哪里吗？”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是斯莫尔把它从车里拿走的。”

我的心像看见沃尔夫的嘴唇努出来时那样跳了起来。她就要吐露实情了！我继续发问，不给她思考的时间：“他把它拿到哪里去了？”

“楼上，我爸爸的房间里。”

“谁又把它从那里拿走了？”

“是我。星期六晚上，安德森先生来过后。那些人到这座宅子里搜它，是在星期天。”

① 约伯（Job），《圣经》人物，历经各种危难，仍坚信上帝。

“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我开车到了塔里敦，上了渡船，把它扔进了河中心。我在包里装满了石头。”

“你很幸运，他们没有跟踪你。当然，你检查了发球杆。你把它拆开了吗？”

“我没有检查它。我——太匆忙了。”

“你没有检查球杆？你是说你甚至没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没有。”

我紧盯着她。“我刚刚对你有了更好的印象。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愚蠢。你看着我的眼睛。”

“不，不，我不，古德温先生。”

我仍然紧盯着她。“你的意思是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你做的。你甚至都没看那发球杆一眼。把这件事情全都交给一个女人！你哥哥和布拉德福德在做什么？踢皮球吗？”

她摇了摇头。“他们跟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但是布拉德福德说既然你父亲死了，你母亲会痊愈的。”

“嗯？如果那是他的看法……”她停住了口。提起她的母亲是个错误，这使她情绪又低落了下去。一分钟后，她又抬起眼睛看着我，我第一次看到了她眼中的泪水。“你想和我公平交易，古德温先生，而这是属于我的那一份。”

她身上的某种东西，也许是眼泪，使得她看上去像是个努力装勇敢的娃娃。我走上前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你是个输得起的人，巴斯托小姐。我不为难你了。”

我走进厅里，拿上我的帽子离开了。

“但是”，在坐进敞篷车向南开上公路时，我心想，有太多的

"但是"了。尽管我喜欢萨拉·巴斯托，尽管我尊重她作为子女的孝心，但假如没看球杆一眼这件事会重重地教训她一番，也是很痛快的。我不得不相信她，我也的确相信她。她不是瞎编的。现在那根球杆一去不返了。如果有足够的好运和耐心，也许能把它从河里捞出来，但那要花很多钱，尼禄·沃尔夫是不会这么干的。这就是一根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球杆了。当我路过怀特普莱恩斯时，我真想离开主干道，闯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安德森说："我想跟你赌十美元，藏有杀死巴斯托的球杆的那个高尔夫球包，正在塔里敦至奈阿克中途的哈得孙河河底。"这并不见得是个傻主意，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派几条船去打捞它。但是事实上我没有那样做。

返回纽约时，我本打算走另一条路——蓝莓路的，只是出于好奇心，想看一看发现卡洛·马费伊尸体的地方。我倒没指望能在现场发现凶手的领带针或汽车执照什么的，只是觉得去现场看看总没坏处。但访问萨拉·巴斯托耽搁了些时间，我还想在城里打个电话，所以只好走了最近的一条路。

我在帕克街的一家药店停下来给沃尔夫打了个电话。大约十一点半时，他又给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但结果依旧：大夫太忙，无法接听电话。他叫我去一趟。我心想，如果他这会儿真的很忙，那么不等我们说明白我们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的。我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开到了六十九街，把车停在了街角。

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当然有自己的办公室。门厅宽得足以在两边各摆下一排巴西蕨类植物，接待室也是又高又大。灯光、地毯、装饰画和椅子都很朴素，室内非常安静，这里的一切都是高水准的，包括给病人开出的账单。但椅子全都是空的。坐在屋角桌旁的一位穿着浆过的白衣的姑娘告诉我布拉德福德大夫不在，而且

她似乎很奇怪我居然不知道这点，仿佛对此我本该像知道中央公园是从五十九街开始一样的，她还问我以前来看过病吗。接着她说大夫下午四点半之前从来不在办公室，而且除非有预约，他从来不见任何人。我说我来这儿就是想预约的，她皱起了眉头。我只好又回到了街上。

我先是想在附近等等他，但这时才三点多，所以我坐进了敞篷车，天马行空地想着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打发时间。没过几分钟我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走进帕克街一家餐馆查了查电话号码簿，然后回到车里发动了车，先是沿着六十九街走，从第五街开进城里，在四十一街又拐弯向东。

像往常一样，停在街边的车头紧挨着车尾，我差不多到了第三街才发现了一个车位，把敞篷车停了进去。然后我向回走过两条街，才找到了我查到的门牌号，这是一幢高大的新写字楼。租户一览表上写着我要找的地方在十二层。我乘电梯上去，沿着走廊找到了那扇门，上面写着：《大都市医药记录》社。

坐在外屋桌旁的接待员是个小伙子而不是姑娘，这倒挺新鲜。我对他说：

"我想请你帮个忙。如果你不是很忙的话，希望你帮我查点资料。你们有没有六月五日纽约举行过的医学会议的记录？"

他咧嘴笑了。"老天有眼，我这会儿恰好不忙。是的，先生，我们有这样的记录。当然有。请稍等。六月五日吗？"

他走到书架上的一摞杂志前，拿起了最上面的一本。"这是我们最新的一期，里面会有的。"他开始翻页，翻到大约中间时停下来看了一看。我在一旁等着。"五日恐怕没什么事情吧——哦，是的，在这儿呢。重要的会议大都召开得较晚。纽约神经学学会会议六月五

日在纽约人宾馆举行。”

我问他我能不能看一看那杂志，他把杂志递给了我。我匆匆扫了一遍。“我明白了。这是一份会议通知。当然是在会议召开前印的。你们有没有什么会后的资料，比如一份报告，或者报道？”

他摇了摇头。“我想我们下一期会有的。你想了解什么特别的情况吗？我想报纸上会有报道的。”

“也许吧，我没看过。我想找的是关于布拉德福德大夫的论文的报告。其实，我就是想证实他是否出席了会议。你知道吗？”

他摇了摇头。“如果你就想知道他是否出席了会议，你干吗不直接去问他呢？”

我笑了笑。“我不想打扰他。当然，那样更简单了。但我恰好在附近，我想顺路到这儿来一趟会更节省时间。”

他说了声“请稍等”，然后进了里面的办公室。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对我说：“埃利奥特先生说布拉德福德大夫出席了会议并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他说埃利奥特先生是该杂志社的编辑。我问我能否和他谈谈。那小伙子又进了里屋的门。没过多久，门又开了，一个挽着衬衫袖子，长着大大的红脸膛的男人出来了，一看就是个心直口快、不拘小节的人。“怎么回事？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说明了来意。他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他出席了会议，布拉德福德大夫宣读了一篇极为出色的论文，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正就此为八月份的杂志写一篇报道。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准确。是的，他知道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的办公室在六十九街。他认识他已有多年。他说不清布拉德福德是什么时候到达宾馆，但会议是个晚餐会，他看见布拉德福德大夫七点就在餐桌

旁了，而晚上十点半的时候他还在讲台上。

我想我出门时一定是忘了谢谢他了。当我开车离开市中心时，我像个自负的傻小子一样痛苦。当然是布拉德福德令我痛苦。当我一门心思地想象着他在韦斯特切斯特郡用刀刺向卡洛·马费伊时，他却在医学会议上宣读着什么神经学论文。

当我返回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的办公室时，我想如果我不是那么痛苦的话，恐怕我再过一年也见不到他。这回有两个病人在等他。大夫在办公室里。我向坐在桌前的姑娘要了一张纸，用一本杂志垫着写下了下面一番话：

> 布拉德福德大夫：过去几天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凶手，但现在我知道了你只是一个老糊涂，像巴斯托夫人和她的儿子、女儿一样。我只需三分钟就可以告诉你我这样说的理由。

那两个病人看完病之后，又来了几个病人。我走到那姑娘面前，告诉她下一个该我了。她不耐烦起来，开始向我解释该怎样预约。我说：

"把这张条子递给他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坏处。我真的很着急。行行好吧。我家里也有姐妹。别看条子的内容，里面有咒语。"

她带着一脸厌恶的表情，拿着条子走进了病人们正在等待的那扇门。没过多久，她出来了，在门口喊了我的名字。我拿上了我的帽子，因为这段时间足够他们叫一名警察来的。

只要看布拉德福德大夫一眼就足以明白，假如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一面，就不会浪费那么多心思去怀疑他了。他身材高大，神态严肃，端庄得体，是个典型的儒雅老绅士，而且他还留着长长

的胡子！假如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个时期，留着这般美髯的人有可能拔出刀子刺进某个人的背部，那一定也是在很久以前。如今是不可能了。布拉德福德的胡子是灰白的，和他的头发一样。说句实话，尽管去了趟四十一街已使我确定他有六月五日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但在见到他之前，我还是打算从中寻找破绽的。

我走到他的桌前，站在那里。他只是打量着我，直到那姑娘出去并将门关上，才开口说道：

“你叫古德温。你也是个天才吗？”

“是的，先生。”我笑了笑，“我是跟尼禄·沃尔夫学的艺。没错，我记得他跟巴斯托小姐说过他是个天才，她一定告诉了你。也许你认为那只是句玩笑。”

“不，我是个开明的人。但无论你是个真正的天才，还是头冒失的蠢驴，我都不能让我的病人等着。你给我的这张条子是什么意思，是诱饵吗？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来证明它。”

“那足够了。咱们这么说吧：尼禄·沃尔夫发现了某些事实，根据这些事实，他就巴斯托死亡的原因和方式作出了某些结论。验尸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结论，也就证明了他掌握的事实。也就是说，使这些事实变成了图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谁杀了巴斯托，他都必须符合这些事实。那么，巴斯托家的人不符合，一个也不符合。你也不符合。你已经被淘汰了。”

“请继续讲。”

“继续？”

“这个概述很不错。该具体说明了。”

“哦，不。”我摇了摇头，“这不是我们天才的作风，你不能把我们像一包花生一样筛空。一方面，要把话说清楚三分钟是远远不够

的；另一方面，如果天下本无事的话，你在期待什么？你的神经很坚强。但究竟是什么让你竟然连冠状血栓和癫痫都分不清了？是什么让你一连几天不敢接电话？尼禄·沃尔夫完全可以花费他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为你驱散乌云重见阳光，但他决不能自讨没趣。我来给你传那张故弄玄虚的纸条，只是为了有幸欣赏一下你的美髯。你是个神经坚强的人。”

“天哪。”布拉德福德大夫像是在发誓，“你的愤怒很有说服力，也很生动，但它只表达了愤怒，没有别的。”他看了一眼手表，“古德温先生，我不必告诉你我有多么感兴趣了。尽管我仍然认为在死人墓地里耙丑闻这门职业是一种非常下贱的谋生手段，但如果你刚才说的话能够得到证实的话，我当然万分感激你和尼禄·沃尔夫了。你能在六点半时再到这里来一趟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是个信使。尼禄·沃尔夫七点钟吃晚饭。他住在西三十五街。他邀请你今晚与他共进晚餐。你愿意吗？”

“不，当然不。”

“那好，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受够了这种老把戏，“如果什么时候好奇令你的心痒痒起来，不要责怪我们。你可能知道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只是想在调查过程中澄清一些事实。我的三分钟时间到了。”

我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不慌不忙地将手搭在了门把手上。

“古德温先生。”

我的手仍握着门把手，然后扭头看着他。

“我接受沃尔夫先生的邀请。我将在七点钟赶到。”

我说：“好的。我把地址留给那姑娘。”然后就出来了。

第十二章

我有时候想，纽约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借钱给尼禄·沃尔夫。我猜少说也有一千人。我设的标准很高，想尽量减少这一数字。当然，对他心存感激的人远不止这些，有理由恨他的人也同样多，但是一个人只有对你有特殊的感情时，才会在你开口向他借钱时给你实质性的帮助，而不是皱起眉头或支支吾吾。这种感情中有信任，有友善，也有感激，而且不带有丝毫令人不快的义务感。那么对尼禄·沃尔夫怀有这种感情的人至少有一千个。然而尼禄·沃尔夫却从来没有利用过这一条件。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的确曾一度拮据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建议向一位百万富翁借点钱。那位百万富翁欠沃尔夫的不仅仅是一条命，但沃尔夫根本不予以考虑。“不，阿奇。自然的规律是一旦你克服了某种惰性，那么随之而来的动力也是成比例的。如果我开始借钱，那么最终我会设法去说服财政部长借给我一座金库的。”我对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条件

借更多的钱，他却根本不听。

星期三的晚餐后，我可以把纳撒尼尔·布拉德福德大夫也添加到这一千人中了。沃尔夫完全征服了他。当沃尔夫想帮助什么人时，他总能让这些人心满意足。六点到七点之间，在布拉德福德到达之前，我将这一天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当我们坐到晚餐桌前时，我立刻看出沃尔夫已经同意了我的看法，将布拉德福德从嫌疑名单上划去了。他轻松随意，不拘礼节，而在我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假如他认为一个人存在着被他送进新心监狱或奥本监狱的可能，那他总是一本正经的。

在晚餐桌上他们谈了岩石花园、经济形势和塔慕尼协会[①]。沃尔夫喝了三瓶啤酒，布拉德福德喝了一瓶葡萄酒，我坚持喝牛奶，但也在楼上喝了一小杯黑麦威士忌。我告诉过沃尔夫布拉德福德的下贱职业之说，也谈了我对他的看法。沃尔夫说："超然一点吧，阿奇，一篇泛泛之谈中流露的私愤只是拜物迷信的野蛮残余。"我说："这又是你的一句毫无意义的花言巧语。"他说："不，我讨厌毫无意义的废话。如果一个人制作了一个木偶，给他穿上衣服，再把他画成你的模样，然后打了他的脸，你的鼻子会流血吗？"我说："不会，但在我结束和他打交道之前他的鼻子会流血的。"对于我的微笑，沃尔夫叹息了一声："至少你明白了我的话并非毫无意义的。"

饭后在办公室里，沃尔夫对布拉德福德说他有事要问他，但他先要告诉布拉德福德一些事情。于是他讲述了整个故事：马费伊，剪下的报纸，关于高尔夫球杆的问题让安娜·菲奥雷骤然缄口，安

---

① 成立于一七八九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十九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而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

德森的游戏，安娜收到的一百美元和信。他讲得既直率又完整，然后说道："那么，大夫，我事先没有要求你作任何保证，但现在我请求你对于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保守秘密。我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想挣那五万美元。"

布拉德福德已有些醉意了。他仍在努力揣摩沃尔夫的意思，但已经没有戒心了，那瓶葡萄酒让他把沃尔夫当成了老朋友。他说："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故事。非同寻常。我肯定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的。我感谢你的信任。我还不能说已经弄明白了这之间的所有关联，但我明白查清有关巴斯托之死的真相，是找出杀害马费伊的凶手必不可少的环节。我明白你将萨拉·巴斯托和拉里·巴斯托从无法忍受的恐惧重压下解脱了出来，也解除了我本人无法承担的责任。我非常感激，请相信我。"

沃尔夫点了点头。"这其中当然有微妙之处，你自然是注意不到的。我们实际上已经证实的只是你们四个人——巴斯托夫人、她的儿子和女儿，还有你——都没有杀害卡洛·马费伊，那根致命的高尔夫球杆四月九日那天也不在球包中。但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你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全体，阴谋杀害了巴斯托。理论上只需要找一名同伙去除掉马费伊就可以了。"

布拉德福德的酒劲突然消失了，他瞪大了眼睛，但很快他的警觉就消失了，又变得轻松起来。"胡说。你并不相信这种可能性。"但他随即又瞪大了眼睛，"不过请说实话，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我们现在就要说到这个问题了。首先请允许我问一句，我的坦诚是否已换来了你同样的坦诚？"

"是的。"

"那么请告诉我，例如，巴斯托夫人先前什么时候试图要过她丈

夫的命，是怎样做的。”

布拉德福德的表情看上去非常滑稽。他先是震惊，继而脸绷得紧紧的，一声不吭，随即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又努力做出一副自然而然的惊讶状。最终他说道：“你是什么意思？这太荒唐了。”

沃尔夫向他晃了晃一根手指头。“请放松，大夫。我求你，不要怀疑我在玩弄什么下贱的把戏。我只是在寻求能符合我结论的事实。我想我最好还是先告诉你为什么我已经从自己的头脑中剔除了你们和巴斯托家人犯罪的可能性。我感觉不到有这样的罪恶。这就是全部的原因。我当然可以有合理的感觉，也可以没有任何感觉。请考虑这样的必要条件：一位妻子或儿子或女儿以周密的计划、凶残的恶毒和非凡的耐心谋杀了丈夫或父亲，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地准备了工具。如果是妻子或女儿，就必然有一个同谋者杀死了马费伊。如果是儿子，也须有同样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也没有亲自动手。阿奇·古德温去过他们家，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如果那个家庭是那个样子的话，他不可能闻不到那里的恶臭，也不可能不把这种气味带回给我。如果是你杀的马费伊，你也需要一个帮凶。我和你共处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尽管你有可能杀人，却不可能那样杀人，你无论如何不可能信任任何帮凶。这是合理的推测。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

“不，请听我说。你，作为一位有资格有能力的观察者，在相反的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却判定是心脏病。对于一位赫赫有名的医生来说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你无疑是在庇护什么人。而巴斯托小姐的陈述指明了你在庇护谁。于是在发现巴斯托死亡时，你一定立刻猜想是他妻子杀了他，你不可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结论，这理由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巴斯托太太曾经在她神经错乱时想

让她丈夫死。如果这样的理由就能认定凶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哪家的厨房能够对刽子手关上门呢？你一定是有更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或者是她曾为犯罪作过准备，或者是她先前曾有过杀她丈夫的尝试。鉴于我们掌握的事实使前者不能成立，所以我推测是后者。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她什么时候尝试过，是怎样做的？我只想请你补全记录，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案件的这些方面着手，来澄清历史的混沌了。”

布拉德福德在思考。他的酒意已完全消散了。他在听沃尔夫讲述时，身子前倾坐在椅子里。他说：“你没有派人去过学校吗？”

“没有。”

“那里的人都知道。你果真猜对了。去年十一月巴斯托太太曾用一把左轮手枪射向她丈夫。子弹打偏了，但从那以后她就崩溃了。”

沃尔夫点了点头。“当然，是在病的一时发作中。哦，请不要反对用这个词；无论你怎么称呼它，这难道不是一次发作吗？不过，大夫，我仍然很奇怪，是否可以从一时发作的谋杀暴力中，推知长期预谋的险恶计划？”

“我作不出这样的推断。”布拉德福德被激怒了，“天哪，我最好的朋友死了，躺在我面前，显然是被毒死的。我哪里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什么时候中的毒，又是怎么中的毒？而我的确知道伊莲——就是巴斯托太太——前一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我也是凭感觉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只是我的感觉错了。我把他平静地安葬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接着验尸就出现了这样惊人的结果，我也完全被弄糊涂了，根本没法按理智行事。巴斯托太太提出悬赏时，我反对了，但没有成功。一句话，我被吓坏了。”

我没有注意到沃尔夫什么时候按下了电钮，但当布拉德福德说

完后，弗里茨出现在门口。“再给布拉德福德大夫拿些葡萄酒来。给我拿一瓶雷默斯啤酒来。阿奇喝点什么？”

“什么都不喝了，谢谢。”

布拉德福德说：“我也什么都不喝了，我该走了。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还得开车去乡下。”

“但是，大夫，”沃尔夫抗议道，“你还没有告诉我一件我想知道的事情呢。再坐十五分钟吧。迄今为止你只是证实了一些不大重要的小小猜测。你难道看不出我是多么小心多么努力地在争取你的信任和尊重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想问你，并希望得到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回答：谁杀了你的朋友巴斯托？”

布拉德福德瞪大了眼睛，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没有喝醉，我只是有些入戏，”沃尔夫继续说道，“我想，我天生就是个演员。无论如何，我认为好的问题需要有好的铺垫。我的问题是个好问题。你看，大夫，在你能充分地回答我的问题之前，你必须将你头脑中的灰尘掸掉——这灰尘依然存在，就是你对你的朋友巴斯托太太草率而冷酷的猜疑，还有你的恐惧。尽管你为此忧虑了好几个月，但你必须明白这的确是真的：巴斯托太太没有杀害她的丈夫。那么是谁干的呢？是谁，有这样邪恶的用心和残酷的耐心，竟然准备了这种致命的工具？我相信你是巴斯托最老最亲密的朋友，对吗？”

布拉德福德点了点头。“彼得·巴斯托和我在孩提时代就是朋友。”

“相互的信任一直持续至今？尽管表面的利益似乎有时会将你们分开，但你们是生活中的战友？”

“你说得对。”布拉德福德动了感情，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

"一种五十年来丝毫没有受损的信任。"

"好的。那么是谁杀了他呢？我的确希望你能说出些情况，大夫。他以前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会给他招致杀身之祸吗？你也许没听说过全部故事，但一定听说过其中一章，或是一段，或是一句话。请回忆一下过去的悄悄话，也许是在遥远的过去。你一定要摈弃不愿插手的念头。我不是请求你控告某个人，目前的危险不是无辜者会受到骚扰，而是罪恶者会逍遥法外。"

弗里茨拿来了啤酒和葡萄酒，大夫又靠到了椅子背上，手里端着酒杯，眼睛盯着红色的酒液。他猛地抬起头，向沃尔夫点了点，然后又陷入了沉思。沃尔夫给自己倒了些啤酒，待泡沫消退后一饮而尽。他总以为自己外衣胸前的口袋里有手帕，但总是没有。我在抽屉里给他备了一沓，于是我拉开抽屉，抽出一块递给了他。

"我不是在回忆过去的悄悄话，"布拉德福德最终说道，"我是感到惊讶，而且是强烈的惊讶，竟然没有一个你说的那样的人。我也在思考另一个我如此轻易地就认为巴斯托太太该为此负责的理由，或者是不该为此负责的理由。那是因为我知道，或者无意识地感觉到，再没有别人会做这件事了。我现在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彼得·巴斯托是个非凡的人物。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就很好斗，作为一个男人，他为一切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而斗争，但我敢发誓，没有一个在世的男人或女人会希望他受到严重伤害。没有一个人。"

"除了他的太太。"

"甚至连她都不是。她是在大约三米的地方向他开的枪，却没有打中。"

"唉。"沃尔夫叹了口气，将另一杯啤酒一饮而尽，"大夫，我想我恐怕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感谢你。"

“我想也是。请相信我，沃尔夫先生。如果我能帮助你，我一定会帮的。令人惊奇的是我此时此刻产生的念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既然我知道了伊莲不存在嫌疑，我也要同意她提出悬赏了。我甚至还想增加赏金。那么，我是不是也有报复心理呢？也许是为了彼得。我想他可能会同意我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个一无所获的晚上。最后十分钟我差不多都睡着了，没听见几句他们的谈话。恐怕沃尔夫不得不对一种新的现象开创一种新感觉了：凶手可能是外星人。既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没有人希望毒针进入巴斯托体内，那么那就是毒针进入他体内的唯一方式了。

虽然这是个没有价值的夜晚，但最后还是让我笑逐颜开了。布拉德福德起身离开时走到沃尔夫的椅子前向他道晚安。我看出他有些犹豫。他说：“我心里还有点儿事，沃尔夫先生。我——我该向你道歉。那天下午在我办公室里我对你的人说了句话，一句非常不该说的话，是从死人墓地里耙丑闻……”

“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道歉？”沃尔夫既平静，又显得迷惑不解，“你那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布拉德福德当然没再说什么，就出门去了。

在将这位可敬的老绅士送出大门，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后，我回到厨房拿了一杯牛奶，然后回到了办公室。弗里茨也在那里，我对他说他一晚上浪费了不少葡萄酒，他也许该关张歇业了。沃尔夫闭着眼睛靠在椅子背上。我坐下来啜着牛奶。牛奶全喝完时我已经厌烦至极了，只是按照惯例要说上几句：

“情况是这样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用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天才去感知这样一个现象，一根毒针在一个人的肚子

里，而事实证明谁也没有把它放进去，到底有什么好处。咱们这么说吧：一件东西到了一个谁也没想让它去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这么说：鉴于那个高尔夫球包在出事前二十四小时一直在巴斯托家，去查一查有没有哪个仆人怀有比巴斯托太太更有趣的想法怎么样？当然，按照萨拉·巴斯托的说法，他们没有机会，另一个反对意见就是我也不想去干这差事。天哪，我多么讨厌去跟一帮仆人打交道啊。所以我猜，明天早上我还得访问巴斯托家并加油接着干，不然我们就得跟那五万美元吻别了。这案子真是不一般。我们跑了半天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有人能帮我解决难题，用不着我自己这么绞尽脑汁，用不着东奔西跑却一无所获，我倒不那么在乎……”

“说下去，阿奇。”但沃尔夫并没有睁开眼睛。

“不说了，我烦透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们打了败仗。放毒针的那家伙比我们高明。哦，我得一连好几天去跟仆人们斗心眼儿，去调查是谁在报上发了招聘金属匠广告之类的事情了，但我们打了败仗，这跟你肚子里装满了啤酒一样肯定。”

他的眼睛睁开了。“我将把饮酒量减为每天五夸脱。也就是十二瓶。一瓶的量还不到五品脱。现在我要去睡了。”说罢他开始为从椅子上站起来做惯常的准备工作。站起来后，他又吩咐道：“顺便说一句，阿奇，明天早上你能起早一点吗？你要在球童和他们的宝贝一起下场前赶到青草地俱乐部。在我看来，这是最近你告诉我的唯一非常贴切的俗称。也许你还能把那两个上学的孩子一起劫持来。如果他们四个都能在十一点钟赶到这里就太好了。告诉弗里茨明天有客人来吃午饭。这个年龄的孩子吃些什么？”

“他们什么都吃。”

"那就告诉弗里茨给他们做。"

等我确认他能自己走进电梯后，就上楼了。我把闹钟定到六点，然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早，在沿着主干道向北行驶时，我没有迎着日出歌唱。以前会这样做，但一想到我这番辛苦又可能是白忙一场，就提不起兴致来。用不着任何人来告诉我尼禄·沃尔夫是个奇人，但我知道把球童们找来只能算是有枣没枣打一竿，我就不抱什么希望。说实话，假如沃尔夫也只有这个办法，恐怕我们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要打败仗了……

前方出现了一名交警。向北的公路有一半的车道都空着，当然，我的车速超过了每小时五十英里。这位骑着摩托的交警向我挥了挥手。我踩了刹车，将车停在了路边。他要我出示驾照，我给了他，他掏出了罚款簿。

我说："没错，我的确开得太快了。我不知道，也许你不关心吧，但我是去怀特普莱恩斯的安德森——就是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我有些关于巴斯托案的内幕要告诉他。他正急着等我呢。"

那家伙已经准备好了笔。"你也是警察吗？"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我是私家侦探。这桩案子的案情是我的老板尼禄·沃尔夫揭开的。"

他把名片和驾照一起还给了我。"你走吧。但小心别飞出篱笆去。"

这让我的心情好了一些。也许前面还有好运在等着我吧。

从俱乐部把两名球童叫出来没费什么事，找到另外两个却花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上的是不同的学校，其中一名不需任何说服就上了车，而另一名一定是想讨老师的欢心。我先是哄他，但不管用，

我又搬出了正义的目标和好公民的责任，这才说服了他和学校里管事的女老师。我心想如果让他坐在我身旁，那就别想省心了，所以我安排他和另一个男孩坐在折叠加座[1]上，让另外两个男孩和我一起坐在车里，然后开上了主干道，向南驶去。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速度计不要超过每小时四十英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总指望让安德森帮这种忙。

差一刻十一点时，我把孩子们带进厨房，让他们吃了些三明治，因为午餐时间是一点钟。我本想带他们上楼看看兰花，心想让他们留下一些深刻印象并无坏处，但没有时间了。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其中的一个，就是给曼纽尔·金布尔当球童的那个脸色苍白、皮包骨头的孩子，他的脸很脏，我带他到盥洗室洗了洗。沃尔夫出现时，我看上去就像是个童子军导师。

我让他们坐成一排。他进来时手里拿着一束花，插进了他桌上的一个花瓶中，然后坐进自己的座位，掸了掸信件。他进屋时向孩子们道了日安，在椅子上坐舒服后，又一个个地打量起他们来。孩子们都有些窘，在椅子里不停地变换着姿势。

“请原谅，阿奇，座位安排得太差劲了。”他转向坐在边上那个红头发蓝眼睛的孩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威廉·A.赖利。”

“谢谢你。你愿意把你的座位往这边挪一点儿吗，靠近墙——这样好多了。你叫什么名字？”在他问过所有人的名字并将他们分散开来后，他接着说，“你们中哪一位曾经对彼得·奥利弗·巴斯托是被从高尔夫球杆中射出的一根毒针杀死的表示过怀疑？请说出来，

① 旧时汽车设在行李箱的座位，用时打开行李箱的盖做靠背。

我只想认识认识，是哪一位？”

矮矮胖胖的迈克大声说道：“是我。”

“哦，是迈克·艾伦。迈克，你还年轻。你学会了接受常识，但你一定还要学会不排除奇异之事。现在，孩子们，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请仔细听，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听明白。这恰好是个真实的故事。有一百个心理学家在一个公共会堂里开会。心理学家嘛，礼貌一点说，就是被训练进行观察的人。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先安排了一个人闯进会堂，沿着过道奔跑，而另一个挥舞着一支手枪追他。第三个人从另一扇门冲进来。第二个人向第一个人开了枪。第三个人将第一个人打倒，并从他手中夺过了枪。然后三个人全都从不同的门跑了出去。接着一位心理学家站了起来，叫喧嚷的人们安静下来，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事先安排的，然后要求他的同事们立刻就整个事件写一份完整而详细的报告。他们这样做了，并对报告进行了检查和对比。结果没有一份报告完全正确。没有两份报告完全一致。有一份甚至写道是第三个人向第一个人开了枪。”

沃尔夫停了下来，看了看他们。“故事完了。我讲得不好，但你们也许明白了它的大意。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吗？”

他们点了点头。

“那好，我就不侮辱你们的智力来作解释了。我们该谈谈我们自己的故事了。我们要坐在这里，讨论一下彼得·奥利弗·巴斯托之死，特别是导致了他死亡的第一球道。一点钟我们将共进午餐，然后回到这里继续谈。我们整个下午都要谈论这件事，时间会很长。你们也许会感到累，但不会感到饿。如果你们困了，可以睡一会儿。我把计划讲得这么详细，你们就明白了我们将做的工作有多么辛苦多么艰难。古德温先生已经听过你们两个已成固定版本的故事了。

我想另外两个可能也差不多。固定版本就是一成不变，也一点儿不想变的故事。我不希望你们这些孩子来改变第一球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的故事，我请求你们的是，忘掉所有观点和议论，忘掉所有曾经对朋友和家人的讲述，忘掉所有已经印在你们脑子里的画面，回到场景本身。这一点至关重要。我本打算离开家，和你们一起亲临现场的，但是别人干扰性的插话会毁掉我们的全部努力。我们必须通过想象把场景移到这里。孩子们，这里就是第一球道。

“我们在这里。现在是星期天下午。拉里·巴斯托雇了你们两个；而你们俩跟着金布尔父子，背着他们的包。你们在熟悉的场地上，熟悉得简直像自己的家一样。你们全神贯注于你们熟悉的动作，这些都快变成了本能的活动。你们的肩上是球包的皮带。你，迈克·艾伦，看见了你去年的宝贝巴斯托先生正在远处的球道上用第五号杆作练习，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你跑到了他身旁，拿起了他的包，也许递给他一根球杆……”

迈克摇了摇头。

“不是？那你做了什么呢？”

“我开始追球。”

“啊，追他用第五号杆打出的球？”

“是的，先生。”

“好的。威廉·赖利，在迈克追球时，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嚼口香糖。”

“仅仅是嚼口香糖吗？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当时竭尽最大努力做的事情吗？”

“嗯，我站着，拿着老金布尔的包。”

听着沃尔夫开篇的话，我心想他说得太多了，让孩子们拘束起

来，他们过不多久就会烦的，但事情的进展不是这样。他没有对他们说，却让他们感觉到他在指望他们帮助他证明那一百个心理学家有多笨，而他们不会输的，因为要说的话太长的时候才会说错。

他一步一步地推进，一会儿和这个孩子说两句，一会儿又和那个孩子说两句，一会儿又让他们一起说。他让他们就不同品牌球杆的优缺点展开了漫长的讨论，自己半闭着眼睛装出听得很入神的样子。他又就巴斯托他们的四人赛开始前在同一球道打过比赛的球手和球童的身份和个性，盘问了他们半个小时。每当一个孩子扯远了，沃尔夫就会把他叫回来。从所有这些东拉西扯中，我能看出他在做一件事情，也许是主要的事情：他一刻也不停地注意着每个球包和所有球包中的每根球杆，也就是所有球杆。

弗里茨给了我们两个大大的鸡肉馅饼和四个西瓜当午餐。像往常有客人来聚餐时一样，我来做服务工作。尽管我挥舞着自己的刀叉忙个不停，但当盘子空了时，我却几乎什么也没吃到。分西瓜很简单：我给了四个孩子一人一半，给沃尔夫和我也各切了一半，这样还给弗里茨剩下了一个。我猜他不会碰它的，但心想也许后面还会用得上。

午餐后我们重新开始。沃尔夫仿佛打开了孩子们的头脑，让清新的空气涌入，实在是太妙了。他们争相发言，完全忘了有人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些东西或者他们需要使用自己的记忆力。他们就像一群谈论着前天刚刚打过的一场比赛的孩子，只有沃尔夫居高临下，时时注意着不让他们漏过一个细节，并一次又一次地在他们扯远了时把他们拽回来。即便如此他们也在不断地推进。拉里 · 巴斯托发了球，曼纽尔 · 金布尔也发了球。

每次的停顿都是既简单又自然，然后又会轻松自如地重新开始。

有那么一分钟我走神了，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情况。沃尔夫对矮胖子迈克说道：

“那么你把球杆递给了巴斯托。你把他的球放在发球位上了吗？”

“是的，先生。哦，不，不是我，因为我去捡一个他用五号杆随手打出的球了。”

“没错，迈克，你刚才说过你去捡球了。所以我奇怪你怎么能帮巴斯托把球摆在发球位上呢？”

威廉·赖利说道：“是他自己把球放上去的，球滚了下来，我又帮他重新放好的。”

“谢谢你，威廉。所以你看，迈克，你并没有帮他摆球。你去找那个打出去的球时，不觉得背着重重的球包很讨厌吗？”

“不，我们都习惯了。”

“你找到那个球了吗？”

“找到了。”

“你把它怎么着了？”

“我把它放进了球袋。”

“你这么说，是很肯定，还是想象的？”

“我放进去了。我记得很清楚。”

“马上放进去的？”

“是的，先生。”

“那么在你捡球时，你一定是背着包的。那样的话，在巴斯托发球时，你就不可能把他的发球杆递给他了，因为你不在那里。他也不可能自己把发球杆从包里取出来，因为包也不在那里。你有可能事先把发球杆给他吗？”

“没错，那我一定是事先给他了。”

“迈克！我们可不想听‘一定是’这种话。你到底给了没给？要记住你告诉过我们……”

威廉·赖利插话了：“嘿！迈克，这就是他找老金布尔借发球杆的原因，因为你当时不在，去捡球了。”

“啊。”沃尔夫的眼睛闭上了十分之一秒又睁开了，“威廉，用不着嚷嚷。谁借了金布尔先生的发球杆？”

“巴斯托呀。”

“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我不是那么想，我知道得很清楚。是我把发球杆从包里拿出来，准备递给老金布尔。巴斯托的球从发球位上滚了下来，我帮他重新摆好了。当我站起身来时，老金布尔对巴斯托说：‘用我的吧。’巴斯托伸出了手，我把老金布尔的发球杆递给他的。”

“他用了？”

“是的。他马上发了球。直到老金布尔也发了球后，迈克才背着那个包回来的。”

我竭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没从椅子上跳起来。我真想跳一个从电影上看到的像《山顶上的春天》那样的舞，再给威廉·赖利掐一束兰花，再尽可能长地伸出双臂，环抱住沃尔夫一半的躯体。我不敢看沃尔夫，害怕自己会放声大笑起来，笑掉自己的下巴。

他又问了脸色苍白、皮包骨头的孩子和那个想做好公民的孩子，但他们俩都记不起巴斯托借球杆的事了。皮包骨头的孩子说他的眼睛像胶水一样紧盯着球道，看见曼纽尔·金布尔将球杆伸进了灌木丛，而想做好公民的孩子则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沃尔夫又转向了矮胖子迈克。迈克不敢肯定当他背着球包去捡球时巴斯托的发球杆是

否在包中，但他记不起曾经把球杆递给巴斯托了，也记不起巴斯托曾把球杆还给他而他又将球杆放回包中了。在所有这些谈话进行过程中，威廉·赖利竭力保持着礼貌，一动不动。最终沃尔夫又转向了他：

“请原谅，威廉。千万不要以为我不相信你的记忆力或你的诚实。核实永远是有益的。而且你竟然忘了这样关键的细节，多少令人有些奇怪。”

那孩子抗议道：“我并没有忘，我只是恰好没想到。”

“你是说你在给朋友们讲这个故事时，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吗？”

“是的，先生。”

“好的，威廉。我的问题问得很糟糕，但我能看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能抓住主要线索。也许你对安德森先生提起过这事？”

那孩子摇了摇头。“我没见过安德森先生。有个侦探来问过我们几个问题，但不多。”

“我明白了。”沃尔夫深深而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按了按电钮，“现在该喝点茶了，诸位。”

对沃尔夫来说，茶当然指的是啤酒。我站起身来将孩子们叫到一起，领着他们来到厨房。那个西瓜果然原封未动。我把它切成四块分给了孩子们。为沃尔夫准备啤酒的弗里茨将一个杯子和两瓶酒放进了一个托盘，但当他走进厅里时，我注意到他拐向了楼梯而不是办公室。我瞟了一眼手表，差两分四点。那个恶棍时间抓得真紧！我让孩子们吃着西瓜，自己迅速冲了出去，在电梯口截住了他。他说：

“替我谢谢孩子们，付给他们足够的钱，但也别太慷慨，因为我不是个慷慨的人，然后把他们送回家。在你离开前，给E.D.金

布尔的办公室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什么时候从芝加哥回来。如果他有足够的机智或足够的运气能在这一千多英里的旅程中逢凶化吉，那么他也许还活着。万一他回来了，立刻把他请到这里来。刻不容缓。”

“是，先生。还有，你难道不认为如果安德森先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只会更迷惑更烦恼吗？我要不要说服孩子们保守这个秘密？”

“用不着，阿奇。无论有没有机会，顺其自然总是明智的。惯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当我回到厨房时，弗里茨正在切一个苹果馅饼。

第十三章

当我在韦斯特切斯特东奔西跑，把球童们一个个送回家后，我当然很想闯进金布尔家对曼纽尔说：“你是否介意告诉我，你父亲是否将他的高尔夫球杆保存在俱乐部的柜子里，你是否有那个柜子的钥匙？”我知道他能意识到这种问题不是他皱皱眉毛就能打发得了的。我将使他的气焰下降两千伏特。但我也明白，如果我们的对手就是他的话，我们有一大优势，就是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我也明白如果我想让曼纽尔·金布尔被捕并判以谋杀罪，单有他让我紧张这一事实是远远不够的，我还需要一些证据。

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诱惑，就是顺访安德森的办公室，提议押一万美元，赌没有任何人谋杀彼得·奥利弗·巴斯托。沃尔夫无疑是启动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有两天的时间，除了凶手之外，他和我是仅有的两个知道巴斯托是死于谋杀的人；现在，除了同样的那位例外者和球童们之外，我们又成了仅有的两个知道他是被意外

杀死的人。

当我把最后一名球童送回家后，我的确去了趟青草地俱乐部，它就在附近。我本想再问一问关于柜子的问题，但当我到达后，又冷静了下来。如果人们知道了我们对柜子有丝毫的兴趣，都会导致前功尽弃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巴斯托的球包从来没在他的柜子里待过。因而我只同球童老板随便聊了几句，同主管打了个招呼。本希望还能再看上曼纽尔·金布尔一眼，但他没在那里。

E.D. 金布尔正像他儿子所说的那样，在珍珠街有一间谷物经纪办公室。当我在四点刚过打电话过去时，他们告诉我 E.D. 金布尔将在次日，也就是星期五，乘“世纪”号列车从芝加哥返回。如果不是这条消息，我想也许当晚我会在韦斯特切斯特郡展开点什么活动的，也许会等到天黑潜入金布尔家趴在窗户上偷窥。但既然 E.D. 金布尔已在归途中了，那除了等待就再没别的事情可做了。于是我回家了。

当天晚餐后，沃尔夫要我拿着笔记本，再给他读一遍我访问曼纽尔·金布尔的情况，以及萨拉和拉里·巴斯托所谈的一切与他有关的事情，不过他们说的并不多。我们泛泛地谈了谈，以便我们的头脑做好准备。我们甚至考虑了老金布尔借球杆是有预谋的，是他谋杀了巴斯托，当然，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这纯粹是胡思乱想。我大肆挖苦曼纽尔，但当沃尔夫认真起来，一一指出我的破绽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不仅没有任何对曼纽尔不利的证据，甚至都没有理由怀疑他。就我所知，他接触 E.D. 金布尔球柜的机会并不比青草地俱乐部任何其他会员更多。

“然而，”我坚持道，“如果他是我儿子，我仍然要送他去周游世界，然后沿太平洋筑一道他无法穿越的篱笆。”

在我们就寝前，沃尔夫大致交代了我随后几天需要做的事情。他吩咐的第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但无疑是正确的。球童们肯定会谈论来我们这里的情况，而他们的话肯定会传到安德森耳朵里。既然他早晚要知道，我们先去告诉他就没有任何坏处。我可以先送去这顺水人情，然后再去金布尔的办公室也不迟，那会儿他可能刚刚从中央火车站赶到。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又开着敞篷车奔向了怀特普莱恩斯。我希望再被那个骑着摩托的交警拦住一次，那就太妙了，我可以像昨天一样再给他编个故事，没准这回他会一直把我护送到郡政府大楼呢。然而我从伍德朗一直开到怀特普莱恩斯的主要大街，除了看见一只松鼠蹿上树外，再没看到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

我正跟在三辆慢腾腾的公共汽车后，像一匹小马跟着一群大象进行马戏团游行一样沿着怀特普莱恩斯主要大街行驶时，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每当沃尔夫希望什么人访问他的办公室时，似乎他以为他需要做的就是吩咐我一声，去把这个人叫来就行了，然而我从以往的经验得知，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碰上一位像蜈蚣一样长着一百只脚，而哪只脚都不愿意来的家伙。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不仅要把一位外出一星期刚刚返回办公室的出色的谷物经纪人立刻拽出来，还要去给一位地区检察官通风报信，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我将有幸在E.D.金布尔办公室的接待室里见到H.R.科贝特或其他粗鲁的警察。难道不是这样吗？于是我把敞篷车停在了第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就去找了个电话，打给沃尔夫说我们应把行动的次序颠倒一下。他有些顽固，和我争了起来，因为他一心认为在安德森不可避免地要知道某事之前我们主动告诉他是有好处的，但当他看到我也固执己见，并且眼看着电话费

就要到一美元时，他说算了，我可以返回纽约并直奔珍珠街守候我的猎物。

在返回的路上，我心想，没得到那个骑摩托的警察的“照顾”，毕竟是件好事。

当我在珍珠街找到了要找的门牌号，乘电梯上了十层后，我发现E.D.金布尔的公司可不仅仅是向后院的养鸡大王们卖鸡饲料。它有一套房子，占据了半层楼，所有的门上都有公司的名字，有一座主大门，比一般的门要大上两倍，上面写满了全国各地谷物交易所的名字。墙上的钟显示是差一刻十点。如果“世纪”号正点的话，它已经到达中央车站了，估计金布尔将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后赶到这里。

我同前台的姑娘说了几句话，她打了个电话后把我领进了里面的一间屋子，一个方下巴的男人把脚跷在窗台上，正在读早晨的报纸。他说了声：“请稍等。”我就坐下了。过了一会儿，他把报纸扔到桌子上，转过身来。

“E.D.金布尔先生很快就会到这里，”我说道，“我知道他很忙，需要处理他外出这一星期的事务。但在他开始工作前，我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同他谈一件非常紧急的私事。我是一名私家侦探。这是我的名片。他从未听说过我。我为尼禄·沃尔夫工作。你能为我安排一下吗？”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就行了。”

我摇了摇头。“这的确是私事，而且非常紧急。你只需相信我诚实而年轻的脸就行了。如果你认为我是胡说八道的话，就请给三十四街的大都市信托公司打个电话。他们会告诉你我业余时间在那里照看童车，挣点零花钱。”

方下巴笑了。“我不知道。金布尔先生有一打约会。第一个是十点三十分。我是他的秘书，我对他的事情比他自己还了解。你最好跟我说吧。”

“我很抱歉。我必须亲自同他谈。”

“好吧，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吧。请在前台——不，就在这里等吧。想看看报纸吗？”

他把报纸扔给了我，然后站起身来收拾了一些信件和材料，拿着它们出去了。早晨匆匆吃早餐时我曾瞟了一眼报纸的头版，但没来得及细看。将报纸翻开后，我看到巴斯托案已经被安排到了第七版，而且内容也不多。安德森说“调查已有进展”。亲爱的进展哟，我心想，自打我上次见到你以来，你没有任何变化，除了脸上多了些皱纹，牙齿正要脱落。验尸官就巴斯托中的毒没有任何说法，只是说就快有结果了。在我看过的所有报纸中，没有一份暗示说谋杀是家庭内部所为。现在，我想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暗示了。但有一小篇文章又对布拉德福德大夫进行了一番小小的嘲讽，我想恐怕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一听见冠状血栓就要反胃了。我把报纸翻到了体育版。

门开了，那位秘书出现在门口。

“古德温先生。这边请。”

隔壁是一间两面都有窗户的大屋子，里面有许多旧家具，屋角有一台期货行情自动收录器，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他脸刮得很干净，头发已经花白，虽然不胖，身材却很高大。他看上去既忧郁又快活，好像有人刚刚给他讲了个滑稽故事而他又恰好牙痛似的。我不知道秘书向他提及我这件事让他快活还是忧郁，但后来我发现两者都不是，他看上去总是这么一副模样。

秘书说道："金布尔先生，就是这个人。"

金布尔咕哝着问我有什么事。我说纯粹是私事。金布尔说："那样的话你最好和我的秘书谈谈，免得我再交代给他办了。"说罢他大笑起来，秘书微笑了，而我也咧嘴笑了。

我说："我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开始说了。尼禄·沃尔夫希望你今天上午十一点访问他的办公室。"

"仁慈的上帝啊！"他脸上快活的表情占了上风，"尼禄·沃尔夫是英国国王还是其他什么人物？"

我点了点头。"是个人物。我来告诉你，金布尔先生，如果你想迅速并清楚地理解我的意思，就让我直接说完吧。请听我说。六月四日，星期天，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在和他儿子以及你和你儿子一起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死亡了。六月八日，星期四，你就离开这里去芝加哥了。六月十一日，星期天，验尸结果公布了。我想这些芝加哥的报纸也登了？"

"嗯，是的。"他脸上忧郁神色的比例开始上升，"我知道我回来后就会有这些烦人的事。我读了很多关于毒药和针之类的胡说八道。"他又转向了秘书，"布莱恩，我难道没有给你写信说我回来后会有这些烦人事吗？"

秘书点了点头。"是的，先生。您十一点半时需要会见韦斯特切斯特地区检察官的代表。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

我强忍住没笑出来。"这不是胡说八道。金布尔先生。巴斯托是被一根从高尔夫发球杆的柄中射出的毒针杀死的。毒针是藏在球杆里的。现在请再听我说一分钟。你们都在第一球道，准备击球。你们四个人和你们的球童——不，请不要打岔，听我说完，这很严重。请听。拉里·巴斯托发了球。你儿子曼纽尔发了球。现在该彼

得·奥利弗·巴斯托发球了。你站在他旁边。记得吧？他的球从发球位上滚了下来，你的球童帮他摆好了，因为他的球童去捡球了。记得吧？他准备发球，却没有球杆，因为他的球童是背着他的包跑开的。你说：'用我的吧。'你的球童帮他把球摆好后，站起身来，把你的发球杆递给了他。记得吧？他用你的发球杆发了球，然后就跳了起来，开始抓他的肚子，因为一只黄蜂螫了他。正是这只从你的发球杆里飞出的黄蜂杀了他。二十分钟后他就死了。"

金布尔皱着眉头听我说完，忧郁和快活的表情全都消失了。他继续皱着眉。当他最终开口说话时，他说的是："胡说八道。"

"不，"我说，"是否胡说八道并不由你说了算。不管是不是胡说八道，巴斯托在第一球道用的是你的发球杆。你记得吧？"

他点了点头。"是的。我倒没想过这一点，但既然你提醒了，我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正像你所说的……"

"金布尔先生！"秘书终究是秘书，"您也许……最好是……再想一想……"

"最好是再什么？哦，不，布莱恩，我知道这将是件烦人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巴斯托当然用的是我的发球杆。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呢？我几乎不认识巴斯托。毒针的故事当然是胡说八道，不过这不妨碍它是件烦人的事。"

"这比烦人的事还要糟糕，金布尔先生。"我把椅子向他挪了挪，"你看，警察还不知道巴斯托用的是你的发球杆。地区检察官也不知道。我倒不是建议你向他们隐瞒什么，因为他们终归会知道的。虽然你认为毒针是胡说八道，但他们认为不是。他们知道巴斯托是在第一球道被从他的发球杆里飞出的一根针杀死的，而当他们最终发现他用的是你的球杆时，他们会怎么办？他们倒不会就这样以谋杀

罪逮捕你，但他们肯定会请你查查字典，找一个比烦人的事更好的词的。我的建议是，去见见尼禄·沃尔夫吧。如果你愿意，带上你的律师，但要尽快见他。”

金布尔正捋着嘴唇的手垂了下来。最终他说道：“仁慈的上帝啊！”

“是的，先生，只能如此了。”

他看了看他的秘书。“你知道，布莱恩，我跟律师没有任何关系。”

“是的，先生。”

金布尔站了起来。“这真是件讨厌的事情啊。布莱恩，我曾经对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擅长一件事，就是贸易。我是个好商人，但当你知道我实际上有多么软弱时你会很惊奇的。我心肠很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私人事务。”他在办公桌后踱来踱去，“是的，这事看来远不只是烦人。仁慈的上帝啊！你会怎么办呢，布莱恩？”

我逼视着那秘书，他犹豫了。“如果您愿意去见这位尼禄·沃尔夫，我可以陪您去。如果我是您，我会带一位律师的。”

“我都有什么约会？”

“都是些平常的事情，没什么重要的。十一点半约的是地区检察官的人。”

“哦，我先不见他了。嗯，随便找点什么理由吧。行情怎么样？”

“刚刚开盘。棉花下跌了。”

金布尔转向了我。“这位尼禄·沃尔夫在哪里？把他带到这儿来吧。”

“不可能，金布尔先生。他嘛……”沃尔夫曾有一次发现我对别人说过他身体很弱，我可不想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他是个古怪的

天才。他就住在三十五街。我的车在楼下，我很愿意送你过去。”

金布尔说：“我这辈子只见过一个天才，是个阿根廷牛仔，加乌乔牧人[1]。好吧，在办公室前厅等我吧。”

回到我最初进入的前厅后，我坐在了椅子边上。见到E.D.金布尔，端详过他，和他交谈过后，我的思路多少变得清晰了一些。我清楚地看到了昨晚我就该意识到的问题，在我们得知是金布尔的发球杆成了沃尔夫所说的致命玩具的那一刻，在金布尔本人现身的那一刻，我们恐怕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某种戏法杀死了，你又设法让他苏醒过来，问他是谁杀了他，并得到了他的回答。E.D.金布尔就是这样，一个遭到谋杀却仍然活着的人。我要把他送到沃尔夫那里，锁上门，而且要尽快，要抢在科贝特等人的前面，或者说，要抢在所有人的前面。我怎么知道那个秘书——方下巴的布莱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可能在那根发球杆上做手脚，再找机会把它塞进金布尔的包中。那一刻，当我坐在椅子边上时，我甚至想象着布莱恩也许正用刀子刺向金布尔，正如他刺向马费伊一样……

现在是十点五十分。我站起身来开始踱来踱去。安德森的人——我敢肯定是科贝特——将在十一点半来访，但也许他那个笨脑袋会想到早来一会儿在门口等等呢。我正要请前台的姑娘打电话给布莱恩，里屋的门开了，金布尔戴着帽子出现了。我非常高兴看到了他。他向我点了点头，我跳向了大门，为他开了门。

当我们走进电梯时，我问道：“布莱恩先生不去？”

---

① 加乌乔牧人（gaucho），居住于南美大草原上的牧人，多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合血统。

金布尔摇了摇头。“这里的事情比我更需要他。我喜欢你的脸。我发现每当我喜欢某个人的脸时，情况都会好起来。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之一。要相信你的同胞。”

是的，我心想，我敢打赌一个像你这样成功的商人是有很多信任可以享用的。

离我停车的地方只有半条街远。我向西绕了点路以避开交通堵塞，但当我让金布尔走在我前面进了沃尔夫的大门时，已经十一点一刻了。

我把金布尔领进了前屋，请他稍等片刻，然后回到大门口又检查了一遍门闩。接着我走进厨房，弗里茨正在做草莓馅饼，其中的一张刚刚出锅，我撕下一小块塞进了嘴里，结果差点儿烫掉了舌头。我对弗里茨说：“有一位客人来吃午饭，千万别给他下毒。如果有人来访，不要随便放他进来。如有可疑的人，立刻叫我。”

办公室里，沃尔夫在他的桌前。我一看见他就怒从心头起，因为他在收拾屋子。他的桌子只有一个抽屉，一个又宽又浅的抽屉，在桌子中间。自从他改喝瓶装啤酒，而不是用罐子从地下室打啤酒以来，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打开一瓶啤酒，他就会拉开抽屉，把啤酒瓶盖扔进去。弗里茨不会开办公室里的任何抽屉，我知道沃尔夫有很多怪念头，也许他攒啤酒瓶盖有什么用途，所以我也没理他。现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半开着抽屉，把啤酒瓶盖扔得满桌子都是，他正用它们码堆儿。

我说：“E.D.金布尔先生正在前屋。你想让他来帮你做这事吗？”

“见鬼。”沃尔夫打量着他码的堆儿，又无助地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他能等等吗？”

"当然，没问题。那下星期怎么样？"

他又叹了口气。"讨厌。那就叫他进来吧。"

"就让这堆垃圾摆满桌子吗？哦，也好，我跟他说过了你是个怪人。"我本已压低了声音，现在又压低了一些，对他说了去金布尔公司的情况和同金布尔的谈话。他点了点头，我就去请金布尔了。

金布尔又恢复了他忧郁加快活的表情。我给他们做了介绍，帮他拉了把椅子，在他们寒暄了几句后，我对沃尔夫说："先生，如果您不需要我，我要处理那些报告了。"他点了点头。我就坐在了我那张堆满了纸片的办公桌前，纸堆中有个便笺簿，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做笔记用的。我用自创的速写符号来做记录，这样就可以一字不漏地记下非常快的谈话，谈话者如不留神，还会以为我是在处理上星期肉铺的账单呢。

沃尔夫正在说："你说得太对了，金布尔先生。一个男人只有在逆境中时间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在很多情况下他的时间都可能被剥夺：洪水、饥荒、战争、婚姻，更不用说死亡了，这是最令人满意的失去时间的方式，因为一切问题都最终解决了。"

"仁慈的上帝啊。"金布尔有些烦躁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令人满意的。"

"你差点儿就明白了，就在一星期前，上星期天。"沃尔夫向他晃了晃一根手指头，"你是个大忙人，金布尔先生，你外出了一星期，刚刚回到办公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在今天上午抽空来见我呢？"

金布尔瞪大了眼睛。"这正是我希望你告诉我的。"

"好的。你来是因为你困惑。对于一个像你这样处于极端危险境地的人来说，这不是令人满意的情况。我从你脸上看不到警惕和恐

惧，只有困惑。既然你已经听到了古德温先生对你说的话，这就令人惊奇了。他告诉过你，十二天前，就是六月四日，完全是一次意外要了彼得·奥利弗·巴斯托的命，而这同样的意外救了你的命。据说你一点儿也不相信他的话，而且是很粗鲁地表达出来的。为什么？”

“因为那都是废话。”金布尔不耐烦了，“全都是垃圾。”

“在此之前，你用的词是‘胡说八道’。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胡说八道。我来不是为争论这个问题的。如果警察有什么事情弄不明白，解释不了，想编个什么异想天开的故事为自己开脱，那没问题，我赞成让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但他们用不着寄希望于我，他们完全可以不把我牵连进来。我是个忙人，我有更有价值的事情要做。沃尔夫先生，你错了，我来见你不是因为我困惑，我当然不是来给你提供机会吓唬我的。我来是因为警察显然要错误地把我牵涉进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里，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和我不想要的曝光机会，而你的人让我的理解是，你能够告诉我如何避免。如果你能，请继续讲，我会付酬给你的。如果你不能，也请直说，我会去寻求更好的建议的。”

“嗯。”沃尔夫靠回了椅子背上，用他那半闭的眼睛端详起这位经纪人的脸，最后他摇了摇头，“我恐怕没法告诉你如何避免麻烦，金布尔先生。但我也许有幸能告诉你如何逃避死亡。甚至这也不大肯定。”

“我从来没打算逃避死亡。”

“不要回避问题。我指的当然是令人不快、迫在眉睫的死亡。坦率地对你说，先生，如果我不立刻祝你日安，让你离开去忙自己的事，绝不是因为我确知你正面临着死亡而你却像个傻瓜一样。我克

制自己没有献身于某些基督教事业，是因为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当强制性地去拯救别人。但这件事情上我有自己的利益。巴斯托太太悬赏五万美元寻找杀害她丈夫的凶手。我想找到他，为此我只需知道谁想在六月四日杀你即可，而且如果找不到办法制止他的话，他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行凶。如果你愿意帮助我，那么对我们两人都有利；如果你不愿意，恐怕我只能通过他下一次尝试行凶时出现的某些纰漏或不幸来让他为他流产的第一次负责了。自然，对我来说两者是无所谓的。”

金布尔摇了摇头，但他没有站起来，相反，他坐进了椅子里。他仍然没有表现出警惕的迹象，看上去只是来了兴趣。他说："你很会讲话，沃尔夫先生。我不认为你会对我有什么用，因为你看来像警察一样喜欢异想天开的故事，但你很会讲话。”

“谢谢你。你喜欢讲得好的话吗？”

金布尔点了点头。“我喜欢一切好的事物。讲得好的话，做得好的生意，好的风度，好的生活。我不是指高标准的生活，而是指好的生活。我本人在努力过上好的生活，我认为其他人也都想过上好的生活。我知道有些人做不到，但我认为他们也想。刚才坐在你的人的车里来这里时，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他对我说的话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那当然会打动我。我跟他说那是胡说八道，是认真的，我仍然这样认为，但他的话仍然让我开始思考了。如果有人想杀我，该怎么办？谁想杀我呢？”

他停顿了，沃尔夫低声地对他说道：“是啊，谁想杀你呢？”

“没有人。”金布尔断然地说道。

我心想，如果这家伙最终证明也像巴斯托一样，受人爱戴到连蚊子都不肯咬他一口的地步，那我就要崩溃了。

沃尔夫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杀了两个人，只因为在一桩马匹交易中被人占了便宜。"

金布尔大笑起来。"我很高兴他没有做谷物交易。如果他这种方式很普遍的话，那我就不止被杀一次了，而是一百万次了。我是个好商人，我为此而感到骄傲。我所喜爱的是小麦。当然你们所喜爱的是异想天开的故事和好的凶手，那没问题，那是你们的事。我喜欢的是小麦。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七亿蒲式耳小麦吗？我知道此时此刻每一蒲式耳在哪里。每一蒲式耳我都知道。"

"你本人也许拥有其中一百蒲式耳？"

"不，一蒲式耳也没有。我清仓了。明天，或者下星期，我会买进。但我说过，我是个好商人。我在很多笔买卖中都赚了钱，但从来没招来过抱怨和非议。我始终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是我在来这里的路上所想的。我不了解巴斯托这件事的所有细节，我只了解从报纸上看到的。就我的理解，他们并没有找到那根发球杆。而我根本不相信它存在过。然而即使他们找到了它，即使我的确在第一球道把我的杆借给了巴斯托，我仍然很难相信有什么人想杀我。无论是在生意上还是在私生活中，我都始终遵守规则，公平交易。"

他停顿了。沃尔夫低声说道："伤害的种类有很多，金布尔先生，有真正的、想象的、实质性的、精神的、琐碎的、致命的……"

"我从没伤害过任何人。"

"真的？那这样吧。圣徒的精髓就是赎罪。如果你允许的话，请听我的看法。我没有伤害过谁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到来刺激了我想忏悔，但的确是这样。忘掉巴斯托谋杀案吧，既然你认为那是胡说八道；忘掉警察吧，我们会想办法阻止他们成为你的烦恼。我喜欢和你谈话，除非你有非常急迫的事情。我不想耽误你的任何

急事。”

“不会的。”金布尔看上去高兴了起来，“任何紧急的事情我都会专心致志地处理的。我不在办公室已经一个星期了，再多一小时也不会坏什么事。”

沃尔夫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你愿意喝杯啤酒吗？”

“不，谢谢。我从不饮酒。”

“啊。”沃尔夫按了一下电钮，“你真是个非凡之人，先生。你既不沾染恶习，同时又是个好商人和哲学家——拿一个杯子来，弗里茨——但我们在谈论伤害，而我一心想着忏悔。我没有伤害过谁呢？这当然是夸大其词。我并不想装成一个恶棍，但我受着浪漫的良心的折磨。即便如此，退一万步讲，我仍然难以理解为什么我还能活着。不到一年前，就有一个男人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发誓要利用他能捕捉到的第一个机会杀了我。我纯粹是受了雇用，剥夺了他的生存基础。还有一位妇女住在离这里不到二十条街的地方，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而假如她听到我的死讯，她的胃口和性情都会得到巨大的改善。这样的例子我能继续举到无限多。还有一些，更难以忏悔，也更难以得到宽恕——谢谢你，弗里茨。”

沃尔夫从抽屉里拿出了瓶起子，打开了酒瓶，再合上抽屉前让瓶盖落了进去。然后他斟满了一杯，一饮而尽。金布尔说：“当然，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自己职业的危险。”

沃尔夫点了点头。“你又一次显示了自己哲学家的一面。金布尔先生，很容易看出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教养的人。也许你能理解一种晦暗的心理，促使——嗯，我，例如——坚持某种应当彻底谴责的行动。此时此刻在这座屋顶下有一位妇女，住在这座楼的顶层，她不希望我死只是因为她心脏自身的芳香抵挡了毒液。我每

天、每小时都在折磨她。我知道我在这样做，因此我的心也在受着折磨。当我告诉你这位妇女就是我的母亲时，你能猜得出这种心理有多么晦暗，而我受的折磨有多么深。”

我把他说的都记了下来，我差点儿惊讶得抬起眼睛来看他。他说得如此动人，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内心的浪潮汹涌澎湃，只是靠坚强的意志才压制了下去。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要为他母亲难过了，尽管每个月都是我在平衡银行账户，为远在布达佩斯的她汇款过去。

“仁慈的上帝啊。”金布尔说道。

沃尔夫一边倒着另一杯啤酒，一边慢慢地摇着头。“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能说出那么多的伤害，因为我太熟悉了。”

在我看来金布尔不会明白这一暗示。他看上去充满同情，也自我满足。实际上，他得意地笑道：“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呢？”

沃尔夫的眉毛扬了起来。“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十二岁就辍学了——在伊利诺伊——然后离家出走。严格地说那不是家，只有一位叔叔和婶婶。我父母都去世了。自那以后我就再没上过学。如果说我受过教育，那全是自学。”

“这不见得是坏事。”沃尔夫的声音又低又平静，简直就像是嘟囔，是那种他通常要说“继续”但又不说时的声音，“你是又一个例证，先生。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如果他有志气有勇气，纽约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

“也许，也许。但我没有到纽约来。我去了得克萨斯。在潘汉德尔待了一年后，我到了加尔维斯顿，又从那里去了巴西和阿根廷。”

“真的？你真有种。你受的教育是世界性的。”

“嗯。我到过许多国家。我在南美洲待了二十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阿根廷。当我回到美国时，我简直要进学校重新学习英语了。我经历过，嗯，我经历过很多有趣的生活方式。我见识过很多暴力行为，也曾参与其中，但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坚持一条，我总是遵守规则。回到美国时，我正在卖啤酒，但渐渐地，我进入了谷物业。我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才能。谷物这一行不仅使一个人不怕去猜测，而且还要像加乌乔牧人骑马一样借助自己的猜测能力。”

“你是加乌乔牧人吗？”

“不，我一直是个商人。我天生就是块商人的料。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否相信。我一点也不感到羞耻，有时候坐在办公室里，有一打市场等着我看并决定跳进哪一个时，我还会记起那段经历并为之感到骄傲——我贩过两年大麻。”

“真的吗？”

“真的。骑在马鞍上，一个季节跑三千英里。现在我走路时还看得出来呢。”

沃尔夫充满钦佩地看着他。“你是个真正的游牧者，金布尔先生。当然，那时候你还没结婚吧？”

“没有。我结婚很晚，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那时候我已经在梅奥街有一处办公室了……”

他突然停了下来。沃尔夫又倒了一杯啤酒。金布尔看着他，但他的眼睛实际上在跟随着某种看不见的动作，因为很显然他的眼神是向内的。有什么东西突然将他拽向了另一个场景。

沃尔夫向他点了点头，低声说道：“一段难忘的记忆……我知

道……"

金布尔也点了点头。"是的，一段难忘的记忆。这真是件有趣的事情。我想起它，好像是因为你谈起了伤害。不同的伤害种类，想象中的伤害，致命的伤害。但这不是那样的伤害，唯一的伤害是对我。而且不是想象中的。但我也有良心，像你说过你有一样，只是我不认为这有丝毫的浪漫。"

"是你受到了伤害。"

"是的。一种男人所能遭受的最严重的伤害。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至今仍令我痛苦。我娶了一个姑娘，一个美丽的阿根廷姑娘，我们有了一个男孩。那年孩子只有两岁，有一次我外出回来早了一些，结果发现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的床上。孩子和他的玩具在地上。我遵守规则。后来我对自己说过一千遍，如果我必须那样做的话，我还会那样做。我开了两枪……"

沃尔夫低声说道："你杀了他们。"

"是的。血流到了地上，流到了玩具上。我把孩子留在了那儿，走进一家小酒馆喝得酩酊大醉——我经常奇怪为什么我当时没打死那孩子，因为我确信他不是我的。那是我最后一次饮酒……"

"你回到了美国……"

"稍晚一些，是一个月后。那根本不是逃亡，在阿根廷，出了这样的事你根本用不着跑，但我还是卷起了铺盖卷永远地离开了南美洲。后来我只回去过一次，是在四年前。"

"你把那个男孩带回来了？"

"当时没有。我回去就是为了这件事。我当然没要那孩子，我妻子的娘家养了他。他们住在潘帕草原上，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她的。那孩子叫曼纽尔，那是我朋友的名字。是我提议用我朋友的名字给

他起名的。我一个人回来了，此后二十六年我都是独自生活的，我发现市场是一个比我的前妻更好的妻子。但我想我的心中一直存有疑虑，也许是人老了，心肠也自然变软了。也许是我感到孤独了，或者也许我就是想说服自己我的确是有个儿子的。四年前，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我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很快就找到了他。在他还年幼时，那个家庭就分崩离析了，大部分人都死了，他吃过很多苦，但混得还不错。当我找到他时，他是阿根廷空军最好的飞行员之一。我说服他退了役。他在我的办公室干过一阵子，但他不是那块料，他将用我的钱进入飞机行业。我在韦斯特切斯特买了一块地，建起了新房子，我只希望他结婚后不要再走我的老路。"

"当然，他知道——他母亲的情况？"

"我不这么认为。我不知道。我们从没提起过这事。我不希望提起。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懊悔；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我还会那样做的。甚至对曼纽尔本人，我都不假称他正是我想要的儿子。毕竟，他是阿根廷人而我是伊利诺伊人。但他姓金布尔，他自己也很明白。我希望他能娶一个美国姑娘，那样就扯平了。"

"毋庸置疑，"沃尔夫好长时间没有喝杯子里的啤酒，泡沫都消散了，酒液像茶一样静止不动，这时他拿起了杯子，一饮而尽，"金布尔先生，是的，你证明了你的观点：受到伤害的是你。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你治愈了伤痛。如果说那孩子也受到了伤害的话，你正在出色地治疗它。你需要忏悔的不像我的损害那么大。我必须承认是有罪的，正如古德温先生说的，我还没有摆脱伤痛。但是如果那孩子也感到受了伤害呢？"

"不会的。"

"但万一他感到了呢？"

我看到金布尔的眼睛垂了下来。尽管沃尔夫的眼光有时候很难直视，但作为商人的金布尔应当是不会受任何目光影响的。他不是惧怕沃尔夫的眼光，但他也没再直视沃尔夫。突然之间，他站了起来，说道：

“他不会的。我不占你忏悔的便宜，沃尔夫先生。”

“话不是这么说，先生。”沃尔夫不动声色，“你尽可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为什么不坦率一些呢？对我直说是没有危险的。”他看了一眼表，“再过五分钟就是午餐时间了。和我共进午餐吧。我不假装是你的朋友，但对你或你们来说我无疑是毫无恶意的。金布尔先生，三十年前，你面对令人痛苦和失望的情况，勇气十足地付诸了行动，现在你的胆量丧失了吗？我们来看看能做些什么吧。和我共进午餐吧。”

但金布尔不肯。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第一次显得害怕了。他想离开这里。我不大明白为什么。

沃尔夫又试了好几种办法想劝说他留下来，但都未奏效。他离开时显露出恐惧之色，但又极力做到彬彬有礼。他说仁慈的上帝啊，他没注意到已经这么晚了，而且他很遗憾沃尔夫没有就如何阻止警察变成讨厌之人提出什么建议，但他相信沃尔夫会对他们的谈话保守秘密的。

我和他一起走到大门口。我提出开车送他回去，但他说不用了，他可以在街角打一辆出租车。我站在门阶上目送他离去。他说得没错，你能看出他走路时膝盖是向外弯曲的，显然是在马鞍上待得太久了。

我回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已经不在那里了，于是我来到餐厅。他正站在他的椅子前准备坐下，弗里茨正准备将椅子往前推。他坐

定后，我也坐下了。我从没听他在用餐时谈过工作，但我以为那天他会谈的。然而他没有。不过，他也破了一个惯例：通常他一边吃，一边会轻松自如、海阔天空地谈一些碰巧想到的事，我怀疑更多是在对他自己说而不是对我说，尽管我认为自己一向是个好听众。那天他却一言未发。他每咬一口食物，嘴唇都会向外努一下再缩回去。他甚至没想起赞扬弗里茨做的菜，所以当弗里茨收拾了碗筷端上咖啡时，我向他眨了眨眼，他点了点头，回了个严肃的微笑，好像是在说他明白并且不介意。

午饭后在办公室里，沃尔夫坐在椅子里仍然沉默不语。我收拾了我自己桌上的纸张，拿开了便笺上的薄板，将便笺订在一起。然后我坐下来等着沃尔夫重新振作精神。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叹了一声，那口气足以使铁匠的风箱鼓起一下午。然后他将椅子向后推了推，使得桌子抽屉能够打开，然后将桌上成堆的酒瓶盖扫进抽屉。我注视着他。当瓶盖被全部扫进去，抽屉被合上之后，他说道：

“金布尔先生是个不幸的人，阿奇。”

我说：“他是个老滑头。”

“也许。但他仍是个不幸的人。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困扰。他儿子想杀他，而且付诸了行动。但如果金布尔承认了这个事实，哪怕是对他自己，他都完了，他也明白这一点。他的儿子，以及通过他的儿子延续下去的未来金布尔家族，是他目前生活的全部目标。所以他不能承认也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如果他不承认，而且不仅不承认还要为之做些什么，那他也完了，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会死去，而且是以极其令人不快的方式死去。他实在是进退两难呀，这不奇怪，因为他的处境格外错综复杂。他需要帮助，可又不敢请求帮助。他不敢请求帮助的原因是，像所有凡夫俗子中的傻瓜一样，他的希

望是毫无希望的。如果——可他不承认，但任何人都没有像他这样可怜到连‘如果’都不能承受的地步——如果他的儿子的确企图杀他，却意外地杀了巴斯托，他该怎么办？他儿子会不会把这倒霉的意外看做一种征兆？他会不会被说服——父亲甚至可以像男人对男人一样与他商谈——与命运作个明智的交易，用他父亲的命来换那条被他意外地剥夺的命？那样的话金布尔就可以活着抱孙子了。与此同时，即使这个可谓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交易能够达成，仍然存在着巨大而经常性的危险，足以吓倒更幼小者和更诚实者。但他不敢请求帮助，因为这样他就会使他儿子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中。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困境，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前后左右有这么多野牛，而每头野牛的角还都这么锋利。这令金布尔非常困惑，于是他做了我怀疑是他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开始装傻。他将自己暴露在儿子面前，没有任何保护。事实隐藏于他说漏了嘴的恐惧背后，而这恐惧又是他否认的。”

沃尔夫停顿了一下。他向后靠在椅子上，让下巴垂下，将手指交叉在肚子上。

“很好，”我说，“你对金布尔分析得很透彻。现在说说曼纽尔吧。我跟你说过他曾让我感到紧张。除此之外，要不要我拿打字机来，把他杀害巴斯托的所有比较明确的证据打一张单子？”

“该死的。”沃尔夫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勾画的图画一定是粉饰过的。罐头盒已经空了，阿奇，实际上罐头盒本身都没了。什么证据也没有。”

我点了点头。“我可不可以提个建议？阿蒙克有个小飞机场，离普莱森特维尔只有几英里。我可不可以开车去那里打探点消息？”

“可以。但我怀疑他不会使用公共机场。他会选择隐秘的地方的。所以在你去之前，试试这招。做个记录吧。”

“长吗？”

“很短。”

我拿出了便笺和铅笔。沃尔夫口授道：

任何在六月五日星期一晚上看到我驾飞机在草地上降落的人，请与我联系。我在和人打赌，必有重谢！

我说：“太好了！太妙了！但他也可能在高尔夫球道上降落呀。”

沃尔夫摇了摇头。“那里人也太多了，而且会引起高声反对的。还是写草地吧，这是肯定的。不，不要打电话。你出城的时候在《时报》办公室停一下。把这个广告放在那里，并告诉他们确保答复只能传到我们这里。还有，对，在其他报纸，晨报和晚报，也作同样的安排。曼纽尔·金布尔很聪明，这点很恼人，如果他看见了广告，也会想法去获取答复的。”

我站起了身。“好的。我这就去。”

“稍等。你去阿蒙克，路过怀特普莱恩斯吗？”

“路过。”

“那么顺便去看一下安德森吧。除了卡洛·马费伊和阿根廷外，把其他的一切都告诉他，表示一下友好。还要告诉他，E.D.金布尔处于紧急和经常性的危险中，应予保护。当然，金布尔会否认这一点，预防措施很可能是徒劳的；但是，当一个人像你我这样承担起干预歹徒阴谋的任务时，某些责任是必须承担，不可忽略的。”

我知道这事必须做，但还是说了一句："我会尽快去给安德森通报消息的，就像给地铁警察一点小费一样。"

"尽快，现在就去，"沃尔夫回答道，"没准我们还能给他寄份账单呢。"

第十四章

到报社投广告和夏天星期五下午的交通堵塞，使我赶到怀特普莱恩斯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时已将近四点。我没有事先打电话看安德森或德温在不在，因为我要去阿蒙克，无论如何是要经过怀特普莱恩斯的。

他们都在。当我走向前台办公桌旁的那个姑娘时，她向我投以一个微笑，这令我很受用。如果他们不再记得你，说明你已经风光不再了。她没有问我的名字或者我想见谁，而是点了点头，按下了电话交换台的一个键。我说："你认为我是什么人，一个来赎罪的人吗？"她说："他们会杀了你来取代小牛的。"她对着电话说了几秒，一扇门就开了，德温走了出来。

他走向了我。"你有什么事？"

我咧嘴一笑。"这事可紧急了。你能马上把本·库克叫来吗？"我不想和他斗嘴，便又径直切入了正题，"我有些事情想告诉安德森

先生，或者你，或者你们两位。”

我从未打听，所以迄今也不知道，自验尸以来六天的时间里，怀特普莱恩斯这帮家伙们怎样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当然有一两条暗示。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安德森告诉我说科贝特在荷兰大学待了两天。也许他们打听到一些传言，诸如巴斯托把某个学生在学校里多留了一两个小时之类的。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安德森甚至都不知道巴斯托用的是他太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一包新的高尔夫球杆，直到我告诉他。那天下午我只得到一条新的消息：一位纽约的化学家明确地说，巴斯托的血液中显示有蛇毒。正是这份报告使得安德森和德温的心思离开了高尔夫球杆，兴趣盎然地转移到铜头蛇身上。尽管我极不愿意承认，但这消息也让我不舒服了好几个小时。虽然这使得那根针无法解释，但我见过许多比一个人肚子里的针更离奇的事情，最后都碰巧能够说得通。铜头蛇在韦斯特切斯特可不罕见；谁能保证不会有一条在星期天访问了青草地俱乐部并咬了巴斯托一口呢？可能咬他的脚，也可能咬任何地方。这足以令人头疼了。蛇毒报告还没有发给新闻界，因而我也不知道，是安德森和德温告诉我的，所以没让我失态。

当然，即使青草地俱乐部的球道下一英尺处布满了铜头蛇，安德森和德温也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尼禄 · 沃尔夫事先准确地告诉了他们验尸将显示的结果。

德温把我领进了安德森的办公室。安德森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不是警探，看上去像个律师。我坐下了，把巴拿马草帽放在了膝盖上。

安德森说：“你来干什么？”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我都不愿意跟他开开玩笑，因为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脸还是气质，都令我深深地厌恶，以致我觉得唯一能令我真正满意的就是退后一步，然后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德温就不同了，我虽然也谈不上喜欢他，但毕竟还愿意和他逗逗乐子。

我说："我替尼禄·沃尔夫来通报些情况。你最好叫个速记员来。"

他先是大放了一通厥词，我耐心地克制了自己。既然不能用我最想用的方式，想一堆花言巧语来回击有什么意思呢？于是他很快也感到无趣了，便叫了个速记员来，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讲到了生日礼物，讲到了巴斯托球包的下落以及是谁扔了它，讲到了金布尔在第一球道借球杆的事情。我建议他们去寻找金布尔的球包，看看他把它放在了哪里，有谁有机会接触到它，不过我认为沿着这个方向走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曼纽尔肯定已经消灭了所有机会。然后我向他们传达了沃尔夫关于保护金布尔的口信，并强调了这一点。我说沃尔夫认为保护有生命危险的公民的安全是权力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他对于E.D.金布尔可能随时遭遇的不测，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别人，都不能负责。

我说完后，安德森问起了问题。有些我答了，有些没答。但有很长一阵子，他仍然坚持问个不休，直到最终我对他咧嘴一笑。

"安德森先生，"我说，"你在引诱我跳陷阱。"

他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但没有成功，古德温。我坦率地告诉你，当验尸结果证实了沃尔夫的预测时，我以为他知道是谁干的呢。但当赏金悬出来后，他没去拿，我就明白了他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你刚才所说的一切，而且知道的比这还多得多，只有一个细节不了解，就是沃尔夫是怎么率先作出那个预测的。我很想知道，但既然

沃尔夫也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多大进展，我也就不认为这有多大价值了。同样，如果你告诉了我，我也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例如，今天早晨在巴斯托的血液中查出了蛇毒。”

“谢谢。这就省得我看今晚的报纸了。”

“报纸还不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些其他情况。”

于是他讲述了科贝特的大学之行以及其他一大堆垃圾信息，最终总结起来，就铜头蛇发表了一番见解。我还要去阿蒙克，并想独自思考一下，当把蛇毒这条消息置之一旁时它是否真的没有价值，于是我谢了他，站起身来戴上了帽子，这令他很生气。但我没再纠缠，只是又提醒了他一句保护 E.D. 金布尔，就走了。

鉴于阿蒙克只有几英里远，而且我不知道会在那里待多久，所以我决定先顺便一下巴斯托家。我在大街的一个电话亭打了电话。萨拉·巴斯托在家。二十分钟后我进入了他们家的车道。站在大门口的还是那个看门人，我停车后，他只看了我一眼就点点头让我进去了。

前面的露台上有许多人在喝茶。我到了侧门，斯莫尔把我领到了后面的一间阳光房，只是因为是下午，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斯莫尔告诉我巴斯托小姐很快会过来，问我要不要喝点茶。

我说：“这不是你的意思吧？”

果然如此。“巴斯托小姐吩咐我给你上茶，先生。”

“是的。她会的。那就来一杯牛奶吧。”

没过多久他就端着牛奶回来了，牛奶喝了将近一半时，萨拉·巴斯托进来了。在电话里我告诉了她这只是一次社交访问，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事情。我站起来看着她向我走来，自然、年轻而通情达理，我心想如果她为心灵破碎的人开一个诊所的话，我若不

忙，一定第一个去就诊。我对她说：

“自我上次见你以来，你睡得好多了。”

她微笑了一下：“我能永远地睡好了。请坐。”

我坐下了，拿起了杯子。“谢谢你的牛奶，巴斯托小姐。这牛奶很不错。我很抱歉把你从朋友们身边叫开了，但我不会耽搁太久的。我刚刚到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谈了谈。我告诉了他生日礼物和你夜乘塔里敦渡船的事。不，请稍等，不要这么快就扣扳机。说这些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战略，你知道，将军们是怎么输掉战役的。那些垃圾终于全都倒出去了。你父亲的球包里从来没有过任何假球杆，无论是在你母亲给他时，还是在其他什么时候。没有任何人想杀他，他是因意外而死的。”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我稍等了片刻，让她消化一下我的话。她说：“那么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了——尼禄·沃尔夫错了——但是……”

“我没有说这不是谋杀。沃尔夫并没有错。事情发生在第一球道。你父亲的球童背着他的包跑开了，你父亲借了E.D.金布尔的发球杆。是那根借来的发球杆杀了他。这是个非常令人不快的意外，但就是这样。没有人想杀他。”

她说：“我父亲——我了解我父亲……”

我点了点头。“是的，我知道你非常了解你父亲。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事情，巴斯托小姐。我不喜欢在电话里说，因为我不知道安德森打算什么时候发布这个消息。所以这还是个秘密。我不想让你从安德森那里听到这个我告诉他的消息，那样的话你也许会认为我瞒着你呢。如果安德森不顾事实已经澄清，仍然出于好奇来问你为什么要把高尔夫球包扔到河里，就叫他见鬼去。这也是我来告诉你

这件事的原因。我告诉你金布尔借出了他的发球杆，是因为我知道在本该安睡的时候辗转反侧地想是谁杀了你父亲，那滋味不好受。没有人谋杀他。但最好是暂时保守秘密，仅限于家人知道。”我站起了身，“这就是我要说的。”

她坐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抬起了眼睛。“你要走吗？我想我得在这儿再坐一会儿。谢谢你，古德温先生。你还没喝完牛奶呢。”

我拿起了杯子一饮而尽，然后走了出去。我想，如果她真的开了诊所，即使再忙，我也要去。

我赶到阿蒙克时，已经过了六点了，但太阳仍然高高地挂着，有几架飞机停在机场上，还有一架正在降落。到处都有标示牌：飞行，五美元。还有“翱翔蓝天”等鼓动的话写在篱笆上和木制机库的墙上。就设备而言，这里简直不像个机场，因为实在不够精致，但场地本身很大，而且保养得很好，平得像块薄煎饼一样。我将敞篷车停在了公路旁，走进了一座机库旁的大门。除了一名飞行员和两名乘客正从刚刚降落的那架飞机上下来，机库外再无一人。我一边走一边看着门里，走到第三座机库时才看到有几个人在向墙缝里掷硬币。

他们都挺直了身子看着我，我点了点头。

“你们好。”我笑着说道，“我不想打搅你们的游戏，但我在找一本地图，是一种装订起来的地图册。也许你们的机械术语不这么叫，但我不是飞行员。”

他们中的一个还只是个孩子。另一个年纪稍长，穿着工作服的人摇了摇头。

“我们不卖地图。”

“我不是要买地图。我是找地图，一本红皮的地图册，一个星期前，六月五日，星期一，我弟弟把它落在了这里。你们也许还记得。他知道我今天去伯克希尔要路过这里，就让我来拿一下。那天晚上大约六点钟他开着自己的私人飞机降落在你们的机场，十点钟左右又飞走了。他说他肯定是把地图落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了。”

那位机械师又摇了摇头。“他没有降落在这个机场。”

我感到惊讶。“什么？他当然降落在这里了。他应该知道他降落在哪个机场的。”

“也许他应该降落在这里，但他没有，不是他说降落了就降落了。一个多月来，这里没有其他飞机降落，除了我们自己的之外，还有上星期的一天早晨来了一架双翼飞机。”

“这真奇怪。”我简直不愿相信，“你肯定吗？也许那天你不在。”

“我一直在这里，先生。晚上就睡在这里。如果你问我，我想你弟弟最好是查查他的地图吧。我看他的确是需要地图。”

“看来的确是这样了。这附近还有其他机场吗？”

“都不是很近。丹伯里有一个，在去波基普西的方向也有一个。”

“嗯，看来还得回去问问他了。抱歉打扰了你们的游戏。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

我出了机场，坐进敞篷车中，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位机械师不像一个别人给点钱就能封住口的人。他刚才所说，正是发生过的情况，或者说是没有发生的情况。阿蒙克机场要排除了。波基普西机场也一样。因为尽管曼纽尔驾飞机能在二十分钟内赶到那里，但他还得去他放小汽车的地方，再开着小汽车到与马费伊会面的地方。他几乎可以肯定是在纽约郊区某个地铁站附近见的马费伊，时

间是七点三十分。从波基普西出发他绝对做不到。至于丹伯里，我想还有些可能，于是便驾着敞篷车向北驶去。

我其实根本不想这么做，因为那天是六月十六日，小汤米·威廉姆森在沃尔夫的办公室重回他父母怀抱的周年纪念日，伯克·威廉姆森夫妇和现已四岁的汤米将像往年一样，与沃尔夫共进晚餐以示庆祝。每年他们都想把沃尔夫请到他们家去，但都没成功。他们都是好人，我尤其喜欢汤米，但这种场合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弗里茨对此很重视。他当然知道威廉姆森拥有一系列连锁旅店，我猜他是想让威廉姆森看看，这么多旅店居然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多么可悲呀。正像绍尔·潘策尔所说的："可爱的宝贝，你吃的是什么呀！"其中五分之一的美食都是为我准备的，但那天晚上八点，我没能大嚼本该属于我的那一份，而是非常不快地在丹伯里吃了一盘显然是用不同的油煎的猪肝和咸肉。

在丹伯里也是一无所获。吃了那盘油腻腻的猪肝后，我去了机场。那里的人都一问三不知。我在那里等着，直到天黑之后很久来了一个人，令我彻底失望了。他有一份我认为根本没必要那么详细的记录，因为他连自复活节以来太阳每天都是几点几分落山的都记了下来。当我离开时，我已确定曼纽尔·金布尔从未到过这一带。尽管这是个非常可爱的仲夏之夜，在开车回纽约的路上我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午夜之后我才回到三十五街，威廉姆森一家已经走了，沃尔夫也睡了。

在我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里，有一张沃尔夫用他那优美而纤细的字体写的便条："阿奇，如果你一无所获，早上再试试那个招金属匠的广告吧。如果你的风度和魅力能够再一次引诱菲奥雷小姐，十一点时把她带到这儿来吧。尼·沃。"

不到万不得已，我从不在深夜吃东西，但那天晚上我还是来到厨房，喝了一杯牛奶，并像一个来到埋葬他情人的墓地的男人一样，悲哀地看了看残羹冷炙，然后上楼睡觉了。

我醒得很晚。吃早饭时弗里茨给我讲述了我没吃上的那顿晚餐的情况，但我只是礼貌性地表示了兴趣，并说不必太在意我没赶上。我把报纸翻到了分类广告那页，想看看我昨天投的广告。广告登出来了，我觉得文字还不错。出门前我还去办公室稍稍打扫了一番，因为那并不是个什么特别的早晨。

令我感到曼纽尔·金布尔难以捉摸的诸多小事之一就是招金属匠的广告居然是在商业区办公室投放的。难道他不该去时代广场或一百二十五街的办公室吗——即使一个人是在策划谋杀，也不该无视这种方便呀？不过这当然不是真正的障碍，只不过是你在四处张望寻找机会时会想到的小事之一。无论如何，我对这个广告能带来多大进展不抱什么希望。

这就是我面临的情况：走进《时报》商业区分类广告办公室，试图找到两个月前接受某个广告的姑娘，问她是什么人投放了这个广告并打过电话询问应招情况，这无异于问一名科尼岛[①] 的救生员是否记得七月四日来洗浴的一个光头男人。路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时，我还进去请了普尔莱·斯特宾斯带上警徽和我一起去。但这一趟唯一有所收获的就是他，因为我给他买了一瓶饮料。我翻阅了档案后，的确知道了那则广告是在四月十六日见报的，但由于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收获，我都觉得那

① 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旅游地，位于大西洋沿岸，以其宽阔的人行道和充满乐趣的公园而著称。

瓶饮料钱花得实在不值。

我把普尔莱送回了他那座正义的神庙，就奔沙利文街去了。

里奇太太根本不打算让我进屋。她亲自来到大门口，一看到我就怒目圆睁。我向她咧嘴一笑，对她说我要带安娜·菲奥雷出去一趟，不管她说什么，我都始终表现得像个绅士，直到她猛地把门向外一推，差点儿让我滑倒。于是我也摆出了公事公办的面孔。

"看着我，里奇太太，稍等片刻，既然你还有一口气，最好是听我把话说完。现在，听着！安娜遇到麻烦了，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警察。她告诉了我们一些事情，如果让警察知道了，那她可就大祸临头了。他们还不知道，而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不过他们怀疑了。我的老板想教安娜怎样表现得聪明些。你难道想让她进监狱吗？来吧，别让你那妇人之见耽误事。"

她怒视着我。"你骗人。"

"不，我从不骗人。你去问问安娜吧。叫她出来。"

"你在这儿等着。"

"没问题。"

她关上了门。我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坐下，点起了一根烟。由于是星期天，这条街又变成了疯人院。我的腿被一个飞来的球砸了一下，我的耳膜也开始震荡，除此之外，看看热闹倒也不错。我刚把烟蒂扔掉，就听见背后的门开了，于是我站了起来。

安娜出来时戴着帽子穿着外衣，她身后的里奇太太站在门槛上说道：

"我给马费伊小姐打过电话。她说你说得对，但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如果你们让安娜陷进了麻烦，我丈夫会杀了你的，她爸爸妈妈都死了，不管她脑筋好不好使，她都是个好姑娘。"

“放心吧，里奇太太。”我对安娜笑了笑，“你难道不愿意跟我跑一趟吗？”

她点了点头，我领她坐进了敞篷车。

如果说我会杀什么人的话，我敢肯定那一定会是女人。我见过很多顽固的男人，很多知道些我想知道的事情却又不愿告诉我的男人，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我用尽什么手段他们都不肯开口，但无论他们多么顽固，他们都仍然是人。他们总使我感到只要我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总能叫他们开口说话的。我却见识过女人不仅不会松口，而且还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们不会。她们脸上的表情会让你发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故意摆出这样的表情的。一个男人的表情会告诉你他宁死不会开口，那么你总认为你能撬开他的嘴；而女人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她马上就要说了，可她就是不说。

那天上午我坐着观察了安娜·菲奥雷整整一小时，沃尔夫使尽了浑身解数，她能全身而退，只是因为我想起了不能杀肚子里有金蛋的鹅，哪怕她不肯下。当然，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有金蛋，沃尔夫也不知道，但我们想不出还有哪只鹅可能有蛋了。

安娜和我十一点之前就到了三十五街，等了一会儿沃尔夫才下来。他开头同她谈得还很轻松，好像他只想给她讲讲故事，让她了解些情况，并不想从她嘴里挖出什么似的。他告诉她就是那个给她寄了一百美元的人杀了卡洛·马费伊，这个人既恶毒又阴险，他知道安娜了解一些他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他也许会因此而杀了她；马费伊小姐是个好人，卡洛·马费伊也是个好人，他不该被杀，应该抓住杀他的人予以惩罚。

我看着安娜的脸，觉得我们可能要碰壁了。

沃尔夫又细致地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他用不同的语句

解释了好几遍，只有协定双方都愿意并达成了一致，协定才是有效的。她对于谋杀者没有保持沉默的义务，因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达成协定，他只是给她寄了钱并告诉她要做什么。他甚至还给了她一个选择：如果她愿意，她可以烧掉那钱。她可以现在就烧了它们。沃尔夫打开了抽屉，拿出了五张崭新的二十美元钞票，摊在了她面前。

“你可以现在就烧了它们，菲奥雷小姐。这是渎神行为，我要离开这屋子一下，但阿奇先生将帮助你。烧了它们，你可以拿这些钱代替它们。你明白，我这些钱是给你的。看，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了。你留着那些钱呢吗？”

她点了点头。

“在你的袜子里？”

她将裙子往上拉了拉，弯起了腿，那里有一处隆起。

沃尔夫说：“拿出来吧。”她松开了长筒袜的顶端，把手伸了进去，拿出了那几张二十元的钞票，展了开来。然后她看着我笑了笑。

“看，”沃尔夫说，“这儿有火柴，还有个盘子。我要离开这屋子，阿奇先生将帮助你并给你这些新钱。阿奇先生会很高兴这样做的。”

沃尔夫瞟了我一眼。我说：“来吧，安娜。我知道你心肠好。你知道马费伊先生对你不错，你也应该为他做些好事。咱们一起烧了它，好吗？”

我犯了个错误，把自己的手伸向了那些钱。我刚一伸手，那几张二十元的票子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又回到了她的袜子里。我说：“别害怕，也别犯傻。只要我在这儿，没有人敢碰你的钱的。你可以自己烧了她，不用我帮你。”

她冲着我说道："我不。"

我点了点头。"你以前说过要保留那钱，但你看，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你必须烧了那钱，才能得到新的钱。"

她摇了摇头。你看看她脸上那副表情！她也许没多少头脑，但她怎么也会摆出这么一副表情。她说："我不烧那些钱。永远也不。我知道，阿奇先生，你认为我不太聪明。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所有人都说我不聪明。但我也不傻，我是说我并没有傻到家。这是我的钱，我永远也不会烧了它们。我也不会花它们，直到我结婚。这么想并不很傻。"

"如果那个人像杀了马费伊先生那样杀了你，你就永远也结不了婚了。"

"他不会杀我的。"

我心想，天哪，如果他不杀你，我可真想宰了你。

沃尔夫变了新招，试图哄骗她。他问起了她的父母、她的幼年生活、她在里奇家的职责和习惯、她对这个那个事情的看法等。她似乎松懈了下来，回答得很流畅，但也不慌不忙，特别是当他问及寄宿公寓的事情时。然而他第一次开始向目标靠拢，问起打扫卡洛·马费伊屋子的情况时，她就沉默不语了。他又从别处开始，又绕了个大圈子，但又在同一个地方碰了壁。她干得的确漂亮，如果我有时间，倒真想好好欣赏一番。不管她傻还是不傻，她的警觉都丝毫不输于沃尔夫的聪慧，只要一触及卡洛·马费伊的名字或接近与他有关的事情，她心里就都好像会有什么东西咯噔一下。沃尔夫没有放弃，他使用了一种非常不经意的语调。我了解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毅力，心想如果像这样熬上几个星期，他也许最终能把她拖垮。

然而这时门开了，弗里茨走了进来，又把门在背后关上。当沃尔夫点过头后，他走上前去，将一张名片放在了托盘里。沃尔夫拿起来看了一眼，我看到他的鼻孔张大了。

他说："这真是个意外之喜，阿奇。"然后将名片递过桌子，我伸手接了过来。名片上写着：

曼纽尔·金布尔

第十五章

我站了起来。

沃尔夫坐在那里沉默了片刻，他的嘴唇向外一努，又缩了回去，然后他说："弗里茨，把这位先生领进前屋。大厅里太黑了，我恐怕看不清他的脸。稍等一下，务必把前屋的窗帘拉开，把通向大厅的门打开，放进点空气来。"

弗里茨出去了。沃尔夫又发话了，但声音比平时还要低："谢谢你，菲奥雷小姐。你非常有耐心，也坚守了自己的权利。如果阿奇先生不送你回去，你介意吗？他有事情要做。弗里茨先生也是个优秀的司机。阿奇，你能带菲奥雷小姐去厨房，跟弗里茨交代一下吗？你可以陪她到大门口。"

我点了点头。"我领你去。来吧，安娜。"

她开腔了，声音很大："难道阿奇先生……"

"别说话。我以后再送你回家。来吧。"

我把她领进了厨房，告诉弗里茨有好事等着他。我本来对安娜没有丝毫的歉意，直到我告诉弗里茨送她回家，却看到他一点儿也没脸红，才觉得这太糟糕了。但我把抱歉的感觉推到了以后，当弗里茨解下围裙，穿上外衣，戴上帽子时，我心里在盘算着怎么办。

我说："你看，安娜，咱们做个游戏吧。你刚才说到结婚，我很好奇你想嫁个什么样的男人。现在前屋里坐着一个男人，我敢打赌他就是你想嫁的那种。他帅极了。咱们往外走时，在门口停一下，往里面看一眼，然后我再送你出去，你告诉我他是不是你想嫁的人。好吗？"

安娜说："我知道我想嫁什么人……"

"好的。别说话。我不想让他听见你的声音，这样他就不知道咱们在看他了。弗里茨，准备好了吗？"

我们走了出去。弗里茨遵照指示已经将厅和前屋之间的门打开了。我领着安娜沿着厅的左边走，这样她就不会离门太近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曼纽尔·金布尔坐在前屋的一把扶手椅里，跷着二郎腿。他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了过来，但厅里很黑，他看不太清楚。安娜看着金布尔时，我一边扶着她的胳膊，一边注视着她的脸。我让她看了几秒钟，然后轻轻地扶着她走到了大门口，弗里茨已经在那里为我们拉开门了。我们走了出去，我将门在背后关上。

"他是你喜欢的那种吗？"

"不。阿奇先生，如果我告诉你……"

"改天再说吧。这才是好姑娘。再见了。弗里茨，我不在乎晚一点吃午饭。我想我们都会很晚才能做完事情的，而且今天中午没有客人。"

我迅速地回了屋，从敞开的前屋门前掠过，进了办公室。沃尔夫一直坐着没动。我说："她从来没见过他。如果见过的话，那她的演技就比林恩·方丹[①] 还高了。"他的头向前倾了倾。我问道："要我把他带进来吗？"他的头又向前倾了倾。

我推开相连的一扇门直接走进了前屋。曼纽尔·金布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四下望了望，鞠了个躬。我说："很抱歉让你久等了。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女当事人，以为我们只需吹吹口哨就能把她丈夫找回来，事情没那么容易啊。这边请。"

沃尔夫一定是认为不必太拘礼节，所以没站起来，但他的手仍交叉着放在肚子上。当我领着曼纽尔走向他时，他说道："你好，金布尔先生。请原谅我没有起立。我不是无礼，只是太笨重了。请坐吧。"

我从曼纽尔·金布尔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不安的迹象，但他的精神的确很专注。他的黑眼睛似乎比上次我见到他时小了一些，但带着仿佛有某种东西极其重要而不能漏过的眼神在仔细地踅摸着什么。他瘦削而结实，体态匀称，穿着一身裁剪很得体的便装，打着黄色蝴蝶领结，口袋里装着一副黄手套。他没有和我多说话，径直坐在了尚留有安娜·菲奥雷体温的椅子上，目光移向了沃尔夫并一直停留在他身上。

沃尔夫问道："你要喝些啤酒吗？"

他点了点头："谢谢！"

我接受了沃尔夫的示意，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了几瓶，又从架子上拿了一个杯子，装在了一个托盘里。我的动作非常迅速，因

---

① 林恩·方丹（Lynn Fontanne，1887?—1983），英裔美国女演员。

为我不想错过任何事情。我回到办公室，将托盘放在了沃尔夫的桌上，然后坐到我自己的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抽出了一沓纸准备记录。曼纽尔·金布尔正在说话。

“……告诉我他昨天访问过你的办公室。我父亲和我相互完全信任。他告诉了我你对他说的一切。你为什么要说你做过的事情？”

“嗯。”沃尔夫拉开抽屉拿出了瓶起子，打开瓶盖并将它扔进了抽屉，然后倒了一杯。他观察了一会儿泡沫，才又转向了曼纽尔。“金布尔先生，首先，你说你父亲重复了我对他说过的一切。那不可能。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些话题来谈吧。你的语气是威胁性的。你到底想指责我什么？我对你父亲说的话中有哪些你认为是不该说的？”

曼纽尔微笑了一下，但态度也更加冷酷了。“不要扭曲我的意思，沃尔夫先生。我不是来表达我的喜好的，我是来要求解释一些在我看来很没有必要的话的。作为一个正在衰老的人的儿子，我有这个权利。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受到惊吓，但你吓着他了。你对他说巴斯托之死是借了我父亲高尔夫发球杆的结果。”

“是的，我的确是这样说的。”

“你承认了。我相信你手下做记录的这位也会记下你的供认。你对我父亲所说的是罪恶的胡说八道。我从来不相信关于巴斯托是死于毒针的神话故事，现在也不相信。你有什么权利发明这样的荒谬言论，先是让巴斯托全家，现在又让我父亲痛苦不堪。我也许会提起诉讼的，我将和我的律师去谈谈。但这无疑是不正当行为，必须停止。”

“我不知道。”沃尔夫似乎在思考，而在我看来，曼纽尔已经猜出了我开头的五分钟在做什么，很少有人像他这么聪明。沃尔夫饮下了一杯啤酒，擦了擦嘴唇。“我真的不知道。如果这事可以起诉的

话，我想恐怕只能由被谋杀者以诽谤罪来起诉吧。我想你肯定没考虑过这点。”

“我只考虑过一件事。”曼纽尔的眼睛变得更小了，“就是这种情况必须予以制止。”

“但是，金布尔先生，”沃尔夫抗议道，“请听我说。你指责我发明荒谬言论。我没有发明任何事情。是另外有人作出了发明，而且是最不同凡响，最别出心裁，甚至是最精妙绝伦的发明——我很注意措辞。我所做的只是发现。如果发明者向我说出你刚才说过的话，我要称赞他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不，先生，发明那根高尔夫球杆的不是我。”

“也没有其他人发明。那根球杆在哪里？”

“唉，”沃尔夫摊开了双手，“我也还没见过呢。”

“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它存在过？”

“有它射进巴斯托肚子里的那根针。”

“呸！为什么是从高尔夫球杆中射出的？为什么是在第一球道？”

“黄蜂不可能从别的地方飞来，而且是同步的。”

“这样说是无益的，沃尔夫先生。”曼纽尔故意眯起的黑眼睛射出了轻蔑之光，“这正是像我所说的：罪恶的胡说八道。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我有权利要求你收回你说过的话。就是这样。今天上午我拜访了怀特普莱恩斯的地区检察官安德森先生。他也同意我的观点。我要求你再见我父亲一次，收回你的话并向他道歉。如果你对巴斯托家人说了同样的话，也要这么做。我有理由怀疑你对他们说过。”

沃尔夫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摇向了另一边。过了一会儿后他遗憾

地说道："这太糟糕了，金布尔先生。"

"是的。但是是你说错了话，你现在必须收回。"

"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在跟我打交道，真是太糟糕了。我也许是这个半球上唯一一个你的勇气和智慧无法胜过的人，而你偏偏碰上了我，你的运气实在是糟透了。我很遗憾，但正如你要做适合你才能的事情一样，我也要寻找配得上我的。你得原谅我从侧翼攻击了你，因为你使我无法从正面与你相遇。我想你这番直接进攻只是虚晃一招，我不相信你会指望它能达到什么目的，你不可能对我那么不了解。你真实的目的一定是隐藏的，也许是想发现我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证据和掌握了多少证据。但这你肯定知道呀，不然我怎么会预测出验尸的结果呢？我求你，听我说完。是的，我知道那根高尔夫球杆是什么时候做的、在哪里做的，以及是谁做的，我知道做它的人现在在哪里，我也知道今天早上我在报纸上登出的广告会有什么结果，你也许看到那个广告了。"

曼纽尔脸上的肌肉一动也没有动，他的语气里也听不出任何变化。他的眼睛继续直盯着沃尔夫说道："如果你知道所有那些事情——不过我怀疑你真的知道——你还没跟地区检察官说吗？"

"是的。你希望我都告诉他吗？"

"我？我希望？当然，如果你真知道的话。"

"好的。"沃尔夫向他晃了晃一根手指头，"那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吧，金布尔先生。求你帮个忙。今天下午在你回家的路上顺便去趟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告诉他我都掌握了些什么情况，建议他派人来听听。现在——我很抱歉——已经过了我的午饭时间了。我能恭维你几句吗？如果任何其他人处于你的位置上，我都会努力多留他一会儿，以便学点儿东西。但对于你，我觉得还是吃我的午饭

为好。”

曼纽尔站起了身。“我要告诉你，我从这里出去后就会去找我的律师。你等着收律师函吧。”

沃尔夫点了点头。“无疑这是你最好的举措了。尽管太明显了，但仍然是最好的一招。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父亲会起疑的。”

曼纽尔转身走了。我出于礼貌跟了出去，但还没等我追上他，他就已经走出了前门。

我回到了沃尔夫身边。他向后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我发问时提高了声音，以确保将他唤醒：“那家伙到这儿来，是不是想看看他要不要周末再次动手杀他父亲？”

沃尔夫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摇了摇头。“阿奇，开饭。”

“饭还有十分钟才能做好。弗里茨一点钟才回来。”

“凤尾鱼和芹菜就足以让咱们换换心情了。”

于是我们走进了餐厅。

到了那里，巴斯托—金布尔一案就死了。在我看来，至少在沃尔夫那里是死了。这倒不是他旧病复发了，而是他的脑袋暂时关闭了。当然，他午饭吃得很多，但什么话也没说。饭后，他回到办公室坐下。我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想找些事情做，但没什么事情。我不停地瞟着沃尔夫，心想着他什么时候会开口。尽管他的眼睛闭着，但他一定感觉到我在瞟他，因为突然之间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

“讨厌，阿奇，你弄那些纸时能不能不发出响声来？”

我站了起来。“好，好，我走开。但是见鬼，我去哪儿呢？你倒是发句话呀。”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出去散散步吧。”

“那什么时候回来？”

“爱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这不要紧。要么就晚饭时候回来吧。”

“你在等着曼纽尔干掉他老爹吗？”

“快滚吧，阿奇。”

我觉得他简直是在向伤口上撒盐，因为现在已经三点半了，再过半个钟头他本人也要上楼去花房了。但看见他真的生气了，我到厅里拿了帽子便出去了。

我去了电影院，一边看一边想，但越想越不舒服。曼纽尔·金布尔的来访和挑衅，尤其是挑衅，在我看来几乎是成功的，实在是太气人了。我知道我们还没有资格告诉巴斯托太太寄支票的地址，但我知道我们的钱包已经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发现了一些令我们自鸣得意的事情，但对于这是一场谋杀案，却并没有掌握比开始时更多的证据，更别提我们已经为此花费了多少工夫了。但这还不算完，最糟糕的是我们无路可走。假定凶手就是曼纽尔·金布尔，我们怎样才能把他绳之以法呢？找到那根高尔夫球杆？不大可能。我能想象出那情景，他驾着飞机低低地掠过某条河流或某个水库，将杆柄上绑着重重的铅块的球杆扔进水中。寻找毒药与他的关联？也不大可能。恐怕他已经精心预谋了多年，至少是好几个月。也许他跟着他父亲从阿根廷来时就已经带着那毒药了。总之，他可能在任何时候搞到那毒药——你去查查看吧。想法让他上电视，让里奇太太辨认他的声音？这倒是可行，但有哪位陪审员会仅仅因为这个就给他判刑呢？

我在电影院里足足坐了三个钟头，但屏幕上演的是什么，却一眼也没看进去，我得到的一切就是头疼。

我不知道那个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沃尔夫到底在搞什么鬼。难

道他也像我一样，只是在用头撞墙吗？也许，他不是个太好交际的人。或者，他也许在等待曼纽尔采取下一步行动？但是曼纽尔下一步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杀死他父亲，那会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呢？安德森会冷酷地叫我们罢手，既然沃尔夫和我都对E.D.金布尔无能为力，我们恐怕对那五万美元的赏金也同样无能为力。就E.D.金布尔而言，我想他本来在六月四日就可能被杀的，他也许该庆幸又多活了两个星期。但沃尔夫等待的绝不是这个；从他星期天下午评论曼纽尔的话来看，我相信这不是他的判断。他也就是在那时露了些口风，但也没有多说什么。他是个泰然自若的人。

天在下雨。整个星期天都在下雨。我写了几封信，浏览了两个星期的报纸，又在楼上和霍斯特曼聊了几个小时，看了看花草，但无论做什么我的情绪都很糟。这该死的雨一刻也没有减弱。倒不是它耽误了我什么事，因为如果我在外面奔忙的话，是不在乎大雨倾盆还是烈日炎炎的；但是整天在这又干又黑又寂静的屋子里游来荡去，外面这滴滴答答声就越发令人心烦。谢天谢地，大约五点半时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既令我高兴，又令我不快。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里对着一本杂志打哈欠，电话铃响了。我过了好几秒钟才从扶手椅里伸直身子站了起来，将手伸过了办公桌。当我拿起话筒时，我惊讶地听到了沃尔夫的声音。他是用花房的电话打过来的。当我外出时，他总是在花房里接电话，但如果我在家，他通常都不会接电话，而让我来接。但这次电话里的确响起了他的声音：

“我是沃尔夫。”

另一个声音说道：“沃尔夫先生，我是德金。一切都很顺利。她今天上午去了教堂，刚才又出去了，去糖果店买了个蛋筒冰激凌。

她现在已经回来了，我在等着晚上。”

“谢谢你，弗雷德。你最好在那里待到十点。绍尔将在早上七点赶到那里，你再在下午两点接替他。”

“是，先生。还有别的吩咐吗？”

“没有了。”

我砰的一声将话筒扔在了机座上，心想沃尔夫的耳膜一定会受到震动。

半个小时后他走进办公室时，我没有抬眼看他，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头埋在杂志里，以掩饰心里的七上八下。我一直将这姿势又保持了半个钟头，才想起来应该翻上一页。我不禁怒火中烧。

沃尔夫的声音最终响起了：“天在下雨，阿奇。”

我没有抬眼。“见鬼。我在看书。”

“哦，不。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你肯定没看书。我想问一句，明天早上你去收集一下对我们广告的回复，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好不好？”

我摇了摇头。“不，先生，我可经受不起那份激动。”

沃尔夫的脸颊上堆起了褶子。“阿奇，我开始相信这没完没了的雨对你情绪的破坏比对我还严重。你不是在模仿我吧？”

“不，先生。不是雨，你知道到底是什么。”我把杂志扔在了地上，怒视着他，“如果你能想出的抓住世界上最聪明的凶手的最好办法就是到沙利文街去盯梢，你至少也该告诉我一声呀，那样我在祷告时还能想起德金来。祈祷也许是我最擅长的了。德金到底想干什么，等着安娜拿那根高尔夫球杆去当铺时抓住她吗？”

沃尔夫向我晃了晃一根手指头。“冷静点，阿奇。你嘲笑我做什么？你责备我做什么？我只是一个天才，又不是神。天才能发现隐

藏的秘密并把它们揭示出来，但只有神才能创造新的秘密。我抱歉没有告诉你德金的事情。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事情。昨天下午你去散步时我给他打了电话。他不是去抓菲奥雷小姐的，而是去保护她。她在屋子里也许是安全的，但出了门就不一定了。我不认为曼纽尔·金布尔会再设诡计继续实施他的目标，除非他认为他被叫去解释他第一次企图的危险完全解除。他第一次企图的失败并不是他的过错。计划构想得很完美，实施得也很完美。至于我们，我看只有菲奥雷小姐有危险。用聪明都不足以形容曼纽尔·金布尔；他有他自己的天分。在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星期日，我没法不思索他谋划之精妙。他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破绽，除了菲奥雷小姐，德金的任务就是把她保存下来。"

"'保存'这个词用得好。因为她同时也是封在罐子里的。"

"我想这个罐子可以打开。我们应当试一试。但必须等到我们彻底弄清楚六月五日发生的事。顺便问一句，我们的通讯录上有玛丽亚·马费伊的电话号码吗？好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菲奥雷小姐如此小心地守护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假如证明是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那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次偷袭，转而计划长期作战。任何凶手实施这样复杂的行动都不可能不留下丝毫破绽，他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不及他耐心也不及他有创造性的人看不出破绽来。就曼纽尔·金布尔这个案子而言，这个特点嘛——嗯，尤为突出。如果菲奥雷小姐守护的的确是我们探寻的珠宝，我衷心地希望曼纽尔不要了解这个情况，否则菲奥雷小姐就死定了。"

"有德金保护也会如此吗？"

"我们无法防御闪电，我们只能观察电击。我已向德金解释过这一点。如果曼纽尔·金布尔要杀那姑娘，我们就得抓住他。但我想

他不会的。要记住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给她寄那一百美元的。那时候他不可能想到那姑娘知道任何能把他和巴斯托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否则他不会作出这么不充分的表示的。他只知道她的名字，连她的姓都不知道。也许卡洛·马费伊曾经提到过她，提到过她的个性以及她发现的蛛丝马迹，导致曼纽尔·金布尔在杀了马费伊后，决定冒险寄出一百美元以确保万无一失而不致招来额外的危险。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并且如果菲奥雷小姐知道的并不像金布尔想得那么多，那我们就不得不长期作战了。绍尔·潘策尔就得去趟南美了。我昨天在电话里已经提醒他要做好准备了。你的行动我也考虑过了，也将是辛苦而烦人的。这让人很遗憾，但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正当地起诉曼纽尔。只是因为他的坏运气，还有我第二次把菲奥雷小姐找来，死乞白赖地问她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才使他露出了一点马脚来。"

沃尔夫停顿了。我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四肢。"我所要说的就是，他是个说西班牙语的下贱胚。"

"不，阿奇，曼纽尔·金布尔先生是位说西班牙语的人。"

"在我看来就是个下贱胚。我想喝杯牛奶。要我给你带点啤酒来吗？"

他说不用，我就去了厨房。

我感觉好多了。有时候沃尔夫可怕的自信会令我感到脖子一阵阵地发麻，有时候又会像一群纯洁美丽的少女掠过我的眼前。这回是后者。当我喝足了牛奶，吃够了饼干后，我又出去看了场电影，这回一个镜头也没有错过。等我回家时，雨仍在下。

但星期一的早晨天气很好。我很早就出门了。甚至在纽约，经过清洗的空气在阳光中也是如此清新和甜美，所有汽车废气都被神

奇地化解了，各种各样的香味透过千家万户的门窗，透过成千上万条小巷和电梯门散发出来，让人贪婪地呼吸着。我加大了油门。八点半时我出了布朗克斯公园，拐上了公园大道。

我共收到了二十多份对我们广告的应答并浏览了一遍。有将近一半是假的，有的是想捞一把的骗子，有的是想开开玩笑的可怜鬼。还有一些人说的是真话，但对我们没什么用。很显然六月五日天气很好，是个将飞机降落在草地上的好日子。有三个人说的情况不仅很准确，而且非常符合我们的愿望，似乎他们都看到了同一架飞机降落在霍索恩以东数英里外的某处草地上。情况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并非如此。沿着信里指示的方向，我在距霍索恩一英里的地方离开了公路，拐上了一条上坡的土路，地上是雨水留下的车辙，到处是石头。过了一会儿，路越来越窄，似乎每分钟都可能中断。我在一座房子前停下，问卡特家住在哪里。回答是还在上面，于是我继续前进。

小山顶上的卡特家，房子摇摇欲坠，显然自战争结束以来就没装修过，四周杂草丛生。但立起身来迎接我的狗很友好很欢快，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在阳光下也显得很洁净。我在屋后找到了卡特太太，她正在洗剩下的衣服。她瘦骨嶙峋，但看上去很活泼，一颗牙龇在前面。

“你是 T.A. 卡特太太？”

“是的，先生。”

“我来找你，是因为你答复了我在星期六的报纸上登的广告。关于我驾飞机着陆的事。你的信写得很详尽。你看见我着陆了？”

她点了点头。“我的确看见了。不过我没看见那广告，是明

妮·沃特看见广告的。我以前跟她说起过那架飞机，她想起来了，星期六下午就带着广告来了。幸亏我跟她说起过。我肯定看见你着陆了。”

“不过从这里恐怕你没法看见我吧。”

“没错，不过请看，这座山实际上很高，”她领着我穿过了院子，又钻过了一片小树林，“看这风景怎么样？我丈夫说这风景值一百万美元呢。看那个水库，像不像一个湖？”她指点着，“你就是在那块地上降落的。我当时还纳闷，以为你的飞机坏了呢。我在天上看见过好多飞机，还从来没看见过有一架降落在那儿呢。”

我点了点头。“这样很好。谢谢你，你的信写得很详尽，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要问你了。你看见我在六点十分着陆，看见我从飞机里出来，向南穿过了草地，走向了公路。然后你就进屋做晚饭去了，此后再没看见我。天快黑时我的飞机还在那儿。你在九点半上床睡觉，一早起来看见飞机已经飞走了。”

“对。我想把这些全都写在信里为好，因为……”

“是的。我想你做事一向都很正确，卡特太太。你对我的飞机的描述简直比我自己说得都好。从这么远的距离还能看得这么清楚，你的视力真不错。顺便问一句，你能告诉我下面那座房子住的是什么人吗？就是那座白房子。”

“当然。是韦尔曼小姐。她是纽约的一个画家。那天开车送你去霍索恩的阿尔特·巴雷特就是为她工作的。”

“哦，当然，是的，就是在那儿。我太感谢你了，卡特太太，你将帮我打赢那个赌。我们赌的就是有多少人看见我了。”

我决定给她五美元，从表面判断，她肯定太需要这钱了；而有了她，曼纽尔·金布尔就像被缝得紧紧的一包糠了。我不知道沃尔

夫对曼纽尔的判断有多肯定，但我知道他的确是把对安娜·菲奥雷采取的行动推迟到了查清六月五日的情况之后。我此前一点儿都不敢肯定。我对自己的感觉从不像沃尔夫对他自己的那样有把握，我的感觉经常导致我说出大话，但它们也总是令我不安，除非有很有把握的事实令它们平静下来。于是我觉得对于卡特太太提供的情报只付五美元太便宜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认定曼纽尔·金布尔就是凶手了。获得足够的证据让陪审员相信他是凶手是另一回事，但对我们而言，这已经确定无疑了。卡特太太双手紧紧地攥着那五美元跑向了屋子，一边跑一边说着衣服还没洗完。

我又伫立了一分钟，眺望着山下的草地。曼纽尔·金布尔将飞机降落在了那里，然后离开飞机，穿过草地走进了那座白房子，请求那里的人开车将他送到霍索恩。在离他家只有几英里的霍索恩，他也许早就将自家的车停在了那里，也许从租车公司租了一辆车。他开车前往纽约，也许是在路过怀特普莱恩斯时给卡洛·马费伊打电话安排了会面。他已经起了杀心，做好了准备，因为马费伊已经放弃了回欧洲的计划。晚上七点半他们见面后，马费伊向他出示了早上从《纽约时报》上剪下的那条消息，开始讲述要想让他对高尔夫球杆守口如瓶会有多么难，这让曼纽尔最终下了决心。他让马费伊上了车，把他拉到一个僻静之处，找机会把刀子从他的后心处扎进了五英寸。他让刀子一直留在那里以便止住血，然后将车开到了乡下，直到找到一处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再将马费伊的尸体拖出小汽车，扔进灌木丛中，之后他回到小汽车上，驱车来到霍索恩，又从那里乘出租车回到现在我脚下山谷中的白房子。如果他起飞时需要别人帮忙，阿尔特·巴雷特和出租车司机都是现成的人手。十点钟左右他在自家的机场着陆，对斯金纳说夜晚飞行果真比白天要有

趣多了。

这些不会有错，只是有一件事还有些蹊跷：卡洛·马费伊单是看了一条巴斯托的死讯就把事情全弄明白了，似乎有些高估他了。我想，一定是先前还发生了些什么事让他起了疑，也许只是花大价钱让他制作这个奇特的机关就足以让他产生怀疑了。

我决定不打搅阿尔特·巴雷特了。既然是他开车把曼纽尔送到了霍索恩，我就不能再像对卡特太太那样对他佯装飞行员了，而且恐怕他也说不出更多值得我专门去跑一趟的情况来。目前我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日后如果我还需要他，再去也不迟。另两个对广告的回应也可以再等等。一想到沃尔夫答应过，只要我能把曼纽尔·金布尔从六月五日的云层里拽下来，就对安娜·菲奥雷使用罐头起子，我就急切地想回到三十五街。

我在晾衣绳边向卡特太太道了别，在窄路两旁的大石头间一英寸一英寸地前后挪动着让敞篷车掉了头，然后飞也似的开下山，冲上了公路。

我不知不觉地唱起了歌，当我醒悟过来时，不禁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我所发现的一切只能证明我们到了轮子的条辐上，而不只是在轮子边缘了，但我们仍须向轮轴前进，我们离那里仍然像以前一样远。但是车子飞驰在公园大道上时，我仍然不停地在歌唱，并且到了福德姆路时，我还忍不住给沃尔夫打了个电话报告了我的发现。他已经从花房里下来了，当我停在三十六街等红灯时，蒂凡尼珠宝店响起了正午的钟声。

我将敞篷车停在门前。沃尔夫在办公室里，坐在他的桌旁。弗里茨正用一个托盘装着一个杯子和两瓶啤酒往里走。

沃尔夫说道："早安，我的朋友古德温。"

“什么？”我瞪起了眼，“哦，我明白了。”我还戴着帽子呢。我走进厅里将帽子甩在挂钩上就回来了。我坐下后咧嘴一笑。“现在就是埃米莉·波斯特[1]来了，也挑不出我的毛病了。我说什么来着？曼纽尔·金布尔就是个说西班牙语的下贱胚。当然，是你的广告证实了这点。”

沃尔夫看上去心不在焉，似乎对我的话没有兴趣，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说：“你发现那片草地了？”

“我发现了一切。一个女人看见他着陆了，还能肯定地说出他的飞机哪部分是红色的哪部分是蓝色的，还有一个男人开车送他去了霍索恩——我们期望的都得到了证实。”

“好的。”但他没有抬眼看我。

“好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再次激怒我吗？到底……”

他的手掌从椅子扶手上抬起来制止了我。“冷静，阿奇。你的发现值得庆贺，但你必须容许我稍后再庆贺。你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恰好不幸打断了我正要打的一个有趣的电话。你进来时我正要找电话簿，也许你能省了我这道麻烦。你记得巴斯托家的电话吗？”

“当然。出什么事了吗，啊？你要给他们打电话吗？”

“是的，请拨通，然后在旁边听着。打给萨拉·巴斯托小姐。”

我走到我的桌前，瞟了一眼电话簿，确认一下号码，然后拨了出去。没过一会儿，我的耳边便响起了斯莫尔的声音。我说我要找巴斯托小姐，稍等了片刻她就来了，我向沃尔夫点了点头。他拿起了他桌上的话筒，我也把自己的听筒举在耳旁。

他说道：“巴斯托小姐吗？我是尼禄·沃尔夫。早安。我冒昧地

[1] 埃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1872—1960），美国礼仪专家。

打电话，是想问你那些兰花完好地送到你那里了吗……不，是兰花。请你再说一遍……哦，这显然是个错误。你今天早上难道没有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让我荣幸地为你送去一些兰花吗……你没有送便条吗……不，不，这没关系，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很抱歉……再见。”

我们都挂上了电话。沃尔夫向后靠在了椅子上，我则咧嘴一笑。

“你老了，先生。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不会给女孩子送兰花的，除非她们主动提出来。”

沃尔夫的脸颊纹丝不动。我眼看着他的嘴唇向外一努又缩了回去。他的手伸向抽屉，准备去拿瓶起子，但他还没碰到抽屉就把手又缩了回来。

他说：“阿奇，你听我说过我是个演员，但背台词是我的一个弱项。如果好机会出现时不让自己享受一下就是傻瓜。这屋子里有死亡的气息。”

我想我一定是不由自主地四下望了望，因为他又说道：“不是尸体，我的意思是，不是已经发生的死亡，而是有死亡在等待。也许只是在等我，也许在等我们所有人，我不知道。你看看这个。今天上午当我在楼上侍弄花草时，弗里茨拿着这张条子上楼来了——就是这张。”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小片纸递给了我。我读道：

亲爱的沃尔夫先生：

上星期在您家，古德温先生非常友好地送了我两枝兰花，简直漂亮极了。我大胆而冒昧地请求您，能否再送我六枝或八枝那样的兰花？它们实在是太可爱了。请把兰花交给送信的人

带回来。如果您慷慨相赠，我将不胜感激！

萨拉·巴斯托

我说：“这不像是她写的。”

“恐怕不是。你比我更了解她。我当然记得她和你一起下楼时手里拿的是布劳绍卡特莱丽亚兰花。我和西奥多一起剪了一打装在盒子里，弗里茨拿着下了楼。十一点钟我一下楼坐在办公桌前，就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陌生的气味。我对陌生的事物太敏感了，这就是我要在我的神经上面覆盖这么多层肉的原因。我当然知道有陌生人来访过，但我仍然感到不舒服。我把弗里茨叫了过来。他说那个带便条来并等着拿走兰花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个硬纸板盒，是一个带柄的长方形的盒子。他离开时拿着盒子走了，弗里茨亲眼看见他离开屋子时手里提着盒子。但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人待在前屋里的。前屋和办公室之间的门没有上锁，而大厅通向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

沃尔夫叹了口气。“唉，巴斯托小姐又说没写那张条子。”

我站起身来走向他，说道：“你赶紧离开这里。”他摇了摇头。“来吧，”我喊了起来，“我能跳开而你不能。该死的，过来，快点！我习惯于处理炸弹了。弗里茨！弗里茨！”弗里茨闻声跑了进来。“把水池子加满水，一直到顶。沃尔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快从这儿出去，它随时可能爆炸。我来找它。”

我听见弗里茨跑回了厨房开始加水。沃尔夫却一动不动，而上帝知道我根本挪不动他。他摇了摇头，向我晃了晃一根手指。

“阿奇，求求你，赶紧住手！别碰任何东西。这儿根本没有炸弹。炸弹会滴答响或咝咝地响，我的耳朵很好，如果有我会听到的。

而且，金布尔先生自来访之后根本没时间造出一枚好炸弹来，他也不会用别人的炸弹。这不是炸弹。我求求你，不要惊慌。这很刺激，但不要颤抖。我想了半天，也感觉了半天。请想一想：当金布尔先生在这间屋子里时，他看见我没作任何移动，只有一个动作称得上是动，那就是我拉开抽屉把手伸了进去。如果这没让你想到什么的话，我相信一定让他想到了。我们来看看。”

我跳向了他，因为我以为他就要打开抽屉了，但他挥了挥手让我后退，他只是准备离开他的座位。他说：“把我的红棘手杖拿来。见鬼，没听见我说什么吗？”

我跑进厅里，从架子上拿了手杖又跑了回来。沃尔夫正沿着桌子移动。他慢慢地挪到了桌子另一侧几乎正对着他的椅子的地方，把手伸向了还盛着杯子和啤酒瓶的托盘，将托盘朝自己的方向拉了过来。

他吩咐道：“现在，这么办。不，先把通向大厅的门关上。”我去关了门，又回到原位，“谢谢你。抓住手杖的另一头。把手杖伸过桌子，抵住抽屉前部下方的把手。往里一推，抽屉就会打开。等一下。打开它时要尽可能慢，要准备立刻把手杖收回来，因为很可能马上就有别的用途。现在开始。”

我开始了。手杖触到了正好在抽屉下沿的把手弯曲的尖部，但因为有角度，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不让抽屉打开。我想轻轻地推以便抽屉慢慢打开，但没推动，我只好加了点劲。突然，抽屉砰的一声蹦出了将近半英尺，我手里的手杖差点脱落。我举起手杖猛然一挥，同时喊道：

“小心！”

沃尔夫手里抓着一个啤酒瓶，他将其中的一个掷在了桌子上，

但没有击中从抽屉里蹿出的东西。那东西出来得极快，头已几乎蹿到了桌子边上我们站着的地方，尾巴却还在抽屉里。我一挥手杖，重重地砸到了它的头，但它仍然四处甩动着，使我无法击中它。桌子上满是啤酒沫和瓶子碎片。我准备往后跳，想伸手抓住沃尔夫，把他也往后拽一拽。这时沃尔夫掷出了第二个瓶子，正好砸在了那丑陋的脑袋上，它像一堆内脏一样瘫倒在桌子上。它长长的褐色的身子还在满桌子扭动，但它肯定已经完蛋了。

第二个瓶子也碎了，我们被溅得满身啤酒。沃尔夫后退了一步，掏出手帕开始擦脸。我仍然紧紧地抓着手杖。

"我的天哪！"

是弗里茨闻声跑了进来，不禁用法语失声叫道。

沃尔夫点了点头。"是的，弗里茨，我很抱歉，给你弄了个一团糟。收拾收拾吧。"

第十六章

我试着用法语说了一句："矛头蛇？"

沃尔夫点了点头。"说得好多了，但还是有太多的'n'而鼻音不够。你没有语言学家的天分，阿奇，你的缺点恐怕就是不够呆板。要想发好法语的音，你必须从骨子里憎恶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最正宗的偏见，更不用说蔑视了。但可以说，你缺乏那种蔑视，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是的，这是——矛头蛇。除了巨蝮之外，这是所有响尾蛇中最致命的一种。"

弗里茨在我的帮助下，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了，然后在餐厅里摆好了午饭，我们一起吃了起来。当那条毒蛇停止蠕动后，我把它在厨房里伸展开，用尺子量了一下——足有两米六长。它的中部几乎和我的手腕一样粗。它的褐色中泛着黄色，身上很脏，即使死了看上去仍然很可怕。我量过它后，站起身来，用尺子戳了戳它，心想着该怎么处理。我对站在不远处的沃尔夫说："总不能就把它扔

进车库的水桶里吧。要不要把它扔进河里去？”

沃尔夫的脸颊上堆起了褶子。“不，阿奇，那太可惜了。到地下室找个硬纸盒和一些碎木屑来，把它好好包装一下，寄给曼纽尔·金布尔先生。弗里茨可以送它去邮局。这样就省得金布尔先生惦记了。”

我们这样做了，这并没有影响我午饭的胃口。饭后我们回到了办公室，等着玛丽亚·马费伊。是沃尔夫接到我从福德姆路打来的电话后，叫她来的。

我说：“这条蛇是从南美来的。”

沃尔夫靠在他的椅子里，半闭着眼睛。他丝毫没有因为需要他亲自动手才把蛇打死而不快，不过他对损失了那些啤酒表示了遗憾。他咕哝道：“是的，那是条响尾蛇。是为数不多的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的毒蛇之一。只是在上星期，我才从一本你拿来的书里看到了它的照片。它在南美很常见。”

“他们在巴斯托的体内也发现了蛇毒。”

“是的。在血液分析发生困难时就已经可以推测这种可能性了。那根针一定是在蛇毒里浸了很久。阿奇，如果我们从安娜·菲奥雷那里得不到什么，我们就要陷入长期作战了，那么这些思路就会变得重要起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思路开阔，就能发现很多事情。金布尔的院子里是不是有一口井，曼纽尔可以抓老鼠来喂他的矛头蛇？他是否通过逗蛇咬香蕉而自己提取蛇毒？不大可能。那他是不是有个阿根廷朋友给他送来了蛇毒？更有可能是这样。那个小伙子——弗里茨说又黑又帅——不是为巴斯托小姐带便条的，却能熟练地操纵毒蛇，倒是令人钦佩，会不会在某个阴沉的日子里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百一十六街某个电影院里的领座员呢？或者是某条

南美轮船上的水手，恰好在昨天到达了纽约港？这些都是让人困惑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必须长期作战，那么每个问题都会有其答案的。曼纽尔·金布尔很可能是不久前才安排将这条矛头蛇运到美国来，作为他的第二根弓弦的；他一定是想，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人的发明设计没能成功，那么就应该给大自然的创造物一个机会。结果，蛇运到后，出现了更紧急的需求，于是复仇便让位于安全了。现在，至少是此刻，他的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也许。但他与第一个目标只是失之交臂，而第二个目标他随时可能实现。”

沃尔夫向我晃了晃一根手指头。“错了，阿奇，大错特错。复仇之事他会继续等待。曼纽尔·金布尔先生不是个冲动的人。如果环境令他突然绝望，他会孤注一掷的，但即使那样他也不会冲动。不过马费伊小姐将在半小时后来这里，在她到达之前你应该了解一下我的安排。拿出你的笔记本来。”

我坐到了自己的桌旁，他一口气不停地口授了二十分钟。听了头两分钟后我的脸上便泛起了笑容，并一直保持到结束。这个计划非常精彩，完美无缺，他考虑到了所有细节。他甚至为玛丽亚·马费伊拒绝我们的提议或者无力说服安娜留出了余地，那样的话行动大致依旧，只是角色要作个更换，我将负责请安娜出来。他给伯克·威廉姆森打了电话，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实施地，绍尔·潘策尔将在六点给办公室打电话要小轿车，并接受他的进一步指示。他口授完后，一切都非常清楚，我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把记录重新看了一遍，问了仅有的几个问题。他肚子里灌满了啤酒，靠在椅子背上，假装对自己不满。

我说：“很好，我承认，你是个天才。如果她那里真的有料，这

计划行得通。”

他点了点头，但无精打采。

玛丽亚·马费伊准时到达。我正翘首期盼她，于是赶在弗里茨从厨房出来之前去开了门。她穿着一身黑衣，如果我在街上遇见她，我都怀疑还能否认出她，她看上去衰老憔悴了许多。我已对沃尔夫的计划烂熟于心，所以早就为她准备了一副笑脸，但我及时地收住了笑容。她没有回以任何笑容。我一看见她，就再不想笑了。亲眼目睹兄弟之死给一个女人带来的变化令我冷静了下来。她老了足有十岁，眼里的生气也消逝了。

我把她领进办公室，在沃尔夫对面为她搬了把椅子，然后坐到了我的办公桌旁。

她和沃尔夫互致问候，然后说道："我猜你找我是想要钱吧。"

"什么钱？"沃尔夫问道。

"找到我哥哥卡洛的钱。不是你找到他的，也不是警察，是两个男孩发现他的。我不会付你任何钱。"

"你可以不给。"沃尔夫叹了口气，"我根本没想那钱的事，马费伊小姐。我很抱歉让你那么想。这让我想到一些贪婪的考虑。但是现在让我们忘掉它吧。你不欠我任何东西。忘掉它吧。不过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很抱歉这是个令人痛苦却十分必要的问题——你看见你哥哥的遗体了吗？"

她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但我发现自己错了：她眼中的生气并没有消逝，只是深陷了进去，仿佛埋伏起来等待着回归一样。她平静地说道："我看见了。"

"你也许看到了他背上的洞，那个杀他的人用刀扎出的洞。"

"我看见了。"

“好的。如果我有机会找到那个用刀杀他的人，并把他绳之以法，但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帮助我吗？”

那呆滞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芒，但随即又消逝了。玛丽亚·马费伊说道：“我会为这个付你钱的，沃尔夫先生。”

“我不相信你会。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忘掉钱的事吧。我需要的是另一种帮助。你很聪明，总能作出合理的假设，如果你觉得这些合理的假设得来很容易，你就会非常不快，所以我还是给你解释解释吧。杀死你哥哥的人还犯有另一桩命案，因此我在查找他，另外还有人在查找他。这桩命案更加轰动，在可悲可叹方面也毫不逊色。我知道这个人是谁，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知道？告诉我！”玛丽亚·马费伊从椅子里猛然向前一蹿，这回她眼里闪出的光保留了下来。

沃尔夫向她晃了晃一根手指头。“冷静点，马费伊小姐。我担心你是要自己去报仇。请记住，像我们这样文明而谨慎的人，只会在复杂的法律下处置我们的凶手，而这些法律必须能使我们避免承担个人责任。请听我继续说。你能够帮我的忙。你必须相信我。你的朋友范妮的丈夫德金先生会告诉你我是可以信赖的，而且他也将帮助我们。我要说一说安娜·菲奥雷小姐了，就是在你哥哥住过的寄宿公寓里干活的那个姑娘。你认识她吗？”

“我当然认识她。”

“她喜欢你并信任你吗？”

“我不知道。她是个深藏不露的姑娘。”

“这是种谨慎的表达方式。谢谢你。今天晚上你能不能坐上我的车，有司机为你开车，去说服菲奥雷小姐和你一起坐车出趟远门？给她找个好点儿的理由，以便她心甘情愿地出来。”

玛丽亚·马费伊打量着他，过了一会儿后，她点了点头。“她会去的。不过我可没做过这事，我得好好想想理由……”

“你有足够的时间想。我宁愿你依靠自己的智慧来想个理由。如果这是你自己的事，你会好好动脑筋的。但这是唯一需要你费心的事。我手下的一个人将为你们开车。剩下的事情，你必须仔细而精确地听从我的指示。或者不如说是听从古德温先生的指示。阿奇，如果你愿意的话。”沃尔夫用手撑住桌子边缘一推，使椅子向后退了退，站起身来，“请原谅我要离开了，马费伊小姐，现在我该去侍弄我的花了。也许等你和古德温先生谈完后，你愿意他领你上楼来看看它们。”

说罢他就走了。

那天我没有带玛丽亚·马费伊上楼去看兰花。我和她谈完后已经将近五点了，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她丝毫没有犹豫，但仍然需要跟她解释很多，我们还演练了三遍细节，以确保她不致因为激动而把事情搞砸。我们都认为她最好还是先去找安娜，把事情安排好，于是我送她出门，打了辆出租车，看着她奔向了沙利文街。

然后我开始忙自己的事。我要准备好刀子、面具和枪，到租车公司租小汽车，因为安娜有可能认出我们的敞篷车，我还要把比尔·戈尔和奥里耶·卡瑟招来。是我推荐的他们，沃尔夫同意了。他还告诉了德金七点钟来报到。

一切准备就绪时，也没剩下多少时间了。六点半时，沃尔夫和绍尔·潘策尔在办公室，我在厨房里胡乱吃了点晚饭。绍尔出来时到厨房里瞄了一眼，向我扮了个鬼脸，好像他那张丑脸还不够夸张似的。他对我说：“慢慢吃，阿奇，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晚餐了，今晚你要对付的可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嘴里塞满了吃的，只能说了句："喂鱼去吧，小虾米。"

比尔·戈尔和德金准时赶到了，奥里耶·卡瑟虽然晚了一点儿，但也不碍事。我向他们布置了任务，还让奥里耶演练了几遍，因为事成与否，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他。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一起行动了，但他还像以前一样撅着他那薄薄的嘴唇，四处找地方要吐出嘴里嚼的烟末。

快到八点时，我们出发了，沃尔夫还在吃晚饭。租车公司给了我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有四个轮子和一个发动机，却不是敞篷车。奥里耶和我坐在前排，比尔·戈尔和德金坐在后座。我心想可惜这只是一次做戏，不然跟这三个亡命之徒在一起，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装满私酒的卡车，我都敢拦。奥里耶还说我应该在车前栅上挂一个牌子："拦路抢劫专车"。我笑了，但只是咧了咧嘴。我知道一点儿差错都不能出，而这就要看我的了。沃尔夫对安娜·菲奥雷的评价是正确的：她的智力范围非常有限，但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她却能看到智力范围广泛的人会完全错失的东西。

我把车开向西边，走上了苏米尔河路。威廉姆森家住在塔里敦以东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只有一条二级公路通往那里。我对那条路就像对三十五街一样熟悉，因为我四年前经常去。我本想在九点半之前赶到，但去往扬克斯的交通非常拥堵，耽误了一会儿。九点三十几分后，我才等到绿灯亮了，拐上了当年我发现昏迷中的威廉姆森太太的小马路，当时我把她载到了池塘边，向她脸上泼了水。

我将车向坡上开了五百多米，来到威廉姆森家门前，让他们三人在车里等着，我去按了门铃。管家坦泽还记得我，我们握了手。我对他说我不进去了，只想同他的老板说句话。伯克·威廉姆森马上出来了，我们也握了手，他说他非常遗憾上星期五晚上没见到我。

我说我也很遗憾。

“我到得晚了点儿，威廉姆森先生。我来是想确认一下是否一切都已就绪。不会有闲散的仆人出去逮萤火虫吧？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大笑道，“没有人会干扰你们的邪恶计划。当然，我们都好奇得心里发痒。我猜也不许我们躲在树丛后偷看吧？”

我摇了摇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最好是待在家里。完事之后我也不来这里了，我得赶紧逃跑。我想，沃尔夫明天早上会打电话谢你的。”

“他不用麻烦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报答不了他的恩情。”

我回到车里，掉头向坡下开去。我已经选好了地点，大约在小马路的一半处，距主路三百码，两旁灌木丛生，树木也很茂盛，光线还很暗。那里的小马路窄得我都不用把车横过来，就能将路堵住。

轿车就位后，我关掉了灯，我们都下了车。已是将近十点了，我们的猎物应在一刻钟后到达。我把枪分给大家，又给了奥里耶一把刀，然后分发了面具，我们一起戴上。我们真像一群凶狠的歹徒，我一想起奥里耶刚才的俏皮话就忍不住要笑，尽管说实话我非常激动和紧张。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我又向他们交代了一遍任务。他们全都烂熟于心了，于是我们分散在灌木丛中。天真黑，他们互相呼唤起来，我立刻叫他们闭嘴，以便我能听清路上的动静。

几分钟后，坡下传来了沃尔夫的轿车挂着二挡上坡的声音。因为灌木浓密，过了一会儿我才看见灯光。它们越来越亮，接着我看见了车。它嗡嗡叫着，越来越近，司机看见我的轿车停在路中央后，开始减速。我一跃而起，冲出灌木丛，在沃尔夫的轿车将停非停时

跳上了脚踏板，把枪伸进车里，顶住了司机座位上绍尔·潘策尔的脸。

他们三人也冲了出来。比尔·戈尔在我这一侧，也跳上了脚踏板，把枪从打开着的窗户伸了进去。奥里耶和德金一前一后扑向了车子的另一侧，将后座的车门打开。玛丽亚·马费伊尖叫起来，却没有听到安娜的声音。

奥里耶喝道："快出来。快点儿，你想让我给你穿个洞吗？"

安娜出来了，站在脚踏板旁的地上。比尔·戈尔探身进车，抓住玛丽亚·马费伊将她拽了出来。奥里耶咆哮道："别耍花招，你！"他又对我喊道，"那个司机要是再嘟囔，就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把灯关了。"

比尔·戈尔说："我搜到她的钱包了，挺鼓的。"

"是谁的？"

"这个人的。"

"好，收着吧，小心她耍花招。她要是敢喊就敲她。"奥里耶又转向德金，"这个，抓着点儿她，我拿手电照照她。"

德金移到了安娜的身后，抓住了她的胳膊，奥里耶将手电照在了她的脸上。她看上去脸色煞白，嘴唇紧紧地闭着，但她一声没叫。奥里耶举着手电正对着她，他戴着面具的脸在手电的后面。他说道："果然是你。谢天谢地，我终于抓住你了。那么你是要把卡洛·马费伊剪报纸的事和他在电话里说的话，还有你本该忘掉的一切，都告诉别人了，是不是？你死了这份心吧。收拾卡洛·马费伊的刀子正好收拾你。替我向他问好吧。"

说罢他拔出长长的尖刀挥了挥，刀子在手电照耀下闪闪发光。他演得实在太好了。玛丽亚·马费伊叫喊着扑向他，几乎挣脱了比

尔·戈尔。体重九十多公斤却毫不显胖的比尔紧紧地抱住了她。德金把安娜从刀尖下往后一拽。“住手！别这样！你说过你不杀她的。别这样！”奥里耶不再挥舞刀子了，又把手电筒照在安娜脸上。

“好吧。”他的声音真像个嗜血的恶魔，“你的钱包呢？我回头再收拾你。快点儿，别光站着摇头。你的钱包呢？我寄给你的一百美元在哪里？没有？抓紧了她，我来搜搜她。”

他开始搜她的长筒袜，但安娜是个凶悍的丫头。她猛然挣脱了德金，发出了一声都能传到怀特普莱恩斯去的尖叫。奥里耶抓了她一把，但只扯掉了她半截袖子。德金再次抓住了她，当她明白了自己逃脱不了时，便开始又踢又咬。我很庆幸没让我来干这活儿。德金一只胳臂抱住了她后又抓住了她的手臂，另一只手将她的头向后一扳，终于使她老实了一点儿，但奥里耶始终无法将手伸进她的长筒袜里，他只好将它撕开了。我想要么我们逃跑时必须更快，要么我们就得把她捆起来，于是我让绍尔将他的车倒退到小马路边以便让我的车通过。德金将仍在不停地踢咬的安娜·菲奥雷扛了过来，把她塞进了后座里；奥里耶一边帮着德金，一边冲安娜吼道：“你留着我的钱呢，是不是？你不愿意烧了它，啊？下次你得把嘴闭严实点儿。”

我跑向了别克车，发动了引擎，将车身正了过来。他们三人迅速钻了进来。当我们离开时，玛丽亚·马费伊冲我们大叫着，却听不到安娜的声音。我以最快的速度转过弯弯曲曲的小马路，一驶上大路就加大了油门。

比尔·戈尔在后座笑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走上了苏米尔河路，继而向南拐，然后将速度降到了四十迈。坐在我旁边的奥里耶一言不发。我问他：

“你拿到那钱了？”

“拿到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欢快，“但我想我得留着那钱，看看沃尔夫会不会用保险赔偿我。”

“怎么，她伤着你了？”

“她咬了我两口。那丫头对那一百美元，简直就像我对自己的右眼一样。如果你早点儿告诉我我得空手降伏一只母老虎，那我就会想起我还有个约会的。”

比尔·戈尔又大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非常成功。沃尔夫不能指望有更好的结果了。唯一令我担心的事情是安娜受到这样的惊吓，也许会永久地崩溃了，但目前看来不大可能。我很高兴沃尔夫想起了利用玛丽亚·马费伊，而她也为这件事作了准备，这样我就不用为开车送袜子空了的安娜·菲奥雷回城而操心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她到底知道些什么，我们多久能够问出来？沃尔夫的计划能否始终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进行？而如果能的话，她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令人兴奋的事情呢？

不管怎样，我下一步的行动是毫不延误地回到办公室，所以我无暇把车上的乘客们送到家了。我让比尔·戈尔在第十九街下了车，又把德金和奥里耶放在了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因为不能把别克车停在家门前，我还去租车公司还了车，然后步行回家。

我并不在乎曼纽尔·金布尔在收到原本是他为沃尔夫准备的那份礼物后会有什么反应，但在出门时还是叮嘱弗里茨把门锁上，于是现在我不得不按门铃让他来开门了。这时已近午夜，但门铃刚响了一声他就来了。

沃尔夫在办公室，一边吃着饼干，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我进去后立定，等着他抬头。他过了好久才抬起头来，说：“还算准时。”

我点了点头。“我倒没什么，奥里耶·卡瑟可吃了苦头。她咬了他，也咬了德金。她可真是个母老虎。不过戏演得非常成功。他们应该很快就要到这里了。我要上楼去为下一幕换身衣服。我可以先去喝杯牛奶吗？”

沃尔夫说了声“好的”，就又埋头看他那笔记本了。

我拿着牛奶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边脱下外衣换睡衣，一边小口啜饮着。“戏”的这一部分在我看来太过注重细节了，但我并不介意，因为这给了我一个试试新睡袍的机会。这件睡袍是沃尔夫好几年前送给我的，但我一次还没穿过。我点着了一支烟，喝完了牛奶，然后穿上睡袍在镜子前匆匆照了一下。正在这时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并停在了门外，我靠近开着的窗户，听见了绍尔·潘策尔的声音，接着是玛丽亚·马费伊的声音。我坐下了，点燃了一支烟。

我这样坐了将近半个钟头。我听见了弗里茨为他们开门，听见了他们在走向办公室时在厅里发出的声音，接下去就是一片寂静。我等得不耐烦了，开始思忖莫非什么地方出了岔子，抑或沃尔夫根本不用我就已经完成了他的把戏。随即我听见厅里响起了脚步声，片刻之后移到了楼梯上。弗里茨出现在我的门前，说沃尔夫要我到办公室去。我磨蹭了一会儿，仿佛我刚才一直在睡觉，这会儿才刚刚起来穿上了睡袍。我胡捋了一把头发，就下楼了。

沃尔夫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玛丽亚·马费伊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安娜则靠墙坐着。安娜的样子很引人注目，半截袖子没了，一条腿光着，脸是脏的，头发也乱成了一团。

我瞪大了眼睛。“马费伊小姐！安娜！有人放狗咬你们了吗？”

沃尔夫向我晃了晃一根手指头。“阿奇，我很抱歉打扰了你。马费伊小姐和菲奥雷小姐被人抢劫了。她们遇到歹徒时，正坐车到乡下去看马费伊小姐的妹妹。她们的车被拦住了，她们受到了无礼对待。马费伊小姐的钱包被抢走了，还有她的戒指。菲奥雷曾给我们看过的她好不容易挣来的钱，也被抢走了。”

“不！”我说道，“安娜！他们不能拿走那钱！”

安娜的眼睛盯着我。我也直视着她，但一秒钟后我觉得还是将眼光转回到沃尔夫身上为好。

安娜说：“他拿走了那钱。”

沃尔夫点了点头。“菲奥雷小姐的印象是拿走她钱的正是寄给她钱的那个人。我建议她和马费伊小姐赶紧去报警，但她们不肯。马费伊小姐根本不信任警察。菲奥雷小姐似乎认为我们，尤其是你，可能会更有帮助。当然你现在这身穿戴不适合出去追寻歹徒，而且事发现场在三十英里外，但菲奥雷小姐求助于你。你有什么办法吗？”

“嗯，”我说，“这真可怕。这真糟糕。我在楼上睡得正香呢。我真希望你当初让我开车送你们去乡下，安娜，那样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我不在乎是谁抢走了你的钱。我不相信是那个寄钱给你的人。那个人杀人，他会杀了你的。”

安娜的眼睛在沃尔夫和我之间来回转着，但我已不认为其中有怀疑的成分了。她只是被这个她无法想象的损失惊呆了，击溃了。她说：“他想杀我。我咬了他。”

“你真棒，安娜。你看，这就是你以好心对待坏人的结果。如果那天你听我的话，烧了那钱，你现在就可以得到沃尔夫先生的钱了。

现在你没法烧那钱了，因为你已经没有了，你唯一能找回那钱的办法就是等我抓住他。要记住，他是杀死卡洛·马费伊的那个人。看看他是怎么对待你的。他撕了你的衣服，拽掉了你的袜子——他伤着你了吗？”

安娜摇了摇头。“他没有伤着我。你能抓住他吗？”

“我可以试试。如果我知道到哪里去找，我就能。”

“你会把那钱还我吗？”

“你的钱？我当然会。”

安娜看着自己光光的腿，她的手慢慢地滑向了她裙子的下缘，停在了她曾经放那些二十元钞票的地方。玛丽亚·马费伊开腔了，但沃尔夫向她晃了晃手指，叫她安静。安娜说话时眼睛仍然盯着自己的腿：“我得脱掉衣服。”

我还没反应过来，沃尔夫却立刻明白了。他说：“啊，当然可以，阿奇，打开前屋的灯。马费伊小姐，你愿意陪菲奥雷小姐去吗？”

我来到前屋开了灯，关了窗户，拉上窗帘。安娜和玛丽亚·马费伊跟我进了屋，站在那里等着我离开。我出门时向安娜友好地笑了笑。她脸色苍白，但眼睛比我刚才看到的要明亮了一些。我进了办公室，把门从身后关上。沃尔夫直着身子坐在椅子里，而不是靠在椅子背上。他那令人昏昏欲睡的耐心的脸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但他的前臂伸展在椅子扶手上，右手的食指移动着，在光滑的木头上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小圈。对沃尔夫来说，这表示他非常激动。

我坐下了。前屋里传来了微弱的动作声和说话声。她们用的时间可真够长的。我说道：“你给我的这件睡袍真棒。”

沃尔夫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又半闭上眼睛。

门打开时我一跃而起。安娜走在前面，手里紧紧地攥着一片纸。她被撕开的袖子已经别了起来，头发也用手指向后梳了梳。她走到我面前，把纸塞给了我，喃喃地说道：“阿奇先生。”我本想拍拍她的肩膀，但我看出如果我真的那样做她肯定会大哭起来，所以我只是点了点头，于是她回到了她的椅子上，玛丽亚·马费伊也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那片纸原来是个小小的马尼拉纸信封。我转向沃尔夫的桌子把信封递给他，但他点了点头，要我打开它。信封没有封口。我抽出了里面的东西，展开在桌子上。

东西倒真不少。沃尔夫和我细细地检查起来。有卡洛·马费伊从六月五日的《纽约时报》上剪下的报道巴斯托死讯的剪报。有一系列画在不同小纸片上的精致的图，图上有两根弹簧、一个扳机和许多其他复杂的装置，其中一幅图画的是高尔夫发球杆的杆头。有一张从《星期日图片报》上剪下的曼纽尔·金布尔的照片，他站在自己的飞机旁，旁边是有他名字的图片说明，评论着飞行在韦斯特切斯特青年中多么流行。照片的底下用铅笔写着：“这就是要我制作高尔夫球杆的人。请看图纸。卡洛·马费伊，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还有一张十美元的金券，上面也有铅笔写的字，是四个人的签名：萨拉·巴斯托、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劳伦斯·巴斯托，还有曼纽尔·金布尔。签名是用粗头的软芯铅笔写的，占了金券的半面。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低声对沃尔夫说了句：“乖乖。”

他说：“阿奇，我认为这应归功于绍尔·潘策尔，而不是你，你甚至没有对这非凡的成果作出一点点贡献。可怜的卡洛·马费伊！他能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作出判断，真有眼光，但这眼光与鲁莽结合了起来，导致了那个致命的约会！我们因他的眼光而获益，而他

却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一个卑劣的交易。马费伊小姐，你失去了你的钱包，却获得了能让你热血沸腾的办法。我们已经知道了杀害你哥哥的凶手，并掌握了惩罚他的武器。菲奥雷小姐，你将收回你的钱。我向你保证，阿奇先生会得到那笔钱并还给你的。他会尽快这样做的，因为我猜你不大相信承诺，现实那熊熊的火焰——那实实在在的二十美元钞票——才是唯一能使你感到温暖和光明的事物。用不了多久的，菲奥雷小姐。请告诉我，马费伊先生是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给你的？”

安娜开口说话了，虽然谈不上滔滔不绝，但也足够心甘情愿了。她将一切细节和盘托出，沃尔夫让我记了下来。她实际上看到了那根高尔夫发球杆。卡洛·马费伊躲在自己屋里干活时，有好几天都不许她进去。他把壁橱也上了锁。但是有一天他外出时忘了锁壁橱门，然而里面并没有什么能满足她好奇心的东西，只有一根显然正在制作中的高尔夫球杆。马费伊回来时，发现高尔夫球杆并没有放在他离开时的位置上，他非常不安，威胁安娜说如果她敢提起这根高尔夫球杆，他就割了她的舌头。这就是她所知道的一切。信封是六月五日——也就是马费伊失踪的那天——给她的。大约七点钟，就在他刚刚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她上楼去取什么东西，马费伊把她叫进了屋，给了她这个信封。他要安娜第二天早晨把信封还给他，但他说如果那天晚上他没回来，并且也没听到他什么音信，就把这信封交给他妹妹。

当安娜说到这里时，玛丽亚·马费伊激动了起来。她跳起身来扑向了那女孩。我连忙追了过去，但沃尔夫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了过来：“马费伊小姐！”他晃了晃他的手指，“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听着，坐下！谢谢你。你哥哥已经死了。你要控制自己的情

绪。我猜，你抓住菲奥雷小姐的头发后，是想问她为什么不把信封给你。这在我看来原因太明显了，也许我能免了她回答这个问题的尴尬。我不知道你哥哥是否告诉过她不要看信封里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她看了。她看见了十美元的钞票，现在归她所有。菲奥雷小姐，在卡洛·马费伊给你那个信封前，你见过的最大面额的钞票是什么？”

安娜说：“我不知道。”

我问她：“你以前见过十美元的钞票吗？”

“没有，阿奇先生。”

“五美元呢？”

她摇了摇头。“里奇太太每星期给我一美元。”

“真棒。你要用这些钱买自己的鞋和衣服吗？”

“我当然要。”

我猛然举起了手。沃尔夫说道：“马费伊小姐，你我都有可能受到某个王国的诱惑，只是这个王国的边界不会这么小。她的内心也许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也许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她会战胜自己，把信封原封不动地交给你；但是那天早上她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回不仅仅是个王国了，简直是个辉煌灿烂的世界。于是她失败了，或者也许是胜利功亏一篑了，这我们不知道。但总之她的内心斗争结束了。现在，马费伊小姐，你要照我说的做，而且不能出差错：带菲奥雷小姐去你家并让她一直待在那里。司机正在门外等你们。你可以向你的雇主解释说你的侄女来了。或者随便你怎么解释，但一定要保证菲奥雷小姐的安全，直到我告诉你危险过去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她上街。菲奥雷小姐，你听见了吗？”

“我要照阿奇先生吩咐的去做。”

“好的。阿奇，你陪她们回去并向她们解释要求。只需要一天左右。”

我点了点头，上楼去脱下了睡袍——它又得放上一年了——然后换上了出门的衣服。

第十七章

我把安娜和玛丽亚·马费伊送到帕克街玛丽亚·马费伊当管家的公寓，然后返回家中，这时办公室的灯已经灭了，沃尔夫上了楼。他给我留了张条子："阿奇，去找一下巴斯托小姐，请她对污损美国货币的原因作出解释。尼·沃。"我知道这事得办。我上楼准备睡觉，但出于对曼纽尔·金布尔的尊重，我走到了楼上厅的后部，看了看沃尔夫的门下是否有光线，但是没有。我喊了一声：

"您在床上吗？"

沃尔夫的声音传了出来："讨厌，别烦我！"

"是，先生。警报器开了吗？"

"开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已经铺好的床上时，已是深夜两点了。

第二天早晨下起了毛毛雨，但我并不在意。我从容不迫地吃了早餐，告诉弗里茨在我外出时要一直把门闩上，然后我穿上一件轻

便雨衣，戴了一顶橡皮帽，吹着口哨走向了车库。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情是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怀特普莱恩斯警方已基本查清彼得·奥利弗·巴斯托之死是意外的蛇咬所致，与这一不幸事件有关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可以解释为巧合。我心想，假如这会儿给《公报》的哈里·福斯特打个电话，告诉他现在给安德森揭短会有多么安全，该多有趣啊。但我没敢冒险，因为我不知道沃尔夫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另一件高兴事是终于完整地得到了安娜始终随身带着的那个信封。我一想到当我第一天和玛丽亚·马费伊一起去沙利文街时，那信封一定就已经带在安娜身上的某个地方了，而我竟毫无察觉，我就想踢自己一脚。不过这样也好。假如那天那个信封给了玛丽亚·马费伊，那就不知会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城郊给巴斯托家打了电话，当我于九点三十分左右到达那里时，萨拉·巴斯托已经在等我了。自我四天前见到她以来，她的气色又好了许多，她的脸颊让人真想捏一下。随着一切重负的消逝，她的肩膀也挺直了。我坐在阳光房里，但那天外面下着毛毛雨。她进来时，我站了起来，她径直走过来和我握了手。她告诉我她母亲也恢复了正常，这回布拉德福德大夫说她很可能痊愈了。接着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杯牛奶。

我笑了笑。"不用了，谢谢。巴斯托小姐，正如我在电话里告诉你的，这次是公务访问。还记得吗，上次我说是社交访问？今天我们谈公事。"我从包里拿出了信封，抽出那张十美元的金券递给了她，"尼禄·沃尔夫是这样问的：你们为什么要污损美国货币？"

她看上去迷惑了一秒钟，然后微笑了，接着一道阴影袭上了她的脸，是她逝去的父亲带来的阴影。"你们怎么——你们从哪里得到它的？"

“哦，是一位收藏家给我们的。不过这些名字是怎么上去的？你的名字是你自己签的吗？”

她点了点头。“是的。我们全都是自己签的。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说过吗？去年夏天有一天拉里和曼纽尔·金布尔打了一场网球，我父亲和我当了裁判和司线员。他们打了赌，拉里输了，给了金布尔先生这十美元。金布尔先生请我们都签上名字作为一件礼物。我们就在——那边的露台上——”

“曼纽尔·金布尔拿走了那张钞票？”

“当然。那是他赢的。”

“就是这张钞票吗？”

“当然，这上面有我们的签名。古德温先生，我只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想问一句：你们是从哪里得到它的？”

我拿回了钞票，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放回信封——不是卡洛·马费伊的那个信封，而是一种特别的信封，上面有一个夹子，以确保已经有些磨损了的签名不致再被磨损，然后我把信封放进了包里。

“抱歉，巴斯托小姐。既然你只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那你可以等等。我希望不会太久。我能冒昧地说一句吗？你看上去真漂亮。刚才你进来时，我真想捏一下你的脸。”

“什么！”她瞪大了眼睛，然后大笑起来，“你在夸我。”

“当然。如果你知道有多少张脸我连想都不想去碰一下的话。再见，巴斯托小姐。”

我们握了握手，她仍在大笑着。

我驾车穿过细雨重新向南驶去，心想那张十美元的钞票真是关键。卡洛·马费伊信封里的另外三件东西都是很好的证据，但只有

这件是别人不可能有而只有曼纽尔·金布尔会拥有的，而它到了卡洛·马费伊的手里。我思忖着，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定是这样的：曼纽尔·金布尔把它作为一件礼物放进了钱包里。他为马费伊制作高尔夫球杆付酬，一定不是在一个光线充足的房间里进行的，为了避免有什么好奇者无心看到，而在黑暗之处进行的，于是这份礼物夹在了他付的钱中。也许事后曼纽尔发现了自己的疏忽，曾要求马费伊归还那张钞票，但马费伊说他已经在无意之中花掉了。这也许引发了曼纽尔对马费伊最初的疑心，当然这也使马费伊意识到它对于彼得·奥利弗·巴斯托之死及其死亡方式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名字，以及另两个姓巴斯托的人的名字，都签在了他保存的这张十美元的钞票上。

是的，不管曼纽尔·金布尔能活多久，他都会永远后悔他赢了那场网球赛的。

路过怀特普莱恩斯时，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减速驶出了主干道。在我看来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访问一下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简要地向他说明真相。那样的话，我就没必要冒着雨一路驶回第三十五街然后再折回来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个电话亭，给沃尔夫打了电话，告诉了他我从萨拉·巴斯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请求他下一步的行动。他叫我直接回家。我说我正好在怀特普莱恩斯，而且有充足的时间，我愿意完成任何他布置的差事。他说："回家吧。你的差事在这儿等着你呢。"

我只好又返回了主干道。

我到家时已经过了十一点了。我没法像往常那样把车停在屋前，因为已经有一辆车停在那里了，是一辆黑色的豪华大轿车。我将车熄火后又坐了一分钟，打量了一番那辆豪华轿车，特别是车牌照旁

边悬挂的公务牌。我放纵自己咧嘴笑着，走到了豪华轿车前，只是为了打趣，对司机说道：

“安德森先生在屋里？”

他看了我好几秒，才下定决心点了点头。我仍然咧嘴笑着，转身跑上了台阶。

安德森和沃尔夫都在办公室里。我进去时假装没看见他，径直走到沃尔夫桌前，从包里拿出信封递给了过去。“查清楚了，”我说，“我把比赛的日期写在了信封上。”他点了点头，叫我把它放进保险柜。我故意慢慢地打开沉重的保险柜门，慢慢地寻找着放着安娜包里其他物品的抽屉。然后我转过身来，让眼光落在了来客身上，装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

“哦，”我说，“是你呀！上午好，安德森先生。”

他咕哝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

“阿奇，拿出你的笔记本来，咱们继续说吧，”沃尔夫拉长了语调，每当听到他这样说话，我就知道来了一位令人不快的律师，“不，不要坐到你的桌旁，拉把椅子过来，和我们坐到一起。我刚才一直在向安德森先生解释，他想用来说明巴斯托案的牵强附会的道理是对事实的侵犯和对正义的侮辱，鉴于我对于其中的一个非常珍视，对于另一个口头上也要表示珍视，我就有理由向他指明他的不足之处。我很高兴你给予我的支持。我这样急急忙忙地把安德森先生叫来，令他稍稍有些不快，但正如我刚才跟他说过的，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电话使我们能够安排这样一个小小的非正式会晤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安德森先生，我相信当你回顾此事时，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安德森的脖子向外鼓了鼓。我从来没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可爱之

处，但这时他正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恶意，因为他知道他不得不这样做，但这令他非常难受，时不时地想发作。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梗着。他对沃尔夫说："你可以叫你的人把笔记本收起来。沃尔夫，如果你以为你能蒙得了我，你就是头比我想象的还要笨的蠢驴。"

"记下来，阿奇。"沃尔夫的语调越拉越长，"这无关紧要，只是一种意见，但是要记下来。安德森先生，我看你是错判了形势。我在电话里要你自主作出选择，结果你选择来了这里。既然来了这里，到了我的家里，你就该允许我来指使我的人行动；如果你生气了，觉得无法忍受了，你可以不拘礼节不受限制地离开。如果你离开了，后面的事情怎么办，我也告诉过你了：在二十四小时内，古德温先生将开着我的车到你怀特普莱恩斯的办公室。在他的后面，另一辆汽车里将是一群报社记者。在他的旁边，将是杀害彼得·奥利弗·巴斯托和卡洛·马费伊的凶手。在他口袋里，将是关于凶手罪行的无可置疑的证据。我想起……"

安德森插话了："卡洛·马费伊？从哪儿又冒出这么个家伙来？"

"不是刚冒出来的，安德森先生。是个已经死了的人。卡洛·马费伊是位意大利工匠，六月五日星期一晚上在贵郡遭到谋杀——背部被刺了一刀。我相信这个案子已经在你的办公室里了。"

"是怎么回事？这与巴斯托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被同一个人谋杀的。"

安德森瞪大了眼睛。"看在上帝的分上，沃尔夫，我想你是疯了。"

"恐怕不是的。"沃尔夫叹了口气，"有很多次我都希望得出你这样的结论，从而使我逃避开生活中这种讨厌的责任——古德温先生

会称之为推脱——但是相反的证据总是占了上风。不过对我们这个行当来说这是件好事。你带着你的支票簿吗？”

“啊。”安德森的嘴撅了起来，“如果带了又怎样？”

“那么支付我那一万美元就方便多了。”

安德森一言不发，眼睛直直地盯着沃尔夫，目不转睛，沃尔夫也直视着他。沃尔夫叹了口气。安德森最终开了口，声音很流畅：

“是方便多了，但不大合理。你不是个敲诈者吧？”

“哦，不。”沃尔夫的脸颊上堆起了褶子，“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我的性情很浪漫，但我的身体不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没有认清形势吗？让我来解释一下吧。某种意义上，要从四年前说起，说说你在戈德史密斯一案中表现出的忘性。我那次非常后悔，所以下定决心要在适当的时候提醒你一下。我现在就是在提醒你。两个星期前，我得到了一条信息，使我有了一个施恩于你的机会。我本希望施恩于你的，但是由于戈德史密斯一案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毫不怀疑，你也一定会这样想的，似乎你的圆滑世故将阻止你接受我的恩惠。所以我决定把这个信息以适当的价格卖给你。这当然就是我提出的赌注。你向古德温先生提出的低劣的价格反映出了你对这个信息的态度，我这里就不提了。”

安德森说：“我提出的是很可观的数目。”

“安德森先生，求求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沃尔夫向后一靠，手指交叉放在肚子上，“古德温先生和我发现了凶手并得到了他的罪证。不是花言巧语的证据，而是能让陪审团信服的证据。这才使我们处于今天的境地。凶手当然不是我的财产，他属于神圣的纽约州。甚至我占有的信息都不是我的财产。如果我不把它交给纽约州，我就应该受到惩罚。但我可以选择交出的方式。第一种，你现

在给我开一张一万美元的个人支票，今天下午古德温先生将去你的银行确认，明天早上他将带你去指认凶手并提交其罪证——一切都将在不公开不张扬的情况下进行；或者是第二种，像我刚才所描述过的，我们组织一只庞大的队伍，有罪犯，有记者，带着证据，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前往你的办公室。你自己选择吧，先生。尽管你也许会认为这难以置信，但我无所谓，虽然收到你的支票会令我高兴，但我也很喜欢来一次游行。”

沃尔夫戛然而止。安德森看着他，冷静而平和地盘算着。沃尔夫按了按桌上的按钮，等弗里茨进来后，要了啤酒。每次我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来，我都注视着安德森。我能看出这令他很痛苦，但我每次都把眼睛瞪得圆圆的。

安德森问道：“我怎么知道你的证据是确凿的？”

“我的话就是保证，先生。它像我的判断力一样可靠。这两者我都可以担保。”

“没有任何可能让人怀疑的漏洞吗？”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没有会令陪审员们的脑袋瓜起疑的可能。”

安德森又撅起了嘴。弗里茨拿来了啤酒，沃尔夫打开一瓶，斟满了一杯。

安德森说：“一万美元是不可能的。五千怎么样？”

“呸！你做小买卖呢？卑鄙。那咱们还是游行吧。”沃尔夫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给我看看证据，告诉我凶手是谁，我一抓到他就给你支票。”

沃尔夫擦了擦嘴唇，叹了口气。“安德森先生，我们中必须有一个人相信另外的人。别逼我再陈述一遍我刚才提到的选择的理由。”

安德森开始滔滔不绝地辩驳起来。毫无疑问，他很顽强，不是个软蛋。但他当然没有实质性的理由，因而也就没有说服力，然而他还是说了很多。他说完后，沃尔夫只是摇了摇头。安德森又说了起来，停顿片刻又接着说了更多，但他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我把他的话都记了下来，我得承认里面没有任何抱怨。他在用劣质的弹药战斗，但他没有抱怨。

最终他从包里掏出了支票簿，放在膝盖上，用他的自来水笔签了支票。他像个优秀的会计一样，不慌不忙，写得既精确又小心。他又以同样精确的态度填写了存根，然后将支票撕了下来，放在了沃尔夫的桌上。沃尔夫向我点了点头，我伸手捡起支票检查了一遍。令我宽慰的是开的是纽约的银行，省得我在下午三点之前赶到怀特普莱恩斯了。

安德森站起了身。“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后悔，沃尔夫。现在，告诉我时间和地点。”

沃尔夫说：“我将用电话通知你。”

“什么时候？”

“二十四小时内。也许是十二小时内。无论任何时候我打到你的办公室里或家里，都能找到你吗？”

安德森说了声：“是的。”话音未落他就转身走了。我起身走进厅里，目送他离开，然后回到办公室，把支票斜靠在镇纸上，给了它一个飞吻。

沃尔夫在吹口哨，也就是说，他的嘴唇变成了一种特定的圆形，有空气在进出，却没有声音。我喜欢看他这样做。但除了我之外再没有人见过他这个样子，连弗里茨也没有。有一次他对我说这意味着他屈服于自己的情绪了。

我收起笔记本，把支票插进了我的包里，又把椅子拉回到原来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沃尔夫说道："阿奇，四年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

"是的，先生。但一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离午饭还有一小时。我现在就去银行，让他们在上面涂抹。"

"外面下着雨呢。我想你今天早晨已经跑了一大圈了。去叫个信差来吧。"

"仁慈的上帝呀，你就是给我一加仑牛奶，我也不愿意失去享受确认这张支票的乐趣。"

沃尔夫向后一靠，咕哝了一句"真勇敢"，就闭上了他的眼睛。

我赶在午餐之前及时地赶了回来。

自然，我以为时间刻不容缓，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沃尔夫似乎悠哉游哉起来。他做什么都不慌不忙。他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喝了两大杯咖啡，消磨着时间。午饭后他又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里休息，似乎什么也没想，急得我团团转。过了好久，他才稍稍欠起身来，给我布置了几件任务：一、用打字机将安娜 · 菲奥雷的证词按时间顺序完整地打印出来；二、将卡洛 · 马费伊信封里的所有东西复印一份；三、去一趟帕克街公寓，把玛丽亚 · 马费伊的钱包还给她，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让安娜 · 菲奥雷在证词上签字；四、向霍斯特曼核实一下，应在昨天由"科尔特斯"号轮船运到的假鳞茎兰花是否到了。

我问了他一句："你没有忘记什么事情吗？"他摇了摇头，幅度极小，好像是在说不要打扰他的舒适，于是我没再说话。我很好奇，但并不担心，因为我从他的脸上能看出，他正在往正确答案上添加什么。

那天下午我极其忙碌。我先是去了第六街的一家复印室，让他们用复印机复印，我反复叮咛他们如果原件遗失或损坏了，那么当他们听见我来了时，最好是赶紧从后门逃走。然后我回到办公室，用打字机打出了安娜的证词。我把它打成了很优美的格式，这花了很长时间。当我再次出门走向敞篷车时，雨已经停了，天开始放晴，但路面仍然是湿的。我给玛丽亚·马费伊工作的公寓打了电话，赶到那里时，她正在等我。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管家制服，头上扎着一条黑色发带，看上去优美典雅、风度翩翩。我差点儿都不敢把钱包递给她了，因为这显得太粗鲁了。但她接过了钱包。然后她领着我来到外面的一间房子，安娜·菲奥雷正在里面坐着向窗外张望。我给她读了一遍证词，她签了字，玛丽亚·马费伊和我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签完字后，安娜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但自我进屋起，她的眼睛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我起身离开时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用不了多久的，安娜，我会把你的钱追回来，并还给你的，真的用不了多久。不用担心。"

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阿奇先生。"

我从复印室拿了复印件后，觉得没必要再把敞篷车停在外面了，因为不大可能再去哪里了，于是我把它停进了车库，步行回家。直到晚饭前我都一直在忙着核对"科尔特斯"号船运来的货物，就损失情况给发货人写信。当我在楼上与霍斯特曼一起核对时，沃尔夫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荡，但六点钟时他离开了我们，霍斯特曼和我继续核对。

吃完晚饭时已经过了八点。我一直心神不宁。虽然跟随沃尔夫七年已经教会了我即使世界末日来临也不必坐立不安，但很多次经

历也使我相信了对于这个怪人必须揪着他的鼻子走。那天晚餐时他一直在听收音机。听完之后他点头示意弗里茨把他的椅子往后拽，我站起来说道：

"我想我用不着坐在办公室里看你打哈欠了。我要去看场电影。"

沃尔夫说："好的。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自己的文化生活。"

"什么！"我爆发了，"你的意思是——见鬼，你要让我坐在电影院里，而曼纽尔·金布尔可能已经为一次愉快的旅行打好了背包，准备回到他的故乡？然后我再到阿根廷去，买上一匹马，骑着它跑遍潘帕草原，或其他什么地方，四处寻找他？你以为只需坐在办公室里让你的天才运转就能抓住凶手吗？也许大部分情况下要依赖于此，但也需要一双眼睛和两条腿，有时候甚至还需要一两支枪。而你能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去看场电影，与此同时你……"

他抬起手制止了我。弗里茨已经将他的椅子向后拉开，他站了起来，像是一座小山支在了两条腿上。"阿奇，"他说道，"原谅我。再暴躁的人，哪怕像蜂鸟一样，也有安静的时候。我没有建议你去看电影，是你自己提出的。即使曼纽尔·金布尔这会儿正在阴暗中发抖，也没有预兆应该去打扰他。曼纽尔·金布尔为什么要旅行？为什么要返回家乡或去其他什么地方？我要说的是，此时此刻他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这能让你冷静下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就在自己家，但没有为旅行打包。就在两个小时前我刚刚和他通过电话。弗里茨，门铃响了，请到前门去看看。明天早上八点他还将接到我的另一个电话，我敢肯定他会等着那个电话的。"

"但愿如此。"我还是不放心，"现在松懈是危险的。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但也很重要。我可以现在就去那里，剑拔弩张地

盯着他，直到你吩咐安德森去抓他。为什么不呢？”

沃尔夫摇了摇头。“不，阿奇。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现在智谋该退场了，该由赤裸裸的暴力来完成最后一击了。我明白，但我强烈地否认这一点。不过，来吧，客人们已经到了。在你去娱乐之前，能先在办公室里待一会儿吗？”

他转身走进了办公室，我跟在他后面，不知道他又在玩什么把戏，但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喜欢。

弗里茨已经开了门，将客人们领进了办公室。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人，但万万没想到会是这帮家伙。我瞪大眼睛把他们打量了一番，是弗雷德·德金、比尔·戈尔和奥里耶·卡瑟。我的第一感觉是沃尔夫太滑稽了，以为我需要一支大军才能降伏矛头蛇，因为我已经不再把曼纽尔·金布尔称为说西班牙语的下贱胚了，而是称之为矛头蛇，但沃尔夫太了解我了。我向他们点了点头，当我看见奥里耶的左腕上裹着纱布时，不禁咧嘴笑了。安娜·菲奥雷咬得真是不轻。

沃尔夫坐进椅子后，叫我拿一支铅笔和一大张纸，画一幅金布尔府第的草图。因为有客人在，我没问任何问题，就照他说的做了。我告诉他我只熟悉房子周围和小型机场一带，他说这就够了。我坐在自己的桌旁画图时，沃尔夫向奥里耶交代着明天早晨六点半怎样把轿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又吩咐其他两人届时与他会合。

我把地图拿到了沃尔夫桌前。他看了足有一分钟，然后说道：“很好。现在告诉我，如果要你派三个人到那里去盯着，确保曼纽尔·金布尔一旦离开就会被发现，并且能跟上他，你将怎样布置他们？”

我问道：“要隐蔽吗？”

“不。公开就行。”

“需要盯多长时间？”

“三个小时。”

我考虑了一分钟。“好办。德金负责公路，就在通向小马路的大门对面等着，把轿车藏在门背后，这样无论金布尔往哪边走，都能迅速发动车并跟上。比尔·戈尔埋伏在灌木丛中——大概在这里——这样他能看见通向房子的所有道路，只是看不见屋后。奥里耶将守在屋后的山上，大约五百米处，他可以拿一副望远镜，把摩托车停在山下的路边。但他们尽可以待在家里打牌，因为他们会飞。”

沃尔夫的脸颊上堆起了褶子。“绍尔·潘策尔可以对付。云里也将长出眼睛。谢谢你，阿奇。就这样吧。我们不耽误你去娱乐了。”

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我可以走了，但我不想走。如果他想玩什么把戏，我愿意帮忙。我说：“电影院已经都关门了。”

沃尔夫说：“那你可以去妓院嘛。当你收鸡蛋时，你必须把每个鸡窝都看上一遍。”

比尔·戈尔偷偷地笑了。我恶狠狠地瞪了沃尔夫一眼，就去厅里拿我的帽子了。

第十八章

星期三早晨不到七点我就醒来了，但我并没有马上起床。我看着太阳斜斜地照在窗户上，听着窗外的街上和远处河上的轮船和渡船发出的噪声，心想比尔、弗雷德和奥里耶如果六点半在车库聚齐了，这会儿他们一定已经到了大广场了。而我的任务还没有交代给我。昨天晚上我回家时沃尔夫还没睡，但他没给我留任何纸条。

我最终滚下了床，磨磨蹭蹭地刮了胡子，穿上衣服，下了楼。弗里茨在厨房里，正干劲十足地忙碌着。我嘲讽了他几句，但马上意识到拿他出气是不公平的，于是作为补偿，我多吃了一个鸡蛋，并大声给他读了一条早报上动物园里吸血蝠产子的消息。弗里茨来自瑞士的法语区。他每天早上看一份自己的法语报纸，但在我看来上面从来没多少内容。每当我发现那份报纸上居然还有代表着即时新闻的某个时髦词汇时，我都会惊讶不已。例如，“巴斯托”这个词竟然也在报纸头版待过一个星期。

我开始喝第二杯咖啡时，电话响了。我走进办公室拿起了听筒，但沃尔夫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也接了电话。我听着。是奥里耶·卡瑟报告说他们已经各就各位，一切正常。就是这些。我又回到厨房继续喝咖啡。

喝完第三杯咖啡又抽了一支烟后，我溜溜达达地走进了办公室。心想，天才早晚会透露他的秘密的，只是早晚的事，少安毋躁吧。现在只需打扫打扫屋子，擦擦桌子，为大师的钢笔加满水，把办公室收拾好就行了。迟早的事情，亲爱的——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做不到平心静气，我仍然烦躁不安。有好几次我都拿起了听筒，却没听见沃尔夫打任何电话。我把信件收拾好放在他的桌上，又打开了保险柜。我拉开了放着马费伊那些材料的抽屉，以确认它们没有丢失。我发现我放复印件的那个信封瘪了一些，我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复印件少了一份。我印了两份，现在只剩一份了。这让我受到了启发，关于沃尔夫的第一个把戏……但我没能继续想下去，因为我刚把信封插回抽屉里，弗里茨就进来了，说沃尔夫要我到他的房间里去。

我上了楼。他的门开着。他已经穿戴整齐，只是没穿外套。沃尔夫一天要换两件干净的衬衫，但都是浅黄色的。当他站在镜子前梳头时，他那黄衬衫上肥大的袖子就像绵羊巨大的膀胱在晃动着。我从镜子里看了看他的眼睛，他向我挤了挤眼！我大吃一惊，我想我的嘴巴一定是大大地张开了。

他放下了梳子，转向我说："早安，阿奇。你吃过早饭了？很好。在昨天那场下个没完的小雨后能重新看见太阳，真令人愉快。从保险柜里把马费伊那份文件拿出来。无论如何带上把枪。到怀特普莱恩斯安德森的办公室去找他——他正在那里等你呢——然后开

车把他拉到金布尔家，让他认识认识曼纽尔·金布尔。如有必要的话，指给他看。当曼纽尔·金布尔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把文件交给安德森先生。等你回到家时，你会发现弗里茨做的午饭里有一个你最爱吃的菜。”

我说：“好的。但为什么要那么神秘呢……”

“回头再说，阿奇。请把你的问题再保留一会儿吧。再过十分钟我就要上楼了，而我还没享用我的巧克力呢。”

我说了声“我真希望它噎着你”，就转身走开了。

我把卡洛·马费伊的材料和安娜的证词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又拿了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这回别在了屁股后面，然后走向车库。那天是六月二十一日，是太阳开始南移的一天，天气很温暖，阳光很明媚。我心想，这是一年中最漫长的一天，也是最后收服矛头蛇的好日子。我给汽车加满了油，开着它穿城来到了帕克街，然后向北驶去。经过曼哈顿信托公司的大理石前门时我敬了个礼，我就是在这里确认安德森的支票的。在早晨的这个时候沿主干道向北，路上的车并不多，但我仍然把速度控制在每小时四十英里以下。沃尔夫告诉过安德森这将是一次不张扬的行动，而且我也没有心情再同骑摩托的警察费口舌。我非常紧张。每当我真正上路去抓某个人时，总是这样。周围的空气对我来说似乎从来不够用，我急促地呼吸着，而且我接触到的一切——例如方向盘——似乎都是活的，里面在流着血。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我总摆脱不了它。

安德森正在等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前台的那个姑娘向我点了点头，就急忙拿起了电话。一分钟后安德森出来了。他带着两个人，手里都拿着帽子，看上去身强力壮。其中一个是H.R.科贝特，另一个我不认识。安德森停步对前台的姑娘说了些什么，就向

我走来。

“嗯？”他哼了一声。

我笑了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呢？你好，科贝特，你也去吗？”

安德森说：“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带两个人，你觉得够吗？”

我点了点头。“只需要有人给我拿拿帽子就行了。走吧。”那第三个家伙拉开了门，我们鱼贯而出。

安德森和我一起坐进了敞篷车。另外两个人坐进了一辆挂着公务牌的小轿车跟着我们，但我注意到那不是安德森的豪华轿车。沿着怀特普莱恩斯主大街行驶时，所有的交警都向我的乘客敬了礼。我微笑着心想，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位地区检察官为了坐我这趟车付了多少车费，一定会大惊失色的。车子一驶上干道我就加大了油门，冲上山坡，又冲了下去，速度之快令安德森不禁对我侧目。他不知道开这么快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因而我一直这样高速行驶着，只是在拐弯时才稍稍减速，同时也是为看看跟在后面的科贝特有没有跟上来。从怀特普莱恩斯郡政府大楼开到金布尔家小马路的大门口只用了二十五分钟。当我减速拐进门时，我仪表盘上的钟显示的是十点四十分。

德金守在那里，就在路对面，像我建议的那样把车停在门背后，坐在轿车的脚踏板上。我向他挥了挥手，但没有停车。安德森问了句：“是沃尔夫的人？”我点了点头，飞速地冲上了小马路。我开出了快一百英尺，安德森才喊道：“停车！”我踩下了刹车板，摘了空挡，拉上了手刹。

安德森说：“这是E.D.金布尔家，你该早些告诉我的。”

我摇了摇头。“这没关系。你了解尼禄·沃尔夫，这样对你才好。我只是遵命行事。继续往前开吗？”

科贝特的车停在了我们后面。安德森看着我，不安地撅着嘴。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不是等着安德森的答复，而是因为我听见了一架飞机的声音。即使我想下车抬头看，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树木实在太茂密了。但那绝对是一架飞机，没错。我挂上挡。车子猛地向前蹿出。

安德森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古德温，我希望你明白你在冒着怎样的危险。如果我知道……”

我制止了他：“闭嘴！”

我飞速地开到了房子前，跑过去按了门铃。没过多久，一个胖胖的男管家出来开了门。

“我想见见曼纽尔·金布尔先生。”

“是，先生，您是古德温先生吗？他知道您要来。他吩咐我请您去飞机库，在那里等他。”

“他不在那里吗？”

管家犹豫了一下，他无疑看上去很担忧。“我想他是想开着他的飞机上天。”

我点了点头，跑回了小汽车旁。科贝特已经下了车，走到了敞篷车旁，在和安德森交谈着。我坐进车里后，安德森转向我喝道：“听着，古德温……”

“你没听见我叫你闭嘴吗？我急着呢。闪开点，科贝特。”

我向前冲上了屋后的小马路，向通往机库的砾石路开去。在那边，机库外的树下，飞机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开得碎石四溅，当我猛地停在机库前的水泥平台上时，车子发出了尖厉的响声。机械师

斯金纳站在大敞的门前。我跳出车外，跑向了他。

“曼纽尔·金布尔先生在哪里？”

斯金纳向上指了指，我抬头望去。是曼纽尔·金布尔的飞机，已经高高地飞起了，但我仍能看到上面的红色和蓝色。它似乎发出了很大的噪声，但几秒钟后我就看出了原因，原来西边还有一架飞机在盘旋着，比曼纽尔的飞机飞得更高更快。是它制造了更多噪声。两架飞机一起盘旋着，机身在阳光下呈现为黑色，非常美丽。我低下头来打了个喷嚏。

斯金纳说道：“今天早上他有了这个伙伴。”

“我看见了。那是谁？”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八点刚过的时候。此后它就时不时起飞一次。那是一架博顿双引擎飞机，起降都非常棒。”

我想起了沃尔夫说过的“云里也将长出眼睛”。天上没有一丝云，但无疑有眼睛。

我问道：“金布尔先生是什么时候起飞的？”

“十点多一点儿。他们是九点半出来的，但后座没有准备好，我得装上皮带。”

他刚说完我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问了一句：“哦，有什么人和他一起上天吗？”

“是的，先生，是他父亲。老先生也在飞机上。他这是第三次上天。他一看座位没准备好，都不想上去了。是我们把他扶了进去。”

我又抬头看了看飞机。曼纽尔·金布尔和他的父亲在一起飞翔，在天上，在阳光中，在风中，在飞机的咆哮声中。他们也许相互没有交谈，只是在进行一次晨飞。

我走向敞篷车，准备同安德森交谈。科贝特已经从他的车上下

来，向我走来。我停住脚步，听他说道："喂，我们来赴你的聚会了，你尊贵的客人在哪里？"

我同他擦身而过，没有理他，径直走到了敞篷车旁。我觉得没必要让机械师听见，就压低了声音："你得等一等了，安德森先生。杀害巴斯托的凶手正在开飞机。我很遗憾你没能及时地抓住他，但你会抓住的。"

安德森说："进来。你该摊牌了。"

我摇了摇头。这也许不近人情，但我还是决心严格执行沃尔夫的命令。"还没到计划的下一步呢。"科贝特也走了过来，绕到了敞篷车的另一侧，这回他把脸贴在了窗户上，对安德森说道："如果他有什么您想要的东西，我很乐意为您弄来。"

我张开了嘴，正要正式地向他发出邀请，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斯金纳离开了机库，正向我跑来，一手拿着根高尔夫球杆，一手拿着个信封。我注视着他。他边跑边说："我差点儿忘了。你是古德温先生吧？金布尔先生要我把这些给你。"

我迎上前去一把抓了过来。高尔夫球杆啊！我打量着它，但没看出什么异常来。它的外表就是根普通的高尔夫球杆。但它当然就是那根球杆了。天哪！我把它夹在胳膊下，又看起了信封。信封上写着"尼禄·沃尔夫先生收"。信封没有封口，我抽出了里面的东西，是我在保险柜里没找到的那套复印件。它们被用一个纸夹子夹着。纸夹子下面的一张纸上写着："谢谢你，尼禄·沃尔夫。为了回报你的好意，我给你留下了一件小小的礼物。曼纽尔·金布尔。"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沃尔夫把戏的主角驾驶的红蓝色飞机仍然在天上，我觉得它飞得更高了。它继续盘旋着，而另一架飞机在它的上方。我把复印件放回了信封里。

科贝特跑到了我面前。“给我，把那些东西给我。”

“哦，不。谢谢，我自己能拿。”

他像只猫一样扑了过来，我根本没想到。他的动作非常利落，一只手抓过了信封，另一只手抓过了高尔夫球杆，然后跑向了敞篷车。我两步就跳到了他面前，他停住了脚步。我没有废话，只说了声“看着，接招”，就一拳打在了他下巴上，紧接着又是一串组合拳。他踉踉跄跄地丢下了他的战利品，我等他摆好了架势，用左拳虚晃一招，右拳又一次击中了他。这回他倒下了。他的伙伴跑了过来，斯金纳跑在他的旁边。我转身正准备迎击那伙伴，安德森的声音从敞篷车里传了出来——我倒没想到会那么管用。

“柯里！住手！闪开！”

柯里停住了脚步。我也后退了一步。科贝特站了起来，凶狠地瞪着眼睛。安德森又喝道：“科贝特，你也住手！”

我说道：“这可怪不着我，安德森先生。如果他们想玩一场抢了就跑的游戏，我可以一个人对付他们俩。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对私人财产要有起码的尊重。”

说罢我便低头去捡球杆和信封，就在我弯腰的一刹那，我听见斯金纳叫道：

“天哪！他掉下来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他是说我的球杆掉了，我觉得他大概疯了。接着我站直了身子，瞟了他一眼，才发现他在往哪儿看，我立刻抬起了头。曼纽尔·金布尔的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大约有一千英尺高。它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打着滚，坠落下来。它震荡着，来回摆动着，看上去不像要直直地落下来，然而我猜它就是要直直坠下。它就在我们上方——越来越快——我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

“小心！”斯金纳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们都向机库的大门跑去。安德森也跳出了敞篷车和我们一起跑。我们刚刚跑进门，转过身来，就看到了飞机撞地的那一幕。一声巨响，不像大炮也不像雷鸣，而是一种立刻要撕裂人耳朵的破裂声。碎片四处飞溅，其中的一些溅落到我们跟前。飞机正落在水泥平台的边缘，离科贝特的车不到十码。我们跃出门外，跑向了残骸，斯金纳叫道：“小心爆炸！”

我第一眼看到的情景惨不忍睹。唯一让我辨出E.D.金布尔尸体的原因，是他与后座所在位置上的皮带缠绕在了一起，而斯金纳说过老先生也乘飞机上天了。很明显飞机坠地时，前座受到的冲击不同，因为任何人都能认出曼纽尔·金布尔的尸体来。他的脸部是完整的，甚至形状完好。斯金纳和我把他抬了出来，而其他的人在抬那位老先生。我们把他们抬进了机库，放到了地上的帆布上。

斯金纳说：“你最好挪挪你的车。马上有可能发生爆炸。”我说：“一旦我发动了车，就会一直开走了。现在是时候了，安德森先生。你也许还记得尼禄·沃尔夫保证过我将不事张扬，我正是这样做的。”我从口袋里掏出文件递给了他，“这是你需要的证据。你要抓的人就躺在地上，是那个脸部完整的。”

我从抛下曼纽尔·金布尔的信封和高尔夫球杆的地方把它们拾了起来，掸了掸。我大概用了四秒钟才把敞篷车发动起来，然后离开了那里，一溜烟地开上了路。

在大门口转向公路前，我停了很长时间，才对德金说道：“把你的同伴召集起来，回家吧。戏已经结束了。”

我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开到了怀特普莱恩斯。敞篷车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好过。我在两星期前给沃尔夫打电话的同一个药房给他打了

电话。那次我是告诉他安德森去了阿德隆达克斯，我只能同德温打赌了。这回他立刻就接了电话。我简明扼要地向他汇报了情况。

他说："很好。我希望这不会让你不高兴，阿奇。我想你的脑子最好不要被鸡毛蒜皮的小事搅得一团乱。弗里茨正在准备你爱吃的东西。顺便问一句，怀特普莱恩斯在哪里？你方便不方便去一趟斯卡斯代尔？格鲁克纳给我打了电话，说他成功地杂交了丹德罗比姆斯墨尔波墨兰花和芬德利阿努姆兰花，他要给我一些种子。"

第十九章

它看上去当然不那么好看，是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淡蓝色，而且那么小，你不用折叠就能把它塞进一个普通的信封。它看上去甚至比实际还小，因为空白处写的字又大又潦草，但笔迹却很有个性。我猜那是萨拉·巴斯托的字迹。下面的签名“伊莲·巴斯托”就非常不同了——既优美又清晰。那是星期六的早晨，支票是随第一封邮件寄来的。当我把它递进银行出纳员的窗口时，温柔地看了它最后一眼。我给正在楼上的沃尔夫打过电话，说是有一封信封上写着巴斯托的信寄来了，他吩咐我打开它，把支票存进银行。

十一点钟时沃尔夫走进了办公室，坐到了他的桌旁，按铃叫弗里茨拿啤酒来。我已经将巴斯托一案的开支表用打字机打好，准备送他审阅。他刚瞟完那寥寥几封信件，我便递了上去。他拿出一支铅笔慢慢地点着，逐条核对起来。我在旁边等着。当我看见他点到倒数第三行并停了下来，我咽了口唾沫。

沃尔夫抬起了头。“阿奇。我们必须买一台新打字机了。”

我只是清了清喉咙。他继续说道：“这台打字机已经不听使唤了。也许你没注意到，它居然在安娜·菲奥雷名字旁的小数点前插进了一个零。我发现你很粗心，把这个错误的数字也加进了总数里。”

我堆出了一副笑脸。“哦！现在我告诉你吧。我忘了跟你说了。安娜下的蛋已经孵出了小鸡，现在已经是一千美元了。今天下午我要给她送去。”

沃尔夫叹了口气。啤酒来了，他打开一瓶，斟满了杯子。他把开支表和信件一起压在了镇纸下，身子向后靠在了椅子上。“从明天起我要把酒量减少到五夸脱。”

我笑得更甜了。我说：“你不用改换话题。即使你说再加一倍，我也不会犯下称赞你慷慨这种错误的。你还可以讨价还价呢。你知道安娜会拿这笔钱做什么？她会给自己买一个丈夫的。看看你将做的善事。”

“讨厌。什么也别给她。告诉她那笔钱找不着了。”

“不，先生。我要给她这笔钱，让她自己给自己掘墓去。我不像你那么残暴，我可不想做死神的替身。”

沃尔夫睁开了眼睛。一连三天他都昏昏沉沉的，我想现在该是把他唤醒的时候了。他咕哝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阿奇？”

“是的，先生。我想问你，你怎么会产生杀死E.D.金布尔这种念头？”

“你是说他儿子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吧？”

“不，是你。不要推脱。是你杀了他。”

沃尔夫摇了摇头。“错了，阿奇。是我推脱吗？E.D.金布尔是

被他扔在地板上的玩具堆里和他妈妈的血泊中的那个婴儿杀死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许更应当这样说，E.D.金布尔不是在上星期三上午，而是在六月四日星期天被杀的。因为一个不幸的意外，盲目的偶然干扰了生死的自然过程，巴斯托替他死了。的确是我纠正了这个错误。我叫德金给曼纽尔·金布尔送去了一份我们得到的不利于他的证据的复印件，我还亲自给曼纽尔·金布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被包围了。当我确信E.D.金布尔在家并且那天早晨不会离开后，我就让自然来决定进程了。"

我说："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能隐瞒真相，只能在它的周围建一座玻璃房子。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是你杀了他。"

沃尔夫的脸颊堆起了褶子。他又斟了一杯啤酒，然后又将身子向后一靠，观察着泡沫。当所有的泡沫都消失了，杯中只剩下一圈细细的白边时，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麻烦在于，"他咕哝道，"你像平常一样太过专注于事实，却忽略了它所处的环境。阿奇，你就像牛乳房上的水蛭一样，一口咬死毫不放松。请考虑一下我所面对的形势。曼纽尔·金布尔试图杀死他父亲。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导致了无辜的巴斯托做了替死鬼。能证实曼纽尔是凶手的证据掌握在我手中。我该怎么使用它？如果我能承受得起哲学态度那样的奢侈，我就应当根本不使用它，但我承受不起那种态度，这是公事。那么让我自己做死神的替身吗？当然。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只有根本不采取行动才能避免这种境地。我是被迫采取行动的。如果我不加警告就允许你去抓曼纽尔·金布尔，把他活着交给纽约州人民进行惩罚，他就会作为一个痛苦和失败的人坐上被告席，接受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他的内心就会丧失生活赋予他的深深的满足感。而他的父亲也会同样地

痛苦，同样地感到失败，他将踉踉跄跄地度过风烛残年。如果我一手造成了这种结果，我就要为之负责，对我来说，那将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我仍然不得不行动。我就这样做了，结果我承担了在很大程度不那么令人不快的责任。你对整个复杂现象的概括，就是生硬地说我杀死了E.D.金布尔。好吧，阿奇。我要为我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但我不接受你的单纯加给我的负担。某种程度上你必须自己承受它。”

我笑了笑。“也许。我不是说也许我能承受它，我的意思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切。而且，也许我太单纯了，竟然单纯到今天早晨从银行回来时，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

“是吗？”沃尔夫又给自己斟满了一杯啤酒。

“是的，先生。我突然想到，如果曼纽尔·金布尔被捕并且受审，那你就得戴上帽子和手套，离开家，走到一辆汽车旁，坐上去径直前往怀特普莱恩斯，坐在法庭上等着轮到你作证。然而现在，一切都顺其自然地发生了，你对现象有这么好的感觉，所以你能只是坐在这里饮酒，而把你的责任放在你的大腿上。”

“的确如此。”沃尔夫咕哝道。